

جوڻگوتڪڻ چڪارا سسپياسسٽي

# 中國邊政

چودھويں سال

China Border area Study

چودھويں سال

چودھويں سال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一〇六年十二月

212

## 基諾族簡介

基諾族自稱基諾，以往漢文譯之為「攸樂」，1982 年時僅有一萬一千九百七十多人，2010 年大陸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有二萬三千一百多人，二十八年間增長一倍，但仍然是大陸各邊疆少數民族中，人數較少的民族。

基諾族聚居於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景洪市的基諾山區。基諾族有其民族語言，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基諾語言內部一致，沒有方言，沒有創制本民族文字，以刻木，刻竹或數玉蜀黍以記事或記數。刻竹一般長一、二尺，寬一、二寸。在信仰上為萬物有靈的薩滿信仰，尊奉諸葛亮（孔明），對祖先崇拜、占有重要地位。

基諾族的家庭是父系家長制，父母在世，兒子們不可分家，兄弟再多也得住在一起，通常由長媳負責烹飪，二兒結婚後，則由次媳負責烹飪，以此類推，其他人則下田種地，老弱病殘者，不但免於勞動，還會受到適當的照顧，相當的人性化。基諾族家庭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在一個火塘的房子內，居住著父系家庭的全體成員，人數由五、六人到十多人，甚至有多到五、六十人，幾代人在一個男性家長領導下，集體工作吃大鍋飯，很像早年內地漢人的大家庭；另一種是在一座大而長的房子，居住著同一父系氏族的好幾代人，其中含好幾個小家庭，各個小家庭各有火塘（廚房），而且各個小家庭都有自己的經濟，彼此互不牽扯。在生產勞動中，男女並沒有明顯的區分，但女子不從事犁地、打獵等工作，只是因女子力氣小，並無其他含義，如果有強健的女子，也可參與集體狩獵。

每個家庭都有一個家長，稱之為「卓勒」，由年長的男子擔任，掌管一家的經濟、安排農業生產、主持家庭會議以及祭祀活動，並代表這個家庭參加村寨的政治與祭祀活動。假如一個家庭的男子都死光了，因而沒有「卓勒」，而女子不能出任「卓勒」，此時要把房子拆掉，婦女必須改嫁或回娘家，無權繼承門戶，這是一種很特殊的習俗。

基諾人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在 1949 年以前還保留一些對偶婚和群婚的殘餘，通婚的範圍一般在本村寨不同的氏族間進行，同氏族不能通婚，和內地早期漢人的同姓不婚有些類似。在婚前男女的性活動相當自由，並不認為婚前子有何不妥，甚至可以把未婚所生的子女帶到夫家，也可以交給舅舅撫養。結婚的年齡，無論男女都要在偶數歲（如十六、十八歲）這也相當奇特。

基諾族的服飾，都是用自製的土布，當然現在已經有機織的布、或成衣。在飲食方面，主食以大米為主，玉米、象瓜果只當作零食，副食方面肉類有豬、狗、雞等，蔬果也非常的多。在居住方面建築精巧別緻，但全是草房，形狀像戲劇中的「孔明帽」，在喪葬方面，採土葬。



# 目 錄

介析羅家倫先生有關邊疆論著.....	劉學鈞	1
唐代突厥族入居長安城分布其及特點.....	朱振宏	35
成吉思汗西征.....	金兆鴻	65
夏格巴《藏區政治史》與「西藏福利會」.....	孟 鴻	97
台灣岩畫與大陸岩畫之比較研究.....	張嘉馨、吳楚克	117
天命六年滿文變革考析.....	張華克	129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廿七）－傣族食品「香茅草烤魚」.....	華 華	151
稿 約.....		157

本協會秘書長劉學鈞所著《歷史原來是這樣》由台北大地出版社出版，電話 02-2627-7749。

歷史是什麼？廣義是過去發生的事，狹義是經過後人篩選過濾的事。現代人要了解歷史必須透過先人留下來的各種史書，歷史是人寫的，寫歷史的史官總會有既定的政治立場，很多主流的歷史說法也不一定是歷史真正的原貌。還原歷史真相，從不同的角度看歷史，也許會發現，我們曾經以為很熟悉的歷史會是如此的陌生。

本書包含以下十個主題：

- 一、北魏後宮多高句麗女子。
- 二、花木蘭其人、其詩、其事。
- 三、掀開五胡十六國序幕的匈奴劉淵。
- 四、北魏洛陽的靈異事件與西域胡僧。
- 五、幾個末代皇帝事蹟。
- 六、成吉思汗的霸業、容貌與陵寢。
- 七、隋、唐先世多胡化。
- 八、五世達賴喇嘛、噶爾丹與中俄尼布楚條約。
- 九、匈牙利是匈奴的後裔？
- 十、稗官野史中的武則天。

作者根據史料旁徵博引、交叉比對，加上本身專業的經驗與研究的修為，引領大家進入塵封已久的歷史禁地，窺探古代那些不為人知的傳奇軼事，帶給你聞所未聞的閱讀享受，看得過癮、讀得暢快－歷史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歷史



## 介析羅家倫先生有關邊疆論著

劉學鈞

前蒙藏委員會委員兼主任秘書

前文大、輔大、中原兼任教授

中國邊協會秘書長

### 摘 要

「中國」一詞在文獻上最早似見於《詩、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從文義看，並非指今日所謂的國家，應是指一塊地域，或是指一種生活方式（文化），以及採行此種生活方式（文化）的各民族，就此觀之，中國自秦以來就是由多元民族所建構而成，北方自秦漢時之匈奴、經鮮卑、柔然、烏桓、敕勒（高車）、氐、羯、羌、突厥、契丹、回紇、女真、党項以至蒙古、滿族等數十支系民族聚居其間，都曾建立過相當規模，甚至超大規模的政權或王朝，其中如鮮卑拓跋部所建的魏（或稱拓跋魏、北魏、元魏、後魏）、鮮卑宇文部的周（史稱北周或有指宇文氏係匈奴別部）、鮮卑化高氏的齊（史稱北齊，或有指高氏原即鮮卑，冒稱渤海高氏）、契丹族耶律部所建之遼、女真族完顏氏所建之金、蒙古族博爾濟錦氏所建之元、滿族愛新覺羅氏所建之清，都曾統有大漠南北，也都是中國正統王朝，各有正史傳世（元史且有兩部，《清史》大陸正在編撰之中），以言二十五史（如加清史則為二十六史），以上邊疆民族所建王朝之史，幾乎三居其一，其重要性於焉可見。

可惜歷來政府官員與學界對邊疆民族與邊疆地區的研究、著述與其重要性不成比例，誠令人不解與歎息。羅家倫先生是民國時代典型學而優則仕的代表人物，無論其治學、

從政都有頗高評價，尤難能可貴者，雖然羅氏籍隸東南沿海，但對西北新疆、西藏、蒙古乃至東北地區都相當重視，論著十餘篇，本文就其有關邊疆論著加以介析。

**關鍵詞：**羅家倫、邊疆、新疆、西藏

## 壹、關於羅家倫先生

據羅家倫先生手書自傳：

「羅家倫字志希，浙江人，生於公元 1897 年（民元前十三年，筆者按係清光緒二十三年），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畢業，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倫敦、巴黎、柏林三大學研究院，最後七年專治歷史與哲學，民國七年從事文學革命運動，為《新潮月刊》編輯，該刊為初倡文學革命時期最風雲之刊物，八年五四運動，十五年參加北伐，任總司令部參議、編譯委員會委員長、戰地政務委員兼教育處長等職（以下字跡經塗改頗難辨識）數度出入火線，曾任中央法制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以下塗改難識）委員會副主任、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外交委員會委員、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然其指趣常集中於教育、文化、學術工作。

曾任國立東南大學、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武漢武大學等校教授，國立清華大學首任校長，建立該校規程。中央政治學校（按即後日政治大學前身）教務主任兼代教育長，為其籌備創始者之一，嗣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凡十年，於七七事變後，即將該校全部遷重慶，（以下數字塗改難以辨識）毫無損失，凡速建……歷任滇黔考察團團長、西北建設考察團團長，遍歷西南、西北各省，首任新疆監察使，時蘇俄紅軍仍駐新疆，努力促進新疆內附工作。首任中華民國駐印度大使，為在印外交團團長，慶賀錫蘭獨立特使，又出席聯合國文教會代表等職。於三十八年二月回台灣任總統府國策顧問，中央黨史委員會主任

委員。四十一年選任考試院副院長。著作：中文有《新人生觀》、《新民族觀》（上冊）、《文化教育與青年》、《科學與玄學》、《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黑雲暴雨到明露》、《疾風》、《耕罷集》、《滇黔寄興》、《西北行吟》等等，譯著有《思想自由史》、《近代獨幕名劇選》等。計已出版者十四種，其《新人生觀》一書現已印至二十九版。中文學術論文散見於國內及各國學術刊者甚多，並當選為美、法、德各國歷史等學會會員。」

以上為羅家倫先生手書之自傳，除二、三處塗改難以辨認外，其餘均屬一目瞭然，可知羅氏在教育界工作為時頗長，尤以出任首任清華大學校長最足稱道，當年清華大學有王國維、陳寅恪等四大導師，羅家倫先生能出長清大，其學術成就必然能孚眾望。

羅家倫先生曾親赴西北考察及任新疆監察使，對西北各省（所謂西北各省，一般多指甘肅、青海、寧夏及新疆而言）實際情況必有深入瞭解，之後印度獨立，又為我國首任駐印度大使，按英、印向來對我國西藏懷有莫大之野心，始終要鼓動西藏脫離中國，羅氏駐節印度，適逢國共內戰方殷，西藏地方政府（噶廈）在親英印派掌控之下，印度雖在中華民國協助下，脫離英國宣告獨立，但立即承襲英國帝國主義思維，也想染指西藏，羅氏此際駐印，想必有極深之感受，因此曾撰著有關印藏之論，特具參考價值。

## 貳、羅家倫氏有關邊疆之論著

羅家倫先生一生經歷豐富，最後曾任國史館館長，著作既多、領域也廣，由於曾親歷西北、西南各省，對廣大邊疆地區，幾乎都曾涉及，其著作中有關邊疆者，為數不少，茲分為以下三部分加以介紹分析：

### 一、有關西藏部分

西藏在清代以前均稱吐蕃<sup>1</sup>，自西元七世紀、唐太宗李世民時始與中

<sup>1</sup> 關於西藏之稱吐蕃，可參看劉學鈞《藏族源流蠡測》，蒙藏委員會，1987年，該書列為蒙藏學術論叢之一。

原有綿密來往，唐曾以宗室女為文成公主嫁吐蕃松贊幹布贊普，唐、蕃雙方有了姻婭關係，這絕不等於吐蕃屬於唐王朝，當時唐、蕃確是兩個互不隸屬的王朝，這是史實，既無需也不能否認，這種互不統屬的情勢，一直維持到十三世紀，元朝建立後，吐蕃完全屬於元朝，元朝是中國正統王朝之一，所以元朝建立後，吐蕃就成為中國領土，這也是史實，同樣的無法予以否認，明朝建立後，雖不曾統治吐蕃，但吐蕃喇嘛教的八大法王，都是明朝所封，這些法王的稱號一直沿續到今天，可見明朝時吐蕃與中國的關係極為密切，這也是無法抹煞的史實，及至清朝，最晚在雍正（1723~1735 年在位）時，已將吐蕃納入中國版圖，而且也以西藏稱吐蕃，中央派有大臣駐藏辦事<sup>2</sup>，更在西藏重要地點派兵駐守，而且朝廷對藏地及喇嘛教的管理，都有成文的法規，納入《大清會典·理藩院則例》，是清朝的國內法，西藏之為中國領土，乃是不折不扣的事實，縱然晚至清末，清朝國力日蹙，列強侵略紛至沓來，英國謀我西藏日亟，但仍需與清廷談判藏事，足證西藏為中國領土，乃是舉世所公認者，試問英國之掠奪侵占馬來西亞，可曾與中國進行談判？美國之侵奪菲律賓，可曾與中國洽商？西藏之為中國領土實不容置疑，也無爭論餘地。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提出所謂西藏與中央為「供施關係」說，純屬無稽之談，一派胡言。

有清一代之「治邊政策」基本上是採民族隔離政策，此因滿族，本身是邊疆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後怕被人數眾多的主體民族漢人的「消化」，因此對邊疆地區各民族採優遇措施（如滿蒙聯姻大事封爵等，對藏族優寵喇嘛教等），但禁止與內地漢人來往，嚴禁學習漢語文，而且不在西藏、新疆、蒙古從事任何建設，同時在朝廷主管邊疆民族事務的理藩院不進用漢人，派駐西藏、新疆、蒙古地區的大臣、將軍、都統……也不用漢人，使邊疆各民族與漢人完全隔絕，無法產生民族融合，各邊疆民族與中原主體民族也無休戚與共的感覺，再加上朝廷漠視邊疆，其所派駐邊地的官員，忠勤幹練者少，瞞頂貪墨者多，於是邊事日蹙，及至清末，帝國主義者謀我日亟，英國對西藏志在必得，但十三世達賴喇嘛在俄羅斯所派受

<sup>2</sup> 關於駐藏辦事大臣之設置，可參看趙志忠《清王朝與西藏》，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 年。

過訓練的布里雅特蒙古喇嘛道爾吉（此人名字極多，可知其非善類<sup>3</sup>）入藏後以金錢賄賂藏地僧俗官員，謀得十三世達賴喇嘛（當時尚是孩童）的侍講，說白些就是負責照顧十三世達賴喇嘛飲食起居的工作，但是不可小覷這個職位，他可以跟十三世達賴喇嘛朝夕相處，夜以繼日的灌輸離中（國）、反英、親俄的思想，果真產生了預期的效果，因此英國謀藏落於俄國下風，遂想直接以武力侵入西藏逼其就範，清朝所派駐藏大臣對於英俄在西藏暗中角力，竟然全然不知，其尸位素餐可想而知，歷代邊政之敗壞，泰半出於邊臣疆吏之瞞預無能而又貪婪無厭。當英軍兵臨拉薩城下時，十三世達賴喇嘛率一批僧俗員（含其親信之道爾吉喇嘛）向北而逃經青海過甘肅而進入外蒙古，邊地官員竟然不知，自是也談不上加以攔阻，終於十三世達賴喇嘛一行順利進入外蒙古，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及清廷所派駐庫辦事大臣等予以盛大歡迎，朝廷自是始知達賴喇嘛逃到外蒙，但仍未作果斷處置，達賴之所以逃往外蒙者，其目的是要進入俄國接受俄人保護，但是年日俄在我國東北發生戰爭，俄國戰敗，遂不敢接納達賴進入俄境，只得逗留外蒙，但其人格特質異於常人，滯留外蒙庫倫（今烏蘭巴托）期間，與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積不相能，此際中英正為藏事進行談判，英國堅拒讓達賴返藏，此時十三世達賴喇嘛既無法進入俄境，又無顏續留庫倫，又不願返回內地，只得西走三音諾顏部（此部在土謝圖汗部之西，庫倫在土謝圖汗部境內，三音諾顏不稱汗），向該部蒙古牧民接受供養，其刻意滯留外蒙者，顯然對俄國仍有所期待，至此清廷始知事態嚴重，乃派博迪蘇、達壽二人為欽差大臣，以考察外蒙牧業為名，帶有馬隊三十人，進往外蒙力勸十三世達賴喇嘛返回內地，且奉「密諭」內容似為「達賴果不歸藏，即便宜行事」<sup>4</sup>，達賴不得已只好返回內地，中英談判尚在進行，英國仍堅拒達賴返藏，只好暫時在青海塔爾寺駐錫，但其性格怪異，又與塔爾寺主阿嘉呼圖克圖不睦，清廷為息事寧

<sup>3</sup> 關於道爾吉其人詳情可參看王遠大《近代俄國與中國西藏》，北京三聯書店，1993年，頁155~172。另周偉洲《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頁174~181。指其受俄國間諜訓練，可參看王輔仁、索文清《藏族史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頁156。

<sup>4</sup> 博迪蘇著有《朔漠紀程》，馬隊隊長著有《游蒙日記》，此二書於光緒三十三年以手抄本影響，在東京出版，1990年以影印列《清末蒙古史地資料薈萃》在北京出版，吳豐培為之跋，在《游蒙日記》之序中提到「即便宜行事。」

人，將阿嘉調往北京「當差」，乃座實達賴喇嘛鳩占雀巢，未幾達賴又秦請要到五台山禮佛，清廷復准其所請，並囑沿途各省官員以隆禮接待，清廷之對十三世達賴喇嘛可說是恩寵至極，達賴既到五台山，各國駐華使節、官員、商賈不辭辛勞，紛往五台山盼一睹喇嘛教中之「神秘活佛」，並遂行其分化陰謀，日本也從本土派人到五台山，都將十三世達賴喇嘛視為「奇貨」，其時九世班禪額爾德尼上書朝廷表示要進京陛見，詳奏近年藏地情況，事為十三世達賴喇嘛所悉，惟恐班禪入京會對他造成不利，遂立刻上奏朝廷也要晉京陛見，朝廷又屈從所請，並婉拒班禪入京。達賴入京後，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曾與之有所接觸，達賴為急於返藏，遂一改反英立場，從此向英國一面倒，未幾歲次辛亥，武昌首義，民國成立，十三世達賴喇嘛在拉薩進行驅漢事件，民國二年更與外蒙簽訂所謂《蒙藏條約》互相「承認」彼此「獨立」，其與中央漸行漸遠，全面倒向英印政府，此種離心離德作為，行之十有餘年，及至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國家趨於統一，民國十八年（1929 年）後，十三世達賴喇嘛似已有所覺悟，漸與中央有所來往，但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已為親英派分子所把持，及至 1933 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中央得悉立即表示將派大員入藏致祭並頒贈「護國弘化普慈圓覺大師」封號，此為民國以來中央首度派大員入藏（時派黃慕松入藏）；時藏地已由熱振呼圖克圖擔任攝政，熱振雖有意與中央維持並增進良好關係，但親英分子掣肘，進展不大，其後熱振更遭親英分子毒害而死，至此親英分子全盤控制藏地政局，其幕後則為英人黎吉生（其時印度已獨立，但仍任用黎吉生），印度甫擺脫被英國殖民的枷鎖，立即戴上殖民西藏的面具，想要繼承英國對西藏的掠奪所得，而此際國共內戰方殷，國民政府明顯居於劣勢，印度指使黎吉生指揮西藏地方噶廈政府演出「驅漢」事件，時為 1949 年七月十三日，時羅家倫先生正駐節印度，能瞭解近代漢藏關係背景，介析羅氏有關西藏之論著始有意義，羅家倫的文存收錄三篇有關西藏的論著，茲分別介析如次：

#### （一）拉薩叛亂與印度外次梅農的三次談話

所謂「拉薩叛亂」，就是指 1949 年七月十三日所發生的西藏地方噶廈政府驅逐在藏的漢人事件，這三次談話分別是七月二十三日於印度外交部、七月二十六日在中華民國駐印大使館、七月三十日於印度外交部，這

三次談話全文原輯入吳俊才所著《印度獨立與中印關係》一書（於 1950 年八月出版），現輯入《羅家倫先生文存》，頁 750~754，第一次談話是在拉薩驅漢事件發生十天後，此一事件是指印度政府所雇用的英人黎吉生一手導演的醜劇，他曾對噶廈政府的外交局長及有關官員扎薩柳霞·土登塔巴、扎薩索康·旺欽次登說：

「拉薩有許多共產黨的人，留他們在這裡，將來就會充當內應，把解放軍引進來。」

二扎薩聽後大吃一驚，急忙問：

「我們不知道拉薩有共產黨，他們在那裡？」

於是黎吉生就說出了不少人的名字和住址<sup>5</sup>，從而可見整起事件根本就是黎吉生一手主導，誣指中央所派駐藏辦事處人員、拉薩小學教職員、其他在拉薩漢人都是共產黨，然後以此恐嚇噶廈政府外交局說留下在藏漢人，會引來中共軍隊入藏，所以「驅漢」就成為當時第一要務，黎吉生與印度政府套好了招，把在藏漢人分為以下類：

甲、中國共產黨人。

乙、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繫的國民政府官員。

丙、其他中國官員。

丁、其他中國公民

而印度政府表明只接受上列甲、乙兩類人進入印度<sup>6</sup>，試想當時幾乎席捲整個大陸，在藏漢人除了向南逃往印度，否則只有等候西藏地方政府的屠殺（西藏僧俗高層殺人向不手軟，而且方式極多，之前貴為攝政的熱振呼圖克圖都會在一夕之間暴斃），或者被中共「解放」，但想要向南進入印度，只有承認是共產黨人或與共產黨有聯繫者（印度只讓這兩種人入境），按求生是所有生物的本能，於是在藏漢人只得承認自己是上述甲、乙兩類之一，這樣就證實黎吉生所稱是真，而拉薩的「驅漢」行動也有了

<sup>5</sup> 見土丹達旦《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簽訂前後》一文，該文輯入《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頁 31~35，但此處係轉引自祝啟源《中華民國時期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48。

<sup>6</sup> 見譚·戈倫夫著、伍昆明、王寶玉譯《現代西藏的誕生》，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0 年，頁 114。

正當性，這一招可說是刀切豆腐兩面光，似乎只有老牌帝國主義的官員始能有此能耐，我駐藏辦事處人員及在藏漢人就在這種情形下，被迫離藏，翻越喜馬拉雅山走向印度，當時羅家倫大使於 1949 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印度外交部與其次長梅農就此事展開對話，茲將其重要部分引錄如下：

羅家倫：想必梅農先生早已知道了拉薩叛變的事情（按即「驅漢」事件。）

梅農：知道一點，不太詳細（梅農顯然睜眼說瞎話，黎吉生一手策劃之事，印度外交部豈有不知之理）

羅：黎吉生難道沒有詳細報告印度政府嗎？

梅：他有電報來，說西藏以中國政府駐西藏辦事處中有共產黨份子，令其出境。來電中確切說有共黨份子。

羅：是指少數人，還是指全體？

梅：是指少數人，並非指全體。

羅：我不相信駐藏辦事處人員之中有共產黨，前兩個禮拜沈宗濂經過德里（按沈宗濂曾於 1943 年十月出任駐藏辦事處處長），我和他談及駐藏辦事處情形，他說他們都是派赴西藏許久的人，我認為就是有一、二共產黨在內，也決不應該牽涉全體。牽涉全體顯然是別有作用，我想印度政府不會相信誣賴的理由，我不是共產黨，我不願意共產黨滲透在西藏，同時，我更不願意共產黨滲透在印度。但是我請你注意，辦事處人員都是中國政府的官吏，他們在印度境內的時候，應該享受友邦官吏的待遇，若是其中有共產黨的話，也應當先由我負責調查，然後再報告與中國政府請示辦理。

從這次談話內容來看，雙方會晤可能不會超過二十分鐘，羅家倫最後一段話可以說是擲地有聲。第二次梅、羅談話是在七月二十六日，梅農前來我駐印大使館，與羅家倫大使有如下一段話對：

梅：我最近接到黎吉生的電報，謂陳錫章（駐藏辦事處代處長）於本（七）月十八日在印度駐拉薩商務專員處赴副代表

郭卡勒的餞別宴，十九日完成各處辭行的手續，二十日離開拉薩，陳離開拉薩時，空氣至為融洽友好，西藏政府並且派有儀隊送行。

羅：梅農先生，究竟西藏政府要逼達辦事處人員是甚麼意思？

梅：西藏政府不免有點神經緊張，怕馬步芳被共產黨包圍，向西藏退卻。

羅：若是如此，那矛盾極了，西藏政府一面怕共產黨，一面不惜與反共的中央為敵，我覺得有點莫明其妙。（羅此時將他二十五日對報界的談話稿給梅看，他對「在高原的巖石上釣莫須有的紅魚，無寧太幼稚而天真，而且在政治上太不聰明」一句，特別帶笑地唸了兩篇（篇，應為遍之誤）。

梅農隨後即離去，但走到門邊時忽然又提起來說：

「西藏這麼多共產黨來，我們不知怎麼辦，因為加爾各答的麻煩已經夠多了，我們不願意再增加麻煩。」

羅：請你和印度政府不要相信一個愚笨政府假造出來的理由。（這裡「愚笨政府」應是指西藏地區噶廈府政）

梅農與羅家倫這一段對話很簡短，梅農還是認為駐藏辦事處人員都是共產黨，其所以堅持如此愚蠢不通的說法，只是為了補強驅逐在藏漢人的理由，但羅氏提出西藏地方政府既恐共，何以又不惜與反共的中央為敵？這使梅農無以為答，梅農只好又以西藏政府提出怕馬步芳被共產黨包圍後向西藏退却，換言之，西藏地方政府之所以「驅漢」，實由於這一原因，其實馬步芳是否會向西藏退却，與駐藏辦事處之是否留在拉薩，可說是風馬牛不相干，梅農替西藏地方政府立說，似乎忘了打草稿。及至七月三十日，羅大使又到印度外交部與梅農三度對話，此次所談內容較多，此處無法照錄，但羅大使特別提到數日來印度報紙屢次登載所謂權威方面消息，其主要內容就是否認中國對西藏擁有宗主權，雖然英國侵掠西藏，至少還承認中國對西藏擁有宗主權，沒想到甫脫離英國殖民剝削桎梏的印度，立刻就披上帝國主義的外衣，做出較其原先殖民主子更惡劣的行徑。羅大使

就印度報紙所登載之事詢之，梅農吞吞吐吐顧左右而言他，羅大使最後只好以中印兩個民族間的感情需要維持以結束談話。

從以上所引羅、梅三次談話，可以明白看出印度想趁國共內戰而國民政府又告節節失利，判斷中共未來未必有意或有實力進入西藏，乃趁此混亂之時，慫恿藏中親英分子，先將象徵中國在藏行使主權的駐藏辦事處人員迫使離藏，再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對西藏擁有宗主權，此等作法相當狠毒，羅大使在三次對話中，都反擊了梅農。

## (二)《揭開中印間有關西藏的幕》

這是一篇專文，但篇幅頗大，約有一萬七千字左右，最初刊載於《自由中國》半月刊第三卷第七期（1950年十月一日出刊），其後收入羅氏所著《交響樂的震盪》一書（台北雲天出版社，1971年，頁49~57。在文末羅氏自注完稿於1950年九月二十二日，時距拉薩「驅漢」事件僅一年又兩個月），在這篇專文中，詳述藏漢之間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建立了友好和平的關係，然後指明「清朝完成統一的工作，西藏更是中國不能分解的部份」，之後詳述英國對南亞次大陸的掠奪，更進而染指我國西藏，較值得重視的是，羅氏在專文中指出中英西姆拉會議中，中國代表陳貽範只是在草約上面簽下他西文拼的姓名開頭兩個字母（就是他的名字的縮寫，這在英文裡叫做 Initialed），這不能算是正允許、事後經過立法機關通過，最後由政府公佈，才能生效。羅氏這段話，尤其是只在草約上簽下姓名開頭的兩個字母，根本不算是正式簽字，這替陳貽範洗刷了許多罵名。

羅家倫這專文共分五段，在他撰著之時，距西藏地方政府「驅漢」事件才一年多，而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也剛遷到台灣不及一年，一切都還在混亂之中，很少人會對此一事作深入的探討，但事件發生時羅氏適在駐印大使任內，不但人在印度，而且還派使館秘書到噶倫堡邊界迎接從西藏出來的駐藏辦事處人員及其他在藏漢人，當年（1949年）八月底羅氏親自到加爾各答和駐藏辦事處人員見面，「並且代表國家給他們一點小小却是很悲痛的安慰」。九月初，羅氏把他們送上掛著中華民國國旗的招商局的海地輪船回國，所以羅氏雖然人未在拉薩，對於拉薩的「驅漢」事件，等同親身經歷。在這篇專文的第三段，羅氏於印度的對藏政策，有相當深入的剖

析，羅氏說：

「要把印度的邊境推擴到希馬拉雅山以北，這是當年英國營經印度時代的既定國策，印度雖然痛罵英國帝國主義對印度的侵略，却認為英國帝國主義處心積慮之所得，是印度不可分割的遺產，印度是大英帝國這一切權利的繼承人。」

這一段話把印度對西藏的野心掀了開來，很值得所有中國人注意，因為一般人總以為印度沒有也不會有向外擴張的野心，錯了，印度的野心絕不比英國小，羅家倫這一篇專文很值得一讀再讀。

### (三)《中印間關於西藏問題的幕內證件》

這篇專文篇幅更大，約有二萬四千字，大部分完稿於 1949 年八月三十、三十一日，當時羅氏還在駐印大使任上，為了要協助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人員回國，所以到加爾各答，文章寫於有駐加爾各答領事管。來台後，補列了許多「幕內證件」，首刊於台北《自由中國》半月刊，第四卷第三期（1951 年一月十六日出刊），同樣的後來也輯入《交響樂的震盪》一書。這篇專文分四段，附了許多頗為罕見的「幕內證件」，對研究近代藏、印史的人來說，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

在專文首段，羅家倫先生指出：

「印度急於承認中共是為了西藏問題。」

這短短的十五個字，把印度對西藏的野心完全掀了開來，確屬真知灼見，按印度的構想，要讓中共與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印度的新德里舉行談判，如此一來，印度就可以左右西藏代表而從中漁利（當時西藏地方噶廈政府當權派幾乎清一色親英、印分子），然而中共並沒有如印度之願在新德里開會，而是由中共主席毛澤東與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藉答復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喜饒嘉措大師電文之便，在電文中宣稱：

「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能滿足西藏人民的這個願望（指和平解放西藏）。」<sup>7</sup>

<sup>7</sup> 此項電文見《待解放的西藏》；《新華時事叢刊》頁 1，此處係轉引自劉學鈞、葉伯

中共決定進軍西藏，這一點完全出乎印度意料之外。「印度急了，除了若干天的報紙上發表的慌張言論而外，還有三次正式的備忘錄交給中共政權，不特是『印度政府對此深表遺憾』而且是『最為驚異與遺憾呢！』」（括號內係羅氏原文），印度政府的「驚異」也好，「遺憾」也罷，似乎沒用對地方，近年美國攻打伊拉克以及派特種部隊進入他國領空領土獵殺賓拉登，並未見印度政府表示「驚異」或「遺憾」，可見當年的驚異與遺憾，乃是眼見將是囊中物的西藏，被中共捷足先登而發出的感歎。

羅氏在這篇專文中附了一張《邊藏劃界形勢圖》並註明該圖係根據陸興祺氏所著《西藏交涉紀要》一書中附圖繪製，讓原已湮沒於舊書的此圖，得以重見天日，也使今天對研究清末民初中英西藏交涉有明確的地圖可供參考，可說是彌足珍貴。

專文第三段詳述中央駐藏人員被迫離藏經過，這在當年（羅氏之文發表於 1951 年）乃是首次談到我駐藏辦事處被迫離藏的文章，就六十多年前的情況來說，可說是近乎「第一手」資料，自有其學術研究上的價值。這篇專文的第四段有如下的一段敘述，對當年印印度的作為給予嚴厲的批評，茲將該段文字甲錄如下：

「印度為了西藏問題不但承認中共偽政權，而且在成功湖上賣了許多死力要想把她拉入聯合國，尤其是安全理事會，但是結果怎麼樣呢？去年（按係 1950 年）十月間印度正在大扶中共的時候，忽然消息傳來，中共的部隊已經由西康進兵西藏了。（其實…）這一聲晴天霹靂把印度政府搞恐慌了，他於十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和十一月一日連送三個照會給中共偽政權，表示『深切的遺憾』，示『可悲歎』，可是中共偽政權對他的復文非常強硬，非常不客氣，認為『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的一部分，西藏問題完全是中國的一個內政問題』，又回過來打一個嘴巴道：他們『對於印度政府認為可悲歎的觀點不能不認為這是受了西藏方面與中國敵對的外國勢力的影響，而表示深切的遺憾。』這個嘴巴打得印度有苦說不出。引得旁的國

家冷笑道：『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我們可以再補一句道：

『豈祇今日還有將來』！」

前面提到中共決定進軍西藏，印度表示驚異、遺憾，發表了三個備忘錄，這三個備忘錄全文都附在專文之末，頗參考價值。按羅家倫先生原非研究邊疆問題的學者，但以職務關係及興趣所在，對西藏問題有以上三項記載及論著，都具有很大的學術價值。

## 二、有關新疆部分

新疆是後起之名稱，清乾隆（1736~1795 年在位）平定準噶爾之亂，之後進入天山以南平定回部後，將天山南北納入版圖定名為新疆，此前均稱之為西域，而西域又有狹、廣二義，狹義之西域，僅指今我國境內天山南北即新疆之地，廣義之西域，除狹義之西域外，兼指今中亞五國之地，甚至更遠之地<sup>8</sup>，自遠古以來就與中原有所往來，近年發掘的商代武丁（約為西元前 1271~前 1231 年在位）之妻「婦好墓」<sup>9</sup>出土了數百件產於于闐玉石飾品，足證最晚在西元前十三世紀西域與中原已有往來，否則于闐（今和田）玉不可能憑空飛來中原，晚於商武丁三百多年，西周穆王姬滿（西元前 976~前 922 年在位），相傳由造父所駕八駿之乘，西遊崑崙至於西王母之國<sup>10</sup>，再晚至戰國時楚國屈原（西元前 343~前 285 年？）於其傳世巨著《楚辭》中，曾兩度提到崑崙，一次且明白指說崑崙之玉，其一在《九歌·河伯》：「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浩蕩。」另一次則是在《離騷經》：「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再晚百餘年漢武帝時（西元前 140~前 87 年在位）更正式派張騫出使西域其所見聞，詳載於《史記》〈大宛傳〉，此後僧侶之往天竺經西域者，更是史不絕書，西域（指狹義之西域，也即今之新疆）與中原有綿密往來，史冊均有詳載，兩漢且置有西域都護之官，以統西域各綠洲國家，唐代更直接將西域納入版圖，設府置州，與內地同，唐末天下大亂，西域雖仍尊重中原王朝，時有貢使往來，但已非中原王朝版圖，兩宋時情況亦

<sup>8</sup> 見余太山主編《西域通史》河南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1 註 1。

<sup>9</sup> 1976 年，大陸社科院研究所安陽工作隊發掘出殷墟五號，即「婦好墓」。

<sup>10</sup> 有《穆天子傳》傳世，全文輯入《漢魏六朝筆記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然，惟遼朝滅亡時，有遼宗室耶律大石者，經漠北入西域建立西遼王朝（西方文獻均稱之為「喀喇契丹」，意為神聖或純潔契丹），將中原文化帶入西域，據法人勒尼·格魯塞（ReneGrou-sset）所著《草原帝國》稱西遼宮廷使用漢語文（魏英邦譯本，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86）。其後蒙古崛起，西域成為察哈台汗國所在，明成祖朱棣曾派陳誠多次出使西域，清乾隆剿滅準噶爾後，將狹義西域納為版圖，名之曰新疆。

新疆位處亞洲大陸中心，從我國歷史長河中得知，歷代中原王朝如能有效治理新疆（清代以前稱西域），必為強盛之朝代，且必威震今中亞地區，反之，必為弱勢朝代，史籍所載斑斑可考。但自十九世紀以來，英、俄為爭奪中亞之控制權，莫不千方百計想染指我新疆地區，其所以如此者，需從地緣政治看，如果從中國甘肅向西看直到裏海東岸，正像一把扇子，河西走廊與新疆就是扇柄，能掌握新疆就有可能掌握中亞，而中亞又為歐亞大陸之心臟，能掌握此一心臟地區，在歐亞大陸就能擁有優勢，俄羅斯自十八世紀以來先後蠶食鯨吞了哈薩克大小中三個玉茲，接著南下中亞兩河（錫爾河、阿姆河）河中地區，等於控制了後日的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吉爾吉斯、塔克吉克五個地區，更有向南亞發展趨勢，但南亞次大陸印度已為英國殖民地，而阿富汗也在英國控制之下，伊朗部分地區及部分巴基斯坦都在英國掌控之下，因此新疆就成為英俄兩國覬覦之目標，此實地緣使然。

清朝隆自將新疆納為版圖後，採民族隔離政策，既不准漢人出關墾殖，也不准漢人參與邊疆民族事務工作，也禁止維、哈各族學漢語文，使新疆與內地形同隔絕，而所派總統新疆軍政事務之伊犁將軍、都統、參贊大臣……領隊大臣等官員，固有不少忠勤幹練者，但瞞頂無能貪婪無厭者更多，尤其重要者，有清統治新疆一個半世紀（乾隆二十五年至宣統三年（1760~1911年），幾乎未在新疆從事建設工作，也未曾創辦一所學校，中國內地原已落後於歐美日本，而新疆又遠落後於內地，新疆之於內地，既隔閡又落後，自無法與內地主體民族漢人有休戚與共之心理，自是極易為外人所蠱惑，復以新疆維吾爾、哈薩克、烏孜別克、塔吉克…等均為跨境民族<sup>11</sup>，其主體在我國者為維吾爾；哈薩克等操突（厥）回（紇）語之

<sup>11</sup> 跨境民族或作跨國民族、跨界民族，雖然三個辭稱各有不同界說，但大致都為一個

各民族，其主體均在國境之外，且均為穆斯林，這種複雜的民族關係，使新疆問題難於處理，遜清末造對新疆成為英俄競逐標的可說是一籌莫展。

及至民國肇造，實力薄弱，對遠處西陲之新疆，更是鞭長莫及，自民國元年以至抗戰末期的三十三年間（1912~1944），新疆先後被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等人所掌控，表面上雖仍尊重中央，但中央力量根本無法進入，尤其盛世才主新時期，一面倒向蘇聯，對漢、維、哈、蒙…各族上層人士任意逮捕入獄，甚至橫加殺害，民怨衝天，其恐怖統治，中央竟對之莫可奈何。及至抗戰末期，德軍攻入俄境，蘇聯節節戰敗，盛氏眼見蘇聯已不可恃，而日本侵華之戰已逞強弩之末，抗戰勝利已漸露曙光，盛世才盱衡利害，遂改弦易轍投向中央，但其治新時期之恐怖手段，已造成維、哈各民族離心離德，兼以英、俄刻意培植豢養維、哈等邊族青年，鼓動脫離中國。而其時又有所謂「泛突厥主義」、「泛伊斯蘭主義」之雙泛主義興起，所以盛世才雖回歸中央，新疆情勢較前更為險惡。中央既收回新疆統治權，且先後以朱紹良（字一民，羅家倫文中均稱之為一民，其主新為時極短）、吳忠信為新疆省主席，但情勢並未好轉，「三區革命」隨時爆發<sup>12</sup>，吳忠信手中無兵，只得出以安撫，但未能見效，吳主新僅一年餘，即由張治忠以西北行政長官兼新疆省主席，張治忠一力主和，由是「三區」氣焰益形猖狂，幾至不可收拾。羅家倫先生於盛世才主新後期任新疆監察使，曾於 1944 年（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底）到新疆，暫住新疆省政府，時盛世才尚未交卸省主席及邊防督辦，仍有許多漢、維、哈、蒙……各族高層人士被盛世才關押在牢獄，羅氏對新疆特為關心，實為事理之所必然。就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所出版之《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二冊《四、邊政與外交》項下，收錄有關邊政者共有十六篇，其中就有

---

民族跨越兩個國家，只是聚居地區有相連或不相連之差異，詳情請見：胡啟望〈跨境民族初探〉，該文載於馬啟成、白振聲《民族學與民族文化發展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頁 127-128；申旭、劉稚，《中國西南與東南亞的跨境民族》，雲南民族出版社，1988 年；戴慶廈，《跨境語言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 年；金春子、王健民，《中國跨界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年；鄧敏文，《中國多民族文學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 年等書。

<sup>12</sup> 所謂「三區革命」是指在蘇聯幕後指使下，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區發動建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事件，詳情可參看潘志平、王鳴野、石嵐《“東突”的歷史與現狀》，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年。

十篇與新疆有關，茲將此十篇文章標題引列如下：

- 《關於在新疆被逮中央人員之意見》
- 《關於新疆最近軍事政治之意見》
- 《新疆最近情況報告》
- 《新疆對蘇外交及經濟合作之建議》
- 《整理新疆財政之方案》
- 《關於中蘇新約中之新蒙邊界問題》
- 《泛論新疆——一個檢討》
- 《悲憤話新疆》
- 《一點應盡的責任——救濟由新入印忠貞同志經過》
- 《天山逸史零篇》

以上這十篇文章幾乎都與近代史有密切關聯，茲參酌相關史料或論著，對這十篇文章擇要加以析論。

#### 《關於在新疆被逮中央人員之意見》

此文可能撰於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底，按盛世才於 1942 年（民國三十一年）春眼見蘇聯與德國之戰，節節敗退，瀕於覆滅，已不可恃，於是有意放棄蘇聯歸向中央，先派其弟盛世驥到重慶重謁蔣介石委員長，探詢歸向中央的各種情況，據稱蔣委員長親自接見，並稱：

「過去中央和盛督辦的誤會，都是汪精衛搞出來的。」<sup>13</sup>

以此打開新疆與中央的多年隔閡，盛世才之回歸中央遂成局，同年（1942 年）七月，中央派與盛世才頗有私誼的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入新，與盛世才作進一步的接觸與確認，盛表示「誓以至誠擁護鈞座（指蔣介石委員長）與國民黨領導，效忠黨國。」<sup>14</sup>於是國民政府中央在是年八月由蔣介石親自坐鎮蘭州，更西至嘉峪關，八月二十九日，由其夫人蔣宋美齡前往迪化（今烏魯木齊），讓盛世才之轉向中央拍板定案；但盛世才猜忌成性，個性變幻難測，就在確定歸向中央時，下令逮捕大量國民政

<sup>13</sup> 見盛世驥《蔣介石的封疆大吏——我家大哥盛世才》，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0 年，頁 176。

<sup>14</sup> 見黃建華《國民黨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年，頁 68，黃氏在此句下注稱引自《蘇聯對新疆之經濟侵略》，此段注釋，見頁 82~83。

府、國民黨在新人員，如阿不都拉、廣祿、張志智（以上三人後均來台，並為第一屆立法委員，更發起成立《中國邊政協會》）、丁慰慈、林繼庸、童世荃、宋念慈（曾任《中國邊政》季刊主編多年）、顧耕野、黃如今、林伯雅、屈卓吾等數十人，其所以如此，顯然是想把這一批作為人質，以增加作為與中央談判的籌碼。羅氏其時適在新疆，認為被捕者「均忠實不移之同志，此次身陷黑獄，有慘受非刑至八、九種者，務懇中央予以安慰及調劑，……」此一看法相當妥適。上列阿不都拉、張志智、廣祿、林繼庸、童世荃等人後來均出任行憲後第一屆立法委員，丁慰慈仍回外交部任職，上述諸人由於這一段「新疆經驗」，都成莫逆之交，而且深感邊疆對國家的重要性，來台後仍結合蒙藏民意代表如李永新、劉廉克等十餘人及學界胡耐安、芮逸夫等多人，籌組「中國邊政協會」，從事邊疆研究並促進內地對邊疆各民族及邊疆史地之瞭解，時為 1953 年，十年後，又創辦《中國邊政》季刊，以至於今（2017 年），協會至今已超過一甲子，而季刊也超過半世紀，筆者為該協會秘書長（2006 年~）、季刊主編（1987 年~），因此與上述諸賢達先進均頗熟稔，可惜歲月不居，目前除阿不都拉先生仍健在外（已高齡九十八，筆者師事之也超過半世紀），餘均仙逝，回溯往事不勝感慨。

#### 《關於新疆最近軍事政治之意見》

這篇文章是羅家倫任新疆監察使對當時（1944 年冬）新疆局勢的報告，羅氏曾在新疆三年，1944 年末吳忠信入主新疆時，已爆發所謂「三區革命」，羅氏在報告中稱之為「伊犁戰事」，按吳忠信（字禮卿）奉命主新時，在赴新途經蘭州時（1944 年十月一日），特先轉往青海西寧會見馬步芳（字子香），此蓋吳禮卿先生預估未來新疆必有需要馬子香軍隊協助之處<sup>15</sup>，吳氏思慮周詳於焉可見，以是可知當年新疆幾無可用之兵。而「伊犁戰事」在外力（實際就是蘇聯，以及在蘇聯卵翼豢養下的外蒙古）支援下，聲勢頗壯，在這種情況下，羅家倫先生認為以外交方式處理，乃「為釜底抽薪」之法，羅氏在報告書又稱：

「蘇聯代總領事（此人係蘇方特工人員）對卜道明司長雖

<sup>15</sup> 見吳忠信《吳忠信主新日記》。

有『經濟合作成功其他無問題』之泛語，但不可過於重視，因蘇方一貫國策未容改變。」

按當時新總領事為葉謝也夫，羅氏指稱其為「係蘇方特工人員」，此種說法，以羅氏之學者性格與政治地位，必有所據，而此點在《吳忠信主新日記》及《張治忠回憶錄》<sup>16</sup>均未見提及，是可見羅氏對人事觀察之入微。進而羅氏認為以當時新疆情形，部隊之機動性必須增強，並建議：

「目前中央入新軍隊均係步兵，尤須立為添配炮位及騎兵進入伊寧，…青海騎兵勇悍耐寒，在該省與哈薩（克）作戰，其騎術差堪比擬，祇將青海騎兵調一師用汽車運新，再備馬匹，俟其立功後即行調回……」

這種看法，吳忠信在入新之初，已預作部署，可見羅、吳兩人對新疆在軍事部署上，可說是英雄所見略同。但在政治方面，羅、吳兩人出入頗大，羅氏認為：

「新疆政治應與軍事相配合，防患未然，政治甚且重於軍事；現在新疆人民對省府不免有失望之處，物價飛漲不能控制一也；糧食不能調節二也；太重手續，處事頗覺遲緩三也，…吳主席有長者之風，但各廳長似不健全，如民政廳長巡視伊犁，儘聽酬酢席上敷衍之詞，……謂伊犁絕無問題。但七日即大變已作。」

羅氏對新省建設廳也頗有微詞。按吳忠信於 1944 年十月四日始到新疆，在不及六十天之內各項施政自不能盡如人意，況且民政、財政兩廳長均為中央所任命，又吳氏為人謹慎謙虛，僅帶四人入新<sup>17</sup>，羅氏之指陳必有所據，對吳氏而言，則是相當無奈。

### 《新疆最近情況報告》

此一報告分：軍事情形、政治情形及應付之辦法三項；其中軍事情形除說明南疆陷入危急狀況外，盛讚由青海入新馬步芳之騎五軍軍紀頗好，

<sup>16</sup> 《吳忠信主新日記》卷首。

<sup>17</sup> 《吳忠信主新日記》卷首。

士兵亦精壯，口碑尚佳，這一點為其他文獻之所未見，頗值重視，也還青海馬家軍一個公道，按以往國軍軍紀始終為人民所詬病，在我國歷史長河中，軍隊如能秋毫無犯，即可譽之為「王師」，青海入疆馬家軍軍紀頗好，相當難得。在政治情形方面，羅氏指稱：

「現在迪化省政府，除財政廳外，民、建、教三廳早已停頓，事實上無人到廳辦公；省府要員之妻妾乘軍機先走，秩序紊亂，民眾指摘尤甚……教育廳長令各校停課，並通令小學生徒步散至吐魯番……師範學校校長攜款五百萬元乘車逃走，為教職員截獲，……現迪化知識份子及民眾均有『政府不要我們了』之口號。新幣發行既無限制，……有以機關及私人名義匯至『吳文叔』之款達新幣二萬萬元<sup>18</sup>，……各地專員以阿山專員高伯玉表現最佳，竭力抵抗至彈盡援絕為止，聞現已被擄至庫倫；塔城專員平戎一聞槍聲，即逃入蘇境，而阿克蘇專員喬根，據航空檢查所消息，已投匪方（指三區革命陣營），…：」

以上所指新疆當時（1944年十一月初）情況，果而屬實（以羅氏之學養及地位絕不至無中生有），則已然到駭人聽聞地步，但在《吳忠信主新日記》竟然隻字未見，尤其報告中之「吳文叔」乃吳忠信之侄，果而接受以機關及私人名義匯款二萬萬元新幣，實屬極大之醜聞，惟據多方面資料，吳忠信之人品多有可稱道者，而羅氏之風格也絕不可能無的放矢，此事實有進一步查證之必要。至於羅氏提出應付之辦法，計有以下六項：

（一）匪方既有背景，而蘇聯又願作媒介，則談判自係釜底抽薪之策，但無論如何斷不可因一時困難，在事實上造成第二外蒙，致將來我方實力充分時，已成無可挽回之局。

（二）一方與匪方談判，一方與蘇聯仍當有外交上之進行，而蒲犁為通印度之要道，現已失陷，喀什又告危急，英方雖力量有限，心中亦必著急，故可與之暗中聯繫，相機運用。

（三）分省計劃，因南疆，全無漢人，而北疆漢人在伊塔等處者亦摧殘

<sup>18</sup> 吳文叔係吳忠信之侄。

殆盡，將來即分為省，亦無法治理，似宜鄭重考慮，以較緩辦理為是。

(四)新疆漢農與漢回皆習於騎術、氣候及地形，而且有生命財產關係，實能作戰，昔左宗棠所用之徐學功，即係漢農出身，在迪化山中作戰數年，本為左氏之大助，即其一例。從彼輩中編練軍隊，加以政治教育，實較由內地調兵前往為勝。

(五)挽回民心重整士氣，實為急切之要圖，在此時必須改革，省政不可以改組，而令原來失職瀆職之人卸責，如民政、教育兩廳廳長必須扣押查辦，軍官亦須如此，方足以一新邊民之視聽，使其重行認識中央。

(六)維族之所以較易統治者，因其無政治領袖，現在中央同志有主張其在中央之該族人士均回疆主持，然此輩中頗有分離運動者（如在大公報發表主張新疆為突厥斯坦即其一例），而且多係政客化，故此舉可詳加考慮。

羅氏所提六項應付辦法，其中最值注意者第一、第五兩項，其中第一項提醒中央勿使新疆步外蒙之後塵，按其時尚未論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法理上外蒙古仍屬中華民國固有之疆域，而羅氏似已預感到外蒙古終將脫離我國，可說是先天下之憂；至於第五項乃貫徹其報告中政治情形所提民、財二廳廳長有違職守，需予「扣押查辦」惜乎《吳忠信主新日記》未也此事有任何反應，言官批評行政部門施政，若未獲重視，國政就難求清明。

#### 《新疆對蘇外交及經濟合作之建議》及《整理新疆財政之方案》

在前一建議中，羅氏提出以下兩點特具意義：

「不可於有形或無形中認為新疆為蘇聯經濟勢力範圍，應以中國國家為對象，不可使其新疆地方當局為對象。」

這兩點至關緊要，因為牽涉到國家主權，地方不可以擁有外交權，稍有不慎極易成地方割據之局，幾乎同時西藏之設外交局，其意即在「獨立」，羅氏從宏觀角度一語道出對蘇經濟關鍵之點，令人敬佩。

#### 《關於中蘇新約中之新蒙邊界問題》

此文為條列式，全文雖不足五百字，但已指其中關鍵所在，文首羅氏即稱：

「在目前環境之下，能訂立中蘇友好同盟新約，實為難能之事，然中蘇新約之中，關於新蒙邊界依現有邊界（Existing boundary）一語，頗覺含糊，尤以新蒙邊界方面，我方可能吃虧太大。」

查這篇文章作於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中華民國受美、蘇、英所簽之《雅爾答密約》或稱《雅爾答協定》之害，由美國出面脅迫中國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即羅氏文中所稱之《新約》），約中規定：外蒙古現狀應予維持，換言之就是強迫中華民國承認蘇聯一手扶植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存在的事實，使中華民國軍民八年浴血抗戰、死傷數千萬人，雖收復三萬五千多平方公里的台灣、澎湖，卻喪失一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及唐努烏梁海，雖號稱抗戰勝利，這勝利的「果實」如何向歷史及後代子孫交待？羅氏「實為難能之事」，令人難以苟同，縱然迫於官場現實，不敢或不便指責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為不宜，但也絕不宜稱之為「實為難能之事」，此語含有褒義，割讓大片國土，使之脫離中國，有何可值得稱頌？試看兩千多年前，匈奴冒頓單于自立之初，鄰國東胡欺其得位不正，分次遣使向匈奴索要寶馬、美人（冒頓之妻），匈奴眾臣都認為不可予，但冒頓獨以「奈何與人為鄰，遂予之」（事見《史記·匈奴傳》），東胡食髓知味仍三度遣使向匈奴索要兩國之間不能居人之棄地（匈奴語讀「甌脫」），匈奴眾臣認為此乃棄地，可以予之，但冒頓認為「土地乃國家之根本」不可予之，遂出兵伐東胡，面對兩千多年前之冒頓，不知同意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廟堂諸公心中有何感想，以是對羅氏「實為難能之事」看法，不能苟同。但羅氏稱：「然中蘇新約中……我方可能吃虧太大」，則彰顯羅氏頗有先見之明，蓋清末已察覺俄國窺伺我外蒙古，而朝廷對外蒙古又無力有效控馭，於是有所謂「科阿分治」之事，也就是將阿爾泰從科布多中分出，按《大清會典·理藩院則例》所載：

「……逾大漠曰外蒙古，喀爾喀四部附以二，為旗八十有六。」

基此，無論在科布多之賽音濟雅哈圖左、右兩盟、或在阿爾泰之青塞

特啟勒圖一盟，都不屬於外蒙古範圍，《大清會典》等同清代之《六法全書》，科、阿之不屬外蒙古範圍，乃為法律所規定，縱然外蒙古喀爾喀四部，在清末以前也完全是中國的領土，如阿劃分，中央自有處理之全權，但以其時資訊並不發達，清廷對政令之宣導也未盡力，「科阿分治」（也即將阿爾泰從科布多中分出，改隸新疆）一事，喀爾喀四部（車臣汗、土謝圖汗、三音諾顏及札薩克圖汗四部）未必全然知曉，習於傳統認知以為科布多也在外蒙古的範圍之內，兼以塑造外蒙古獨立的蘇聯自然希望外蒙古的範圍越大越好，因此在外蒙古獨立後第二年（1947 年）六月，外蒙古軍隊在蘇聯飛機掩護下，向已屬於新疆的北塔山發動攻擊<sup>19</sup>，這就是由於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前，對新蒙邊界歷史變遷及實際情況認識不足所致，從某一面向看外交與邊政利害不可分，外交官員如不懂邊政，在與鄰國交涉時往往會吃虧上當，按在清咸豐奕譞十一年（1861 年）之前，一切涉外事務概由理藩院辦理，至咸豐十一年始從理藩院中將涉外事務移出另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責處理外交事務，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 年）七月，再改設為外務部，是可見外交與邊政關係至為密切，然而自清季以來，重外交而輕邊政，相沿成習，因此在與鄰國交涉或劃界時往往受害。羅家倫先生對新蒙邊界問題認為「我方須與蒙方在承認其獨立以前，將此項邊界劃清，方予承認。」可惜未蒙層峰採納，致有一年後的北塔山事件，羅氏能洞燭機先提出新蒙邊界問題，的屬有先見之明，許之為智者，誰曰不宜。

### 《泛論新疆——一個檢討》

此文可能撰於民國三十六年（1947 年）上半年，全文約有六千五百字，是一篇從多面向觀察新疆而後落筆寫就的，多為實際觀察所發現的問題，並提出解決建議，少有理論探討，當時「三區革命」仍在進行，羅氏稱參與者為暴徒，落筆雖嫌主觀，但事變之初，「三區革命者」在伊犁幾乎是見到漢人無論老少婦孺，一律予以殺害，稱之為暴徒乃是寫實，羅氏在文中稱：

<sup>19</sup> 關於北塔山事件，可參看劉學鈞《北塔山事件》，此文刊載《中國邊政》季刊第 195 期，台北中國邊政協會，2013 年 9 月，之後該文輯入劉著《正視紛爭下的新疆問題》，台北致知學術出版社，2014 年，頁 329~349。

「所以暴徒們採取的策略，也在乎使新疆省政府不能直接與新疆人民接近，第一步使政府陷於孤立狀態，第二步再利用他們文字語言上宣傳的方便，要人民感覺到凡是政府對地方對民生有益的設施，都是經過『我們』（按係指三區革命分子，也即羅氏所指的暴徒）向政府爭取得來的，使人民對政府逐漸起了對立的狀態，然後第三步便相機把中央所任命的省政府趕出去，以達到其『東土耳其斯坦』的目的，在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民不懂文字，無法向政府來解釋他們的意見的今日底新疆，因矇蔽的煽動來操縱一切是絕對可能的。

而在政府方面呢？第一，大多數在主管人員在文字及語言上，受到限制；第二，在心理及習慣上還脫不了內地做事的傳統，而不能了解邊民的現實心理；第三，從盛去職以後，帶來了傳統的、鬆懈的、臨時抱佛腳的散漫和遲緩，再加上交通運輸的不便，財力、人力、物力的不措手，以致取得民心的工作雖在執行，而不能有系統及積極的去做。」

羅氏這一段對當年新疆情況的描述，若非身臨其境，是無法作出如此生動的描述，不但入微而且透澈，羅氏提到到新的政府官員不知新疆維吾爾語文，因此宣傳工作無法落實，這點說明培養邊政人才的重要，沒有足夠適格的邊政人才（所謂邊政人才，語文為最基本的要求），而談「治邊」純屬河漢之言，而入新人員行政效率不佳，影響政府形象至大，對於此點，羅氏對盛世才的效率，頗為贊賞，稱：「在盛氏主新時候，那是絕端敏捷的，我們可以說省府及督辦公署沒有一件公事過三天還沒有辦的，主要文件他隨到隨批，……」羅氏這種不以人廢言的態度，絕對是一個稱職的監察使，中國官場最大的毛病就是遇事推、拖、拉、不講效率。接著羅氏又指出：

「三十三年（1944 年）秋盛氏去職後，中央派來的人，席不暇暖，即有伊犁事變（即「三區革命」），當時不思早日和平解決，拖成一個僵局，實屬錯誤，以一般不了解邊情的行政幹部，加上一部份想到新疆來躲避抗戰的，真是當頭一棒，時

時刻刻就想重返內地，所以一起首即形成了一個意志頹喪，遷延了事的局面，直到三十五年七月才算又復興起來，可是經此波折，其棘手的程度，不言而喻了。」

這一段分析再度凸顯了邊政人才的重要，而且對入新人員的心理分析更是言人所未言，羅氏有勇氣予以說出，實有古御史風骨，洵屬不易，這對研究新疆近代史者，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考方向。羅氏又對所見到新疆民政及行政效率、經濟、建設、教育與文化等方面，不僅乏善可陳，而且是弊端百出，每一指陳，都舉出實例以為佐證，此處只引原文一例：

「至於和闐（今和田）的民教館，有一個時期被一個漢族的敗類（主持者）變作賭場，每晚能收幾十萬新幣的頭錢。」

俗語說一斑可以窺全豹，可見當時新疆政風之窳劣，觀諸往史，邊事往往敗在惡劣的邊臣疆吏之手，很值得政府部門注意。羅氏對入疆國軍則頗贊許，羅氏在文中指稱：

「此後入境的國軍，那是最使人感到佩服而同情的，在衣不足、食不飽、地形不明瞭、部隊長依舊帶內地的陳腐習氣之下，這一種犧牲是可歎可泣。但是不習于嚴寒、不習于山地，又在抗戰凋疲之餘，也只能盡一分力算一份罷了。這一年來，新疆的國軍，已有國防軍的風度了，部隊的調整也嶄新了，很少到民間去混了，警覺性也加強了，祇要在服裝、營養、供應、補給上逐步下些工夫，是可以成為保護新疆的勁旅，而機械化却談不上。」

這顯然是對在疆國軍的誇獎。按此時在疆警備總司令是宋希濂，宋氏（1907~1993年）湖南湘鄉人，黃埔一期畢業，曾留日，治軍嚴格，態度強硬，有鷹犬將軍之稱<sup>20</sup>，後來因其態度強硬，張治中在與三區革命分子進行和談時，將之調走，改由陶峙岳接任警備總司令，據說統十萬大軍，數字看似頗大，但以新疆面積廣達一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區區十萬人，以言鎮懾，實屬力有未逮，如要為非作歹，則是一股強大力量，宋、

<sup>20</sup> 有關宋希濂詳情，可參看《鷹犬將軍——宋希濂自述》台北李敖出版社，1990年。

陶二人能把部隊帶好甚為不易，之後陶氏應張治中之請，響應中共「和平解放」新疆，這一批軍人後來都成為第一代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員，被編為建設兵團農七、八、十，三個師，陶氏則出任兵團副司令，當然這是後話，如羅家倫先生得知，必有相當感觸。

### 《悲憤話新疆》

這一篇作於 1950 年（民國三十九年）二月，此時羅氏已來台北，而大陸幾已全面失守，想來羅氏心中必有無限感慨，這篇文章羅氏以其在 1943 年在新疆迪化所作的《新疆歌》（共三段）作為文章的引言，為節篇幅此處只引其中第二首用供參考：

「新新疆  
我們中華民族的寶藏  
阿山金脈烏蘇礦  
油泉泛地底  
羊陣亂山旁  
名瓜傳哈密  
葡萄甜溢高昌（吐魯番古稱高昌）  
和闐綢托羊脂玉  
潤潔地好比冰霜  
更有那雲母含輝鎢砂亮  
都上在資源帳  
這富庶的寶藏  
夢也不能忘  
鞏固我天府的新疆。」

除三首詩歌外，全文約五千字，在文章起首羅氏稱在民國三十五年於上海的《京滬週刊》發表一篇有關新疆的文章，大意为：

「天相中國，給我們豐富的煤鐵和石油。天不相中國，把大量的煤鐵集中在東北，大量的石油集中在西北，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東北和新疆的危機，就在於此了。」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說得何其傳神，日俄垂涎我東北，英俄覬覦

我新疆，很大的原因是在意其地下資源，可是自清代以來採民族隔離政策，又沒有培植在地的維吾爾、哈薩克等世居民族人才，在內地也沒有培植邊政人才，清代自統治之始，就埋下後日新疆動亂種子。羅氏在文中提到「三區革命」時「伊犁的中原人口（按係指漢人）約一萬人在左右，十之八九被屠殺淨盡。」這是何等的殘酷，他在文章又提到：

「在三十七年（1948年）秋冬之間，有一件事不能不特別出的，就是張治中和蘇俄以前駐華武官後來改任大使的羅申，有一度秘密的勾結。張治和他商敬一個中蘇在新疆經濟合作的條約，要把新疆的有色礦產，一概交由蘇聯開採五十年，張治中極力要求兩屆行政院批准，終以當時外交部葉公超代理部長的極力反對而未能實行。這樣的條文真是荒謬已極。全部礦產的斷送，祇要這一句籠統的糊塗話就夠了（按指有色礦產）！除了純白水晶而外，其餘的礦產，那一種是沒有色的？」

羅家倫先生這一段話說得擲地有聲，也凸顯了張治中缺乏國家整體利益觀念，實有負於國家民族。羅氏在文章中還敘述了他駐節印度時，極力照料從新疆逃到巴基斯坦、印度的官員、人民，羅氏予以照料可稱得上是雪中送炭，讓這些度漠跋山逃出新疆者倍感溫馨。

### 《天山逸史零篇》

這篇文章大約有六千五百字左右，作於何時難於考訂，但可確定者是朱紹良於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到新疆後所撰，或更晚一些，此文主要敘述盛世才宣布回歸中央後，於三十三年四月又有一極大改變，大事逮捕新疆省政府內官員，這些人都是由中央所任命，如省府秘書長劉效黎、教育廳長程東白、新疆日報社社長宋念慈、至八月十一日深夜又逮捕伊犁行政督察專員徐伯達、建設廳長林繼庸、中國國民黨新疆省黨部書記兼教育廳長黃如今、省黨部委員張志智、驛運處處顧耕野、社會處處長童世荃、外交部特派員公署科長丁慰慈、省黨部委員林伯雅、師長柳正欣等，當羅家倫仍以監察使身份駐新疆迪化，其時迪化籠罩在一片慘霧愁雲之中，被捕人員眷屬紛紛到監察使署向羅氏拉泣訴，並請求營救，羅氏深知在當地營救無從著手，乃以鎮定態度對眾人說：

「且看盛世才敢侵犯本署否？若敢，則叛變之局已定，全體中央在新人員，勢將同歸於盡；否則，尚有挽回之餘地。」

羅氏臨危不亂，是所謂臨陣觀其勇，羅氏之分析至為正確，其所以作如此分析者，羅氏稱：「蓋深知盛氏尚未擾及使署，加害於我者，非為客氣，更無所謂交誼，祇因使署為中央統治權之象徵，而余有可以代表中央之身分，在彼尚未有決心對中央發動戰事以前，當不致採取此最後一步也。」羅氏之判斷至為正確，同時也反證盛世才之點慧。另一方面羅氏立即電告中央，八月十二日，盛世才之參謀長汪鴻藻致電羅氏稱盛督辦命渠向羅報告稱：「昨夜迪化曾經發生重大陰謀暴動案，形勢嚴重，今日下四時請監察使駕督署開會。」

羅氏在電話中立予拒絕，蓋羅氏認為：

「在當時情況下，不能不講體制，如彼將不利於我，我亦願此事發生在監察使署，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之下，因此（處）係余奉命駐節之所，亦即中央權威寄託之處也。」

勇哉羅家倫先生，之後羅氏復電報中央並陳述所見稱：「罪屬虛構，顯係要挾，一民兄（朱紹良）如能前來，局勢尚有挽回餘地。」羅氏指出盛世才之所以大事濫行逮捕省府官員，意在「要挾」實屬灼見。事有湊巧，羅氏致電中央時，朱紹良正在重慶，也正準備回蘭州，中央乃命其於八月十四日飛迪化，幾經轉折且中央已有若干部隊入新，如駐哈密之徐汝誠旅（徐氏來台後曾任陸軍官校校長），迪化附近老滿城也駐有預備第七師，聞迪化情勢有變（指盛濫捕之事），已作好作戰準備，且中央空軍也已集中若干飛機停在酒泉機場，凡此都對盛造成壓力，感到大勢已去，於是表示願意先讓出省主席位置，仍保留邊防督辦之兵權，但中央堅決不允，盛氏乃退而表示新任省主席就任後，尚須留下六個月，朱紹良未敢應允，稱必須飛渝請示於中央，於是朱紹良與羅家倫在八月二十一日同機飛重慶，當然前此被逮捕關押的張志智等夕人均無罪釋放，中央更決定派朱紹良於九月八日暫代新疆省主席，至此算是徹底解決了盛世才問題，也是民國創建以來真正由中央派任新疆省主席，時為 1944 年。羅氏此文揭露頗多第一手資訊，對研究新疆近現代史至有助益。此外據相關文獻稱盛世

才離開新疆時運走一百三十五卡車的「行李」<sup>21</sup>，可見其在新十二年搜刮之凶狠；另有傳言指盛世才曾以八十二卡車之黃金贈送蔣介石，蔣氏交中央銀行運台，筆者曾以此事請教《新疆風暴七十年》一書作者張大軍先生（張曾于役新疆多年，筆者請教之時，張已高齡九十五歲），張氏稱並無此事；筆者又於 2012 年一月二十六日，向業師阿不都拉先生請教（阿係新疆維族學者，曾任首屆立法委員，並在政治大學教授維吾爾語文，時已高齡九十三歲）承告確有其事，更指出另有白銀五百萬兩。如以其離新時「行李」多達一百三十五卡車觀之，則以八十二卡車黃金白銀贈送國民政府並非不可能之事，此雖題外，但頗為重要堪值一提。

### 三、有關蒙古部分

「蒙古」一詞，初為民族稱謂，後延伸為地理稱謂，前者如蒙古族，後者如內蒙古、外蒙古、蒙古高原等。如要詳細解釋「蒙古」，可以寫成一篇篇幅頗大的專文，非本文之所能、所應容納，從略，羅家倫先生著作中涉及蒙古較少，幾經搜尋，僅得兩篇，其中《成吉思汗遺像考正》一文，竟未收錄於《羅家倫先生文存》中，《文史》僅收錄《審查有關內蒙案件報告》，茲分別介析如次：

#### 《成吉思汗遺像考正》

文發表於民國四十四年（1955 年）四月十二日《中央日報》，其後輯入羅著《交響樂的震盪》（一），台北雲天出版社，列頁 31~33，文章僅一千四百多字，但卻極具歷史、考據意義。文章主要是指出民國四年（1915 年）地理學家張相文游綏遠南歸，獲得元太祖成吉思汗與元世祖忽必烈遺像各一，於是便在《大中華》雜誌上加以刊登，其中成吉思汗像身著戎裝、長頭深目、連鬚叢鬚，感覺上是威風凜凜，直覺不像蒙古利亞種人（即黃種人），反而像西方高加索種人（即白種人），尤其像斯拉夫族的俄國人。羅氏在文中又稱渠曾於民國六年在北平古物陳列所看到元朝帝王像，特別注意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畫像，證實他們祖孫二人不但是典型的蒙古種人，而且他們血統的關鍵在頭面部的形態上，表現得非常分明

<sup>21</sup> 見《吳忠信主新日記》1945 年 1 月 11 日，頁 117~121，其中一段吳氏與新任商業銀行顧問劉興沛之談話。

（以上均羅氏原文），於是羅氏對張相文所獲畫像的正確性有所懷疑。

民國三十二年（1943 年）羅家倫以監察使身分駐節新疆，同時擔任西北考察團團長，在前往新疆途中經過甘肅，曾代表中央赴興隆山向暫遷於興隆山太白宮的成吉思汗陵寢致祭<sup>22</sup>，祭後在參觀遺物之餘，印刷極精



（見所附圖，此圖係摘自註 22 蔡著封面，係依張相文之圖像以線描方式呈現）。仔細審察旁邊所印文字，知係在俄國當年故都聖彼得堡所印製，於是羅家倫先生心中對成吉思汗圖像問題更有一番了解。但不知此一圖像之來源。之後羅氏在新疆任所一住三年，時新疆在盛世才統治之下，情勢詭譎，必須審慎從事，自無暇探求成吉思汗圖像問題，但心中對張相文所獲得之圖像，仍存有疑問。之後，羅氏出任首任駐印度大使，而國共內戰方殷，新疆情勢更為複雜，之後在張治中勸

導下，新疆「和平解放」，有部分在維、哈、回、漢各族逃離新疆輾轉來台，其中有土爾扈特蒙古族烏納恩素珠克圖東路盟盟長敏珠策旺多濟者，係清末民初蒙古名王之一的帕勒塔親王之子，帕勒塔親王曾留學俄羅斯。羅家倫先生某次與敏珠策旺多濟盟長（字孟經，多以敏親王稱，其人博學多聞，精通蒙、漢、英、俄語文，時住台北市杭州南路）會晤，羅氏深知敏親王對蒙古掌故所知極多，所以就以之前所見到的成吉思汗圖像及心中所疑，向敏親王詢問，敏盟長告以他父親帕勒塔親王口告訴他，就在帕勒塔「留學的時候（帕勒塔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後又留學俄國聖彼得堡三年），一個日本人憑著想像力，畫成這張成吉思汗像，後來在俄國頗為流傳。」這下解開了羅氏多年心中之疑，可見張相文從綏遠（應是伊克昭盟或烏蘭察布盟，也可能是吐默特旗蒙人家中）獲得成吉思汗圖像，是日本人憑想力畫出來的，由於其造型近似斯拉夫民族，所以「在俄國頗為流

<sup>22</sup> 關於成吉思汗陵寢原在內蒙古伊克昭盟的伊金霍洛，抗戰期間，內蒙德王與日本欲搶劫成陵，政府乃將成陵暫遷甘肅興隆山，遷移始末可參看蔡桂林《成吉思汗靈柩西遷紀實》，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年，另劉學鈔《成吉思汗陵寢的遷移與中央致祭成陵》一文，此文輯入劉著《中國少數民族史新論》台北南天書局，2011 年、2014 年出版。

傳」，並在聖彼得堡予以精印，再以之傳入內、外蒙古，為其侵略蒙古作鋪路」工作，可見俄國之「經營」蒙古是下了很大的心機，連一張憑空捏造的圖像，都要加以利用。

其實要論成吉思汗圖像，除了上述日本人憑空捏造的這一幅類似斯拉夫人的畫像外，另外還有三幅，一幅是舊時草原上蒙古族蒙古包裏常懸



蒙古同胞敬奉成吉思汗時所用像。

挂，以及來台蒙古同鄉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一日致祭成陵時，所用的圖像，鬚髮皆白，據說是成吉思汗晚年時的畫像（如以西元 1155 年為成吉思汗誕生之年，他薨於 1227 年，享壽七十三歲，鬚髮皆白，合於實情。據南宋趙珙的《蒙鞑備錄》成吉思汗面容是：「其身魁偉而廣額長髯，人物雄壯。」（額，音商，額頭，廣額，額頭寬大），

按趙珙於南宋寧宗趙擴嘉定十四年

（1221 年）出使蒙古，想必親自見過成吉思汗，此畫像，頗合於趙珙對成吉思汗容貌的描述，當據相當的可信度。另有一幅成吉思汗畫像，原圖長 583 厘米，寬



408 厘米，畫面共有四人，此處僅取成吉思汗一人，據說是 1953 年北京歷史博物館從民間徵集得到，現藏於該博物館，經過專家從紙的質地、墨色、用筆等方面考定，認為這幅畫像應是十三、四世紀的作品，這



北京歷史博物館藏成吉思汗像。

麼說來這幅畫像也有其可信度，而且從畫面上看也是廣額長髯，但鬚鬚是黑色的當係成吉思汗中壯年時的容貌。另有一幅成吉思汗畫像，現藏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列為歷代帝王像之一，完全合於「廣額長髯」的記載，從畫面上看，其年齡應介於以上二像之間，應該是最可靠的一幅成吉思汗像。

### 《審查有關內蒙案件報告》

這一案件是緣於監院察院邊政委員會所提蒙藏委員會編印的《邊疆地理》一書，塞北部分僅稱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省，各未說明與上述各省在同一地區的蒙古各盟旗，蒙籍監察委員張秉智認為此書「背棄國策違反憲法」提出彈劾，時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田炯錦曾對此案提出書面說

明，同時國民大會代表李爾航等也向行政院上書駁斥熱、察、綏、寧各省之上不應冠以「內蒙古」字樣，一時之間頗為熱鬧，政府乃指定羅家倫先生審查此一案件，由是乃有此一案件之審查報告。

此一案件有其特定的背景，按《邊疆地理》一書，係由名政論家、學者蔣君章先生執筆，當時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田炯錦（係甘肅人，知名憲法學者，曾於 1951 年~1954 年首任蒙藏會委員長之後出掌內政部、考選部，於 1960 年~1963 年再度出長蒙藏會委員之後更出任司法院長），為推廣國人對蒙藏邊疆的認識，特約請學者專家撰寫有關邊疆之專書，於 1961 年共編印《邊疆歷史》（李符桐）、《邊疆地理》（蔣君章）、《邊疆宗教》（胡耐安）、《邊疆教育》（札奇斯欽）……等八種，這原是一項極有意義之施政項目，只因《邊疆地理》一書未特別列出塞北地方相關蒙古盟旗行政區劃，而蒙籍監察委員張秉智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認為蒙古盟、部、旗地行政組織，經政府先後頒布《蒙古盟部旗組織法》、《蒙古自治原則》後，已是合法的地方行政組織，盟、旗相當於省、縣，特別旗相當於直轄市；而《中華民國憲法》對於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之產生也以蒙古盟、特別旗為單位，規定其應有名額，因此張秉智所提意見也算於法有據。但李爾航等認為在熱、察、綏、寧各省之上不應冠以「內蒙古」字樣，也應為公認之事實，因此爭執不下，這其中「可能」有一些個人因素，對田炯錦委員長的杯葛，筆者當年（1962 年）尚在學中，猶意該年蒙藏會依例於農曆三月二十一日舉辦「中樞致祭成陵大典」，風聞在台蒙籍人士（當時有四百多人）拒絕參加，蒙藏會乃商請政治大學邊政系學生參與致祭以壯場面，可見此事頗有意氣成分。羅家倫先生銜命審查此案，有其左、右為難之處，但羅氏憑其睿智一方面肯定蒙古盟、旗的法律地位，另一方以「又讀憲法規定有關各條，如國大代表、立監委員之選舉，均屢提蒙古盟旗，並未加以『內蒙古』字樣，故不能認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或《邊疆地理》之著者有違憲法之罪嫌。」這一段審查意見可說精妙絕倫，既兼顧到雙方，又維護到行政機關蒙藏委員會及撰著者蔣章君之尊嚴與學術自由，若非羅氏精深之學養與豐富之行政經驗，實難達到如此化境，俗諺有云：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羅氏兼而有之。事實上 1960 年代台灣仍處於風雨飄搖年代，多少大事待

辦，監委職司風憲，國大代表象徵國家主權，如為茶壺裏的風波，而興起文字戰，殊屬不值，而蔣君章在學政兩界卓著聲望，其早年所著《新疆經營論》至今仍為研究新疆者所重視，事實上張、蔣兩人都是謙謙君子，其私德節操都令人敬佩，實不宜為此事而引起筆戰，其實當年大可責由蒙藏委員會倩人另撰介紹蒙古盟旗專書以為化解並宣達蒙古地方行政組織有其歷史性。不過如往更深一層看，清初之所以要在蒙古推行變相之八旗制，其目的是在消除蒙古原有以血緣體為基礎之社會結構，逐水草而牧，有極大之機動性，清朝有鑑於此，為弱化蒙古，乃實行盟旗制，使部之一級不具作用（外蒙則部仍存在），劃定游牧地區，如有越界雖王公貴族也嚴懲不貸，瓦解蒙古原有之血緣體社會結構，固定牧地，機動性盡失，終至強悍之民族，被清朝馴化為羸弱之蒙古，其中原因雖多，盟旗制當屬主因。羅氏審查報告最後提出國難當前應從大處著眼，相忍為國。在當時客觀情勢，也只能作此結論，雖略有鄉願之意，乃不得不而也，一場風波因羅氏之審查而告化解。

#### 四、《關於一般邊疆者》

所謂「邊疆」，最普通的說法就是指距離國家核心地區比較遠的地方，但所謂「核心」，是地理的？政治的？經濟的？還是文化的？也因此所謂邊疆也有各種不同說法，有地理邊疆、政治邊疆、經濟邊疆、文化邊疆等分類<sup>23</sup>，綜合而言，新疆、西藏、內外蒙古都合於所謂邊疆的條件，而甘肅、青海似也可納入邊疆的範疇，羅家倫先生有一篇鼓勵工程技術人員到邊疆，尤其是到西北的文章，由於時代的侷限，這篇文章標題為《總裁關懷邊疆技術人員》，全文近二千字，當屬抗戰後期所撰，盛述工程技術人員在西北邊疆所作的貢獻，此這篇文章羅家倫先生提到一個原本在國立中央大學任擔任首任水利工程系系主任的原素欣先生，放下擔任六年系主任工作，到西北甘肅省水利林木公司所屬的酒泉工作總站擔任主任，就位階而這個酒泉工作總站主任，要比中央大學系主任低了好幾級，就工作地區而言，到邊遠的酒泉（為河西四郡之一），是相當划不來的，但是這

<sup>23</sup> 本文不是探討邊疆的專文，有關邊疆的專門論著，可參看胡耐安《邊政通論》，林恩顯《邊政通論》，另吳楚克《中國邊疆政治學》（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年。前二書均為政治大學邊政系、所教材。）

位原素欣先生是有抱負、有理想的人，認為西北是國家命脈所在，但因缺水，以致地廣人稀，所以他毅然投身西北，興建水利，羅氏在文章中說：

「大家都知道甘肅酒泉、金塔兩縣歷年爭水的糾紛，因為水量不夠，到了灌溉的時候，甲縣要開閘分水，乙縣不肯開閘分水，於是兩縣民眾蜂擁相持，常把兩縣長推在前面作擋箭牌。雖然兩縣長面面相睹，毫無辦法，但是也不能不受此擁戴。有時因爭持不下，竟至械鬥各有死傷。這決不是兩縣的民眾的鬥，實在是命脈所關。今年這爭水的糾紛奇怪得很，竟不曾聽見了！

這固然由於熱心建設的當局決定開始了鴛鴦池水庫的工程給了民眾以莫大的希望，同時也由於原（素欣）工程師在工程地帶勤苦的工作，取得民眾的信仰和同情。……他現在不但在從事鴛鴦水庫的工程，還不斷的找到了好些水源與墾地。」

羅氏曾擔任西北考察團團長，西北地區缺水情況，以及當地人民生活艱苦想必感同身受，以上這一段文字應是他在西北考察時所親見親聞。以往歷史似乎偏重於朝代的更替、政治、人物的活動，對於攸關民生建設的人與事，就鮮少加以載錄，其實如果沒有了云云眾生，何來歷史？沒有群眾，何來領袖？原素欣教授、工程師因羅家倫先生這篇文章而得以名垂青史。

## 參、結語

自清代以至當前，政府官員鮮少把注意力放在邊疆地區，即使是邊政機構如清代的理藩院（部）、民初的蒙藏事務局、蒙藏院、乃至蒙藏委員會，也極少任用邊政專家主其事，對邊疆之漠視，而希望邊疆歸心中央，實屬緣木求魚。民國肇建伊始，外蒙古就宣稱獨立，不旋踵就與西藏簽訂互相承認獨立的所謂《蒙藏條約》，固然有俄、英帝國主義者之蠱惑、煽動，但邊政不修，朝野對邊疆之漠視，致使蒙藏邊族之離心離德，而新疆自民元以來就落入地方割據狀態，割據者或知識不足、或貪婪無厭、或恐怖統治，完全漠視維、哈各族之平等地位，也未從事地方建設，致外力介入豢養所謂「三區革命」分子，倡言「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建國

運動，此股妖風至今仍未熄滅，凡此種種深值中國知識分子注意，近人郭寄嶠將軍<sup>24</sup>曾稱「內地無邊疆無以屏障，邊疆無內地無以繁榮」，而大陸也提出「三個離不開」<sup>25</sup>，可見內地與邊疆合則兩利，分則兩傷，彼此關係猶如齒唇，唇亡則齒寒。

羅家倫先生以一歷史學者，而能注意到新疆、西藏、蒙古以及西北地區問題，令人感佩，或云羅氏所提到的邊疆事務，都與其經歷有關，此說固是事實，但試問有多少「大官」與羅氏一樣有邊疆經歷，但並未留下有關邊疆的隻字片言，羅氏能有十餘篇有關邊政的文章，經詳讀可知都是他親筆所撰，其中有若干篇更具有相高的史料價值，以羅氏既非專業的邊政學者，也未曾出任邊政機關首長，而能有此論著，讚其對邊政研究具有貢獻，誰曰不宜。

---

<sup>24</sup> 郭氏皖人，曾任甘肅省主席，來台後曾任國防部長、蒙藏委員會委員長。

<sup>25</sup> 所謂三個離不開，指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也離不開少數民族。

# 唐代突厥族人居長安城分布及其特點

朱振宏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

## 摘 要

貞觀四年（630）唐滅東突厥汗國（552—630），史載唐廷自幽州至靈州設羈縻府州以安置其部眾，酋首入居長安者數千家。由於史籍文獻缺載，我們對於這些在長安城的突厥人居住地點幾乎是一無所知。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大陸陝西、河南等地區，陸續出土許多唐代突厥人的漢文墓誌，其中不少記載了他們生前的居住地，充實了傳統文獻的不足。本文即透過出土墓誌，探討入居長安城突厥人的地域分布及其特點。

**關鍵詞：**唐代、突厥、長安城、歷史地理

## 一、唐代長安城概述

唐代的長安城承襲於隋大興城，大興城創建於隋文帝開皇二年（582）六月丙申（二十四日），當年即完成基礎工程，翌年（583）三月丙辰（十八日），隋文帝自舊城遷至新都。<sup>1</sup>唐初將大興城改稱為長安城，或曰京城、京師；玄宗天寶元年（742）下詔改稱為西京；<sup>2</sup>肅宗至德

<sup>1</sup> 唐·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卷1，〈高祖紀上〉，頁17—19。

<sup>2</sup> 譚其驤，〈唐稱長安為西京不始於天寶元年〉，《長水集續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指出兩《唐書·地理志》皆言長安稱西京始於天寶元年，然《舊紀》開元二十四年、《通鑑》開元二十四年、二十六年、二十八年皆見西京，則西京之稱，初不始於天寶元年。然兩《唐志》之言亦不得謂無依據，疑開元後期已習稱京師為西京，而未嘗明見詔敕，至天寶元年始正式頒行耳（頁470）。據北宋·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二載（757）又改名曰中京，<sup>3</sup>上元二年（761）又復稱為西京，寶應元年（762）又曰上都。<sup>4</sup>漢長安城在隋唐長安城的西北，西漢、新莽、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皆定都於此，歷經八百年，舊長安城自然環境惡化，土地鹽化嚴重，水中含有鹽分（鹹鹵），已不適宜做為飲用水，且城市建築老舊狹小，為了強化軍事防禦以及更為有效的表現新王朝的禮儀和正統地位，<sup>5</sup>隋文帝選擇符合《周易》乾卦之象的龍首山北部，另建新都大興城，以顯其受自天命。<sup>6</sup>唐朝除了將大興城更名為長安城，同時將若干宮殿、城門、街道、市坊名稱作了更改外，基本沿襲隋都。<sup>7</sup>

唐長安城是由宮城、三苑、皇城以及外郭城等四部分所組成：

宮城是太極宮、太子東宮、皇后掖庭宮等三部分的總稱，位於整座長安城正中央最北部，東西廣 2.82 公里，南北長 1.49 公里，面積約為 4.2 平方公里。<sup>8</sup>太極宮，隋稱為大興宮，唐睿宗景雲元年（710）改稱為太極

---

年），卷 70，〈州縣改置上・關內道〉記載：「京兆府，武德已來稱京城。開元元年十二月三日，稱西京。」（頁 1470）。是以，西京之稱應始於玄宗開元元年底。

<sup>3</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卷 10，〈肅宗紀〉記載：「（至德二載，757）十二月戊午朔，……改蜀郡為南京，鳳翔府為西京，西京改為中京。」（頁 249—250）。

<sup>4</sup> 北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卷 6，〈肅宗紀〉記載：「（寶應元年，762）建卯月辛亥，……以京兆府為上都，河南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頁 165）。北宋・宋敏求撰，辛德勇、郎潔點校，《長安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 年），卷 1，〈總敘〉記載：「元年建丑月，停京名，尋曰上都。」（頁 121—122）。

<sup>5</sup> 妹尾達彥，《長安の都市計画》（東京：講談社，2001 年），研究指出，隋文帝將王都取名大興城，是沿襲了隋文帝之前在北周王朝所受的大興郡公爵名。隋文帝以大興城取代漢長安城有五個原因：一是，為了強化軍事、治安機能，抵禦突厥入侵；二是，為了更有效的表現王朝禮儀，以此將新王朝的存在正統化；三是，舊長安城建築物日益老化，城內外的排水設施亦不堪使用；四是，舊長安城自然環境惡化，土地長期使用，鹽化嚴重；五是，害怕遭到北周皇族鬼魂作祟（頁 106—108）。楊鴻年，《隋唐兩京考》（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年），整理傳統史料得出隋文帝遷都的原因有狹小、妖異、水鹹、惡夢等（頁 5—6）。

<sup>6</sup> 隋文帝以龍首原符合《周易》乾卦六爻規畫大興城，這是與楊隋代北周的圖讖有著密切關係，參看王靜，《中古都城建城傳說與政治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75—89。

<sup>7</sup> 妹尾達彥，《長安の都市計画》，頁 108—109。

<sup>8</sup>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發掘隊，〈唐代長安城考古紀略〉，《考古》，1963 年第 11 期（1963.11），頁 595—611。

宮，<sup>9</sup>是長安城的正宮，又稱為京大內。太極宮，東西廣 1.28 公里，南北長 1.49 公里，面積約為 1.9 平方公里，<sup>10</sup>是唐初皇帝居住聽政，以及處理日常事務之所。唐太宗貞觀八年（634）於宮城北部禁苑東邊，地勢高燥、眺望絕佳的龍首原高台上修建永安宮，次年（635）改稱大明宮，以備太上皇李淵居住避暑之所，後因李淵崩逝而停建。高宗龍朔二年（662），高宗患風痺，因太極宮內湫濕，屋宇擁蔽，乃重修大明宮，<sup>11</sup>改稱蓬萊宮，咸亨元年（670）又改稱為含元宮；武周長安元年（701），再改回大明宮原名。大明宮平面呈南寬北窄的楔形，東西寬 1.5 公里，南北長 2.5 公里，周長 7.63 公里，面積為 3.3 平方公里，是長安規模最大的宮殿區。<sup>12</sup>大明宮建成後，高宗即以此聽政，取代太極宮成為處理日常政務的宮殿。<sup>13</sup>玄宗開元二年（714），又將外郭城東市東北的隆慶坊（興慶坊）擴大，新建長安城內第三大宮殿的興慶宮，開元十四年（726），再取外郭城永嘉坊、勝業坊之半置朝堂，擴建興慶宮。興慶宮呈南北略長的縱長方形，東西廣 1.08 公里，南北長 1.25 公里，面積為 1.35 平方公里。開元十六年（728）以後，玄宗即在興慶宮聽政。<sup>14</sup>太極宮（又稱西內）與大明宮（又稱東內或北內）、興慶宮（又稱南內）合稱為「三大內」，唐代前期皇帝多居於太極宮；玄宗時則改居於興慶宮；「安史之亂」以後，皇帝則固定常住於大明宮。因此，大明宮成為八世紀中葉以後唐朝的政治中樞。有關宮城的平面圖可參看文末〔附圖一〕。

長安城大內有三苑，即西內苑（又曰北苑）、東內苑以及禁苑，皆在都城北部。西內苑位於太極宮以北，東內苑位於大明宮東南隅，禁苑則位於都城之北。三苑中以禁苑範圍最大，東距滻水、灊水，北枕渭水，西至

<sup>9</sup> 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訂，《增訂唐兩京城坊考（修訂版）》（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卷1，〈宮城〉，頁2。

<sup>10</sup> 張永祿，《唐都長安（增訂本）》（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頁101—102。

<sup>11</sup> 唐·韋述撰，辛德勇點校，《兩京新記輯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卷1，〈大明宮〉，頁6。

<sup>12</sup> 張永祿，《唐都長安（增訂本）》，頁117。

<sup>13</sup> 足立喜六著，王雙懷、淡懿誠、賈云譯，《長安史迹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頁167—168；妹尾達彥，《長安の都市計画》，頁179—180。

<sup>14</sup> 足立喜六著，王雙懷、淡懿誠、賈云譯，《長安史迹研究》，頁173；楊鴻年，《隋唐兩京坊里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436；張永祿，《唐都長安（增訂本）》，頁151、181。

漢長安城，南接宮城，史載禁苑「東西二十七里，南北二十三里，周一百二十里。」。<sup>15</sup>三苑外圍皆築有苑牆，以隔絕百姓，其功能除了是皇帝狩獵、游憩之地，同時也具有護衛宮城的作用。

皇城，又稱為「子城」，緊鄰宮城南側，東西兩城牆與宮城的東西城牆相接，北面無牆，與宮城之間以「橫街」相隔，橫街的寬度達二百二十餘公尺，是宮城與皇城的分界線，橫街不僅是一條寬廣的大街，也是皇城與宮城之間的一個廣場。整個皇城呈長方形，南北五街，東西七街，實測東西廣 2.82 公里，南北長 1.84 公里，面積約為 5.2 平方公里。<sup>16</sup>皇城内「左宗廟，右社稷，百僚廨署列於其間」，<sup>17</sup>是做為中央衙署的政府辦公機關和宗廟所在地，參看文末〔附圖一〕。

外郭城，又稱「長安城」或「京師城」，是文武官僚及一般百姓居住的地區。唐代規定基層行政單位是城内分為坊，郊區分為里，但里、坊經常混用。<sup>18</sup>外郭城平面呈長方形，東西廣 9.72 公里，南北長 8.65 公里，面積約為 84 平方公里，外郭城由南北十四街、東西十一街切割形成一百一十個里坊，另有兩個市場（東市、西市）各占二個坊，共計分為一百一十四個坊。各坊皆有牆隔開，東市、西市是專門作為市場專用區域，此一制度稱為「坊市制」。外郭城以中央的朱雀門大街為軸心，左右相對排列，朱雀大街以東（街東）屬萬年縣，轄五十五坊及東市；朱雀大街以西（街西）屬長安縣，轄五十五坊及西市。隨著歷史發展，長安城坊數也發生了變化，但一般仍稱長安城内有一百一十坊<sup>19</sup>，參看文末〔附圖二〕。

<sup>15</sup> 徐松 撰，李健超 增訂，《增訂唐兩京城坊考（修訂版）》，卷 1，〈三苑〉，頁 35。

<sup>16</sup>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發掘隊，〈唐代長安城考古紀略〉，頁 595—611。

<sup>17</sup> 徐松 撰，李健超 增訂，《增訂唐兩京城坊考（修訂版）》，卷 1，〈皇城〉，頁 11。

<sup>18</sup> 武伯綸，〈唐萬年、長安縣鄉里考〉，《考古學報》，1963 年第 2 期（1963.2），頁 87、90。曹爾琴，〈唐代長安城的里坊〉，《人文雜誌》，1981 年第 2 期（1981.2），外廓城内主要是居民住宅的坊，隋煬帝時一度改稱為里。唐代人們或稱之為里，或稱之為坊（頁 83）。史念海，《中國古都和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隋初始置長安城時，即以坊相稱，隋煬帝曾改坊為里，隋末義寧年間又改里為坊。唐時里和坊仍是互用（頁 458—459）。本文為了行文上的統一，除徵引史料外，一律以「坊」稱之。

<sup>19</sup> 辛德勇，〈八、大興城的坊數及其變化和城東南隅諸坊〉，《隋唐兩京叢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年），頁 17—25；徐松 撰，李健超 增訂，《增訂唐兩京城

唐代的長安城規模空前巨大，僅外郭城就有 84 平方公里，是中國歷代都城中面積最大的城市，<sup>20</sup>與同時期其他國家都城相比，長安城是阿拉伯巴格達城（30.44 平方公里）的 2.7 倍；日本京都平安京（22.88）的 3.67 倍、日本奈良平城京（22.5 平方公里）的 3.73 倍；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城（12 平方公里）的 7 倍。若外郭城加上皇城、三苑與大明宮，則整座長安城總面積超過一百平方公里，是古代世界上規模最宏大的都城建築。

## 二、唐滅東突厥及其安置措施

《新唐書·突厥傳上》記載：「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sup>21</sup>突厥民族（Gök Türkler）自西元六世紀中葉興起建立政權，東突厥汗國一度稱霸北亞、中亞，大業十一年（615），東突厥始畢可汗曾兵圍隋煬帝長達三十二天，史稱「雁門事變」。<sup>22</sup>李淵太原起兵創業建唐前夕，也與其他割據群雄一樣向東突厥稱臣請兵；<sup>23</sup>唐武德九年（626）太宗李世民剛即帝位第十天，東突厥頡利可汗率領大軍南下陳兵渭水便橋（西渭橋），史稱「渭水事件」。<sup>24</sup>是以，隋末唐初之際，東突厥曾對隋唐帝國的國防構成嚴重的威脅。唐太宗即帝位後，立志要消滅東突厥，積極從事各項討伐東突厥的準備工作。在東突厥遭受到嚴重天災、內部離析以及鐵勒諸部落相繼叛離之際，貞觀三年（629）底，太宗詔遣李勣、李靖等人，分道出擊東突厥，<sup>25</sup>次年

---

坊考（修訂版）》，卷 2，〈外郭城〉，頁 45、楊鴻年，《隋唐兩京考》，頁 229—232。。

<sup>20</sup> 唐長安城是漢長安城（35 平方公里）的 2.4 倍；北宋開封城（50 平方公里）、元朝大都城（50 平方公里）的 1.7 倍；明清北京城（60 平方公里）的 1.4 倍，參看張永祿，《唐都長安（增訂本）》，頁 23—24。

<sup>21</sup> 《新唐書》，卷 215 上，《突厥傳上》，頁 6023。

<sup>22</sup> 朱振宏，〈附錄貳、大業十一年（615）「雁門事變」探微〉，《西突厥與隋朝關係史研究》（台北：稻鄉出版社，2015 年），頁 361—408。

<sup>23</sup> 朱振宏，〈「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的再檢討〉，《隋唐政治、制度與對外關係》（台北：文津出版社，2010 年），頁 45—96。

<sup>24</sup> 朱振宏，〈唐太宗「渭水事件」論析〉，《隋唐政治、制度與對外關係》，頁 97—140。

<sup>25</sup> 《舊唐書》，卷 2，〈太宗紀上〉，頁 37。

（630）二月，李靖破東突厥定襄牙帳，<sup>26</sup>頡利可汗亡奔，三月庚辰（十五日），大同道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將頡利可汗俘獲，解送長安，東突厥汗國滅亡。<sup>27</sup>

唐滅東突厥後，大量部眾隨頡利可汗降附唐廷，唐朝採取建置羈縻府州的方式，安置各部眾。<sup>28</sup>太宗曾詔議安邊之術，討論如何安置突厥部落。《舊唐書·突厥傳上》記載：

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眾。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為日久矣。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河南兗、豫之地，散居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化為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常空矣。唯中書令溫彥博議請准漢建武時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眾，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心。……太宗遂用其計，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佑、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部眾。<sup>29</sup>

在處置突厥種落上，太宗採納溫彥博之議，將幽州到靈州地區，設置順、佑、化、長四個羈縻州，同時對於頡利可汗舊地，即陰山山脈北部、大漠南的磧南地區，設立定襄、雲中兩個都督府。

<sup>26</sup> 《舊唐書》，卷 67，〈李靖傳〉，頁 2479。

<sup>27</sup> 《舊唐書》，卷 60，〈江夏王道宗傳〉，頁 2354—2355；同書，卷 109，〈阿史那社尒傳〉，頁 3290。

<sup>28</sup> 唐朝設置羈縻府州始于高祖武德初年，不過，唐代大規模的設置羈縻府州，以此做為安置降附外族的一種制度性的安排，並加以規範化，是在太宗平定東突厥之後，詳參劉統，《唐代羈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8—11；李鴻賓，《唐朝朔方軍研究——兼論唐廷與西北諸族的關係及其演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8—19；林超民，〈羈縻府州與唐代民族關係〉，《思想戰線》，1985 年第 5 期（1985.10），頁 51。此外，東突厥平滅後，唐朝以設置羈縻府州，做為安置突厥部落的主要原因，在於當時唐朝還不具備兼併周邊勢力的能力，就當時的條件而言，以羈縻方式是比較理想的控制辦法，既可以照顧到突厥部眾的利益，從而保持北方安寧，又可以使唐廷進一步完成向西和向東北兩方面擴展的戰略方針。參看李鴻賓，《唐朝中央集權與民族關係——以北方區域為線索》（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年），頁 106—107。

<sup>29</sup> 《舊唐書》，卷 194 上，〈突厥傳上〉，頁 5162—5163。

除了上述設置的六個羈縻府州外，太宗亦在豐州置豐州都督府，以領突厥降附的蕃戶，史大奈任檢校豐州都督。<sup>30</sup>同時，唐廷又在靈州與夏州兩州南境「置魯州、麗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等六胡州，<sup>31</sup>以降突厥。此六胡州雖言是突厥降戶，但主要的是安置隨東突厥降服而南來的粟特昭武九姓諸部。<sup>32</sup>

除了設置羈縻府州外，還有大量突厥人入居長安城。吳兢，《貞觀政要·議安邊》記載：

貞觀四年，李靖擊突厥頡利，敗之，其部落多歸降者。……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sup>33</sup>

《舊唐書·突厥傳上》記載：

其酋首至者皆拜為將軍、中郎將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sup>34</sup>

《新唐書·突厥傳上》亦記載：

擢酋豪為將軍、郎將者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籍者數千戶。<sup>35</sup>

玄宗開元年間，京兆府領戶三十六萬二千九百九，<sup>36</sup>太宗貞觀初年當

<sup>30</sup>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卷4，〈關內道四·豐州〉記載：「貞觀四年，突厥降附，又權于此置豐州都督府，不領縣，唯領蕃戶，以史大奈為都督。」（頁112）；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193，〈唐紀九〉，太宗貞觀四年五月丁丑條記載：「丁丑（十三日），以右武衛大將軍史大奈為豐州都督。」（頁6078）。

<sup>31</sup> 《新唐書》，卷37，〈地理志一·宥州寧朔郡〉，頁974—975。

<sup>32</sup> 關於唐朝對降附突厥各部落所設立羈縻府州的範圍及其沿革變化，參看朱振宏，〈論貞觀十三年（639）「九成宮事件」及其影響〉，《隋唐政治、制度與對外關係》，頁148—160、朱振宏，〈突厥第二汗國建國考〉，《歐亞學刊》，第十輯（2012.9），頁83—89。

<sup>33</sup>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9，〈議安邊第三十六〉，頁498—499。唐·劉餗撰，程毅中點校，《隋唐嘉話》（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卷上，亦有載：「突厥之平，僕射溫彥博請其種落于朔方以實空虛之地，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頁5）。

<sup>34</sup> 《舊唐書》，卷194上，《突厥傳上》，頁5163。

<sup>35</sup> 《新唐書》，卷215上，《突厥傳上》，頁6038。

<sup>36</sup> 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1，〈關內道一·京兆府〉，頁1。

不及此數，是以，兩《唐書》所記「數千家（戶）」較有可能，《貞觀政要》所云「近且萬家」推測當為「近且萬人」之誤。唐代長安城的人口數量約為七十萬人，<sup>37</sup>外族僑寓人數推估在二、三萬人間，<sup>38</sup>而突厥竟達數千戶、近萬人，其數可謂驚人。然而對於這些突厥人在長安的居住地點史籍文獻記載缺略不詳，例如：太宗曾對頡利可汗「賜以田宅」；<sup>39</sup>高宗曾對突厥車鼻可汗「賜宅於長安」；<sup>40</sup>玄宗對突厥默啜可汗妹婿火拔頡利發「賜宅一區」，<sup>41</sup>但都沒有說明確切的位置。又如：阿史那結社率，歷位中郎將宿衛、<sup>42</sup>阿史那社尒典衛屯兵、<sup>43</sup>阿史那忠入侍宿衛，<sup>44</sup>這些宮城屯兵宿衛的突厥將領，在長安城理應會有私第，<sup>45</sup>然史書卻沒有任何記載。此外，上述《舊唐書·突厥傳》所云「拜為將軍、中郎將等官，布列朝廷」的突厥酋首，在長安城內有無私第，我們也不得而知。《新唐書·突厥傳》記載了一則故事：

頡利子疊羅支，有至性，既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預

---

《新唐書》，卷 37，〈地理志一·關內道·京兆府京兆郡〉記載：「京兆府京兆郡，……天寶元年領戶三十六萬二千九百二十一，口百九十六萬一百八十八。」（頁 961）。

<sup>37</sup> 關於唐代長安城人口數量，學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認為在百萬上下，少者認為有五十萬左右，多者則認為盛時當達百七八十萬，從唐長安城不同區域實際居住人口數量推測，最盛時期大約為七十萬人。參看王社教，〈論唐都長安的人口數量〉，史念海 主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12 增刊）「漢唐長安與關中平原」，頁 88—116。妹尾達彥，《長安の都市計画》，推算八世紀前半期長安城的人口數量達到了七十萬，其中戶籍登記的官員及一般平民有五十多萬，戶籍漏列者估計有十幾萬人（頁 183）。

<sup>38</sup> 嚴耕望，〈唐代長安人口數量之估測〉，《嚴耕望史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1088。

<sup>39</sup> 《舊唐書》，卷 194 上，《突厥傳上》，頁 5159。

<sup>40</sup> 《舊唐書》，卷 194 上，《突厥傳上》，頁 5165。

<sup>41</sup> 唐·杜佑 撰，王文錦、王永興、劉俊文、徐庭雲、謝方 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 198，〈邊防典十四·突厥中〉，頁 5438。

<sup>42</sup> 王溥，《唐會要》，卷 94，〈北突厥〉，頁 2002。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195，〈唐紀十一〉，太宗貞觀十三年戊寅條、甲申條，頁 6147。

<sup>43</sup> 《新唐書》，卷 110，〈諸夷蕃將傳·阿史那社尒〉，頁 4115。

<sup>44</sup> 《新唐書》，卷 110，〈諸夷蕃將傳·阿史那忠〉，頁 4116。

<sup>45</sup> 例如：「倂失十囊墓誌」記載：「主上嘉之，擢拜特進。念其誠款，遠慕淳風，寄以爪牙，方釋聖志，加授右衛大將軍，封雁門郡開國公，錫錦袍鈿帶魚二事，物五百段，并賜甲第一區，便留宿衛。」，倂失十囊被唐玄宗賜甲第，以留宿衛，同樣入朝宿衛的阿史那結社率、阿史那社尒、阿史那忠等人，也應會在長安賜以甲第。

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帝聞，嘆曰：

「天稟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肉。<sup>46</sup>

《貞觀政要》也記載類似的故事：

貞觀中，有突厥史行昌直玄武門，食捨肉，人問其故，曰：「歸以奉母。」太宗聞而嘆曰：「仁孝之性，豈隔華夷？」賜尚乘馬一匹，詔令給其母肉料。<sup>47</sup>

無論疊羅支與史行昌是否為同一人，<sup>48</sup>他們在長安城也應有宅第。然而，我們對於這些突厥人在長安城的實際居住地並不清楚。

### 三、墓誌中所見突厥族人居長安城的分布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大陸相繼出土許多唐代時期突厥人的漢文墓誌，這些新材料的發現，不僅增加了我們對於入居中原突厥人的認識，同時部分墓誌也記載了誌主生前的居住地，使我們可以對突厥人的居住地分布進行分析研究，填補文獻中的空白。

筆記目前所蒐集的唐代突厥人漢文墓誌中，入居長安城且有記載居住地者有十六人，茲據墓誌內容簡述如下，並於文末製成〔附圖三〕及〔附表一〕：

阿史那思摩（李思摩）：入唐前曾被高祖冊封為和順郡王。貞觀三年（629）歸附唐廷，太宗嘉其迺誠，賜姓李氏，封懷化郡王，授右武衛大將軍，貞觀二十一年（647）三月，思摩遭疾卒於長安居德里第，同年四月窆於太宗「昭陵」。<sup>49</sup>

史善應：隋文帝仁壽年間即歸附隋廷宿衛，並從隋煬帝征伐遼東，累

<sup>46</sup> 《新唐書》，卷 215 上，〈突厥傳上〉，頁 6036。

<sup>47</sup> 吳兢 撰，謝保成 集校，《貞觀政要集校》，卷 5，〈論孝友第十五〉，頁 277—278。

<sup>48</sup> 閔德華，《突厥與其他民族關係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 年），指出「頡利可汗阿史那咄苾的兒子，原名疊羅支，隨頡利可汗降歸唐朝內遷定居後，改用漢名，叫『史孝昌』（筆者案：『史孝昌』當為『史行昌』之訛）。」（頁 14）。史籍文獻所述史行昌與疊羅支的行性以及太宗的感嘆語皆極為近似，兩者是否是指同一人，以現存史料而言尚無法確定，有待進一步的考證。

<sup>49</sup> 張沛 編著，《昭陵碑石》（咸陽：三秦出版社，1993 年），頁 112—113。

遷右光祿大夫、右武衛武牙郎將。武德元年（618）歸唐，高祖封為弓高侯，任中郎將，貞觀四年（630），太宗拜為北撫州刺史，貞觀十二年（638），遷轉左衛將軍。貞觀十六年（642）十一月，遭疾薨於長安隆慶里第，次年（643）葬於雍州萬年縣洪原鄉之少陵原。<sup>50</sup>

阿史那摸末：貞觀三年（629）十二月率部眾降唐，太宗授予上大將軍，不久再遷為右屯衛將軍。唐廷並以宗室女平夷縣主妻摸末。貞觀二十三年（649）二月，摸末薨於長安宣陽里第，同年三月，葬於萬年縣龍首鄉。<sup>51</sup>

阿史那婆羅門：東突厥頡利可汗之子，唐滅東突厥後入唐，充任中央禁軍，不久遷為右屯衛郎將。高宗永徽二年（651）五月，遭疾卒官，同年六月葬於灊原。<sup>52</sup>

阿史那懷道：曾祖父阿史那步真於太宗貞觀年間入朝。武周、玄宗年間，懷道累遷為特進、十姓可汗、濛池大都護、左金吾衛大將軍。開元十五年（727）閏九月薨於客舍。懷道妻瀚海國夫人安氏的曾祖父安肅於貞觀年間率部眾入唐，太宗冊拜左衛大將軍、定襄縣開國公，祖安忠臣、父安輔國皆在唐任官。安氏於開元二十一年（733）五月，薨於長安居德里第。<sup>53</sup>

阿史那從政：唐左金吾衛大將軍，妻薛突厥施匐阿施於中宗景龍年間染疾，終於長安布政里私第。<sup>54</sup>

啜祿：唐冠軍大將軍行右武衛大將軍，妻滎陽郡夫人鄭實活，卒於義寧坊。<sup>55</sup>

熾俟迺：武周萬歲通天中，冊授游擊將軍、左威衛翊府右郎將。玄宗開元中，遷左驍衛中郎，不久改授右武衛中郎將。天寶十一載（752）四

<sup>50</sup> 北京大學圖書館金石組、胡海帆、湯燕、陶誠 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歷代墓誌拓片目錄（上、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1135。

<sup>51</sup> 吳鋼 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三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年），頁 345。

<sup>52</sup> 趙力光 主編，《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北京：線裝書局，2007 年），頁 77。

<sup>53</sup> 張德臣 編著，《渭城文物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年），頁 253—254。

<sup>54</sup> 吳鋼 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二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 年），頁 565。

<sup>55</sup> 吳鋼 主編，《全唐文補遺》，第四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 年），頁 439—440。

月，寢疾終於長安義寧里之私室，天寶十三載（754），祔葬於長安高陽原。<sup>56</sup>

俾失十囊（伊羅友闕頡斤十囊）：開元年間入唐，玄宗擢拜特進，加授右衛大將軍，封雁門郡開國公。開元二十六年（738）十二月，薨于醴泉里之私第。次年（739）十月，窆於京兆府長安縣龍首原。<sup>57</sup>

契苾李中郎：玄宗年間入朝。天寶三載（744）九月，遘疾終於蒿街，唐廷贈授右領軍衛大將軍。同年十一月，安厝於長樂原。<sup>58</sup>

康阿義屈達干：天寶元年款塞歸唐，玄宗拜授左威衛中郎將，不久遷為右威衛將軍、左武衛大將軍。代宗時冊授為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廣德二年（763）十一月，因染肺疾薨於上都勝業坊私第。<sup>59</sup>

天山郡夫人阿史那氏：唐羽林軍大將軍張義之妻，突厥左廂第二纛官・雙河郡都督慆舍提噉啜第二女。玄宗天寶五載（746）六月，終於萬年縣勝業里之私第。<sup>60</sup>

賢力毗伽公主阿史那氏：突厥骨咄祿默啜可汗女，夫為唐駙馬都尉・特進兼左衛大將軍・雲中郡開國公・踏沒施達干阿史德覓覓。毗伽公主入唐後，封為雲中郡夫人，居住在親兄右賢王墨特勤在長安懷德坊私第，玄宗開元十一年（723）六月，薨於懷德坊。同年十月，葬於長安縣龍首原。<sup>61</sup>

金河郡夫人阿史那氏：夫為唐節度副使・太常卿公曳鶻祧賢。代宗廣德二年（763），薨於市（布）政坊之里第，同年十一月，葬於京兆府長安縣石井之原。<sup>62</sup>

<sup>56</sup> 西安市長安博物館 編，《長安新出墓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年），頁 189。

<sup>57</sup> 吳鋼 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五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年），頁 368—369。

<sup>58</sup> 吳鋼 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五輯，頁 374—375。

<sup>59</sup> 清・董誥 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卷 342，頁 1536—1537。

<sup>60</sup> 趙振華，《洛陽古代銘刻文獻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 年），頁 486。

<sup>61</sup> 清・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卷 52，頁 156—157。

<sup>62</sup> 吳鋼 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五輯，頁 407。

史從及：阿史那社尒六世孫。從及在唐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羽林大將軍、上柱國，後轉為左監門率府長史。文宗開成元年（836），授太府寺丞。武宗會昌元年（841）十一月，卒於懷遠里之私第。次年（842）正月，卜葬於京兆府長安縣義陽鄉郭杜村。<sup>63</sup>

史孝章：憲宗元和年間任魏州大都督府參軍；其後累遷至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朝散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文宗開成三年（838）十月，薨于長安靖恭里之私第。<sup>64</sup>

上述十六人的居住地點，有兩人需進一步說明：

一是，阿史那婆羅門。墓誌記載婆羅門入唐後即「入參戎旅，勤肅之美，著於階闥」。此處的「戎旅」，特指「禁旅」（墓誌文後的銘文有：「參名禁旅」），即禁軍。<sup>65</sup>也就是說婆羅門入唐後，擔任中央禁軍，不久遷為右屯衛郎將。《唐六典·左右威衛》記載：

左、右威衛，……隋初，置左、右領軍府，煬帝改為左、右屯衛，皇朝因之。至龍朔二年（662），改為左、右威衛，……。<sup>66</sup>

《舊唐書·職官三·左右威衛》記載：

左右威衛，隋為左右屯衛，龍朔改為威衛，光宅改為左右豹韜衛，神龍復為威衛也。……翊府中郎將、左右郎將、錄事、兵曹、校尉、旅帥、隊正、副隊正。人數、品秩皆如左右衛之親府。<sup>67</sup>

同書，同卷，〈左右衛〉記載：

左右衛，……親府、勳一府、勳二府、翊一府、翊二府等

<sup>63</sup> 北京大學圖書館金石組、胡海帆、湯燕、陶誠 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歷代墓誌拓片目錄（上、下冊）》，頁 5941。

<sup>64</sup> 趙文成、趙君平 編選，《新出唐墓誌百種》（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 年），頁 280。

<sup>65</sup> 《舊唐書》，卷 175，〈憲宗二十子等傳〉：「史臣曰：……自天寶已降，內官握禁旅，中閹纂繼，皆出其心。」（頁 4549）。

<sup>66</sup> 唐·李林甫 等撰，陳仲夫 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卷 24，〈左右威衛〉，頁 621。

<sup>67</sup> 《舊唐書》，卷 44，〈職官志三〉，頁 1900。

五府：每府中郎一人、中郎將一人，皆四品下。左右郎將各一人，正五品上。……。中郎將領本府之屬以宿衛。左右郎將貳之。若大朝會、巡幸，以鹵簿之法以領其儀仗。<sup>68</sup>

隋煬帝之「屯衛」，及至唐高宗永徽年間仍稱之，龍朔時改稱為「威衛」。右屯衛郎將，其職掌一如左右衛之親府，平時領本府之屬以宿衛，大朝會、皇帝巡幸之時，以鹵簿之法做為前導儀仗隊。長安宮城內有「左右威衛府」，婆羅門平時應是在威衛府中宿衛。永徽二年五月，婆羅門「遘疾卒官」，隨後葬於灊原。從誌文內容來看，婆羅門入唐後，一直在南衙內府任職，其活動空間基本上不出京師宮城。死後與其父頡利可汗一樣，葬於宮城北面禁苑灊原附近，地點很可能是在萬年縣龜川鄉。<sup>69</sup>由此觀之，推測婆羅門生前都是生活在宮城之中，長安外郭城可能沒有自己的私第。<sup>70</sup>

二是，契苾李中郎。墓誌記載李中郎「解其左衽，萬里入臣」，於天寶三載九月，遘疾終於蒿街。程大昌，《雍錄》記載：

武帝斬南越王，傳介子斬樓蘭王，皆垂其首北闕，北闕，未央北門也。陳湯斬郅支單于，上疏乞垂之藁街蠻夷邸間，諸家無言藁街之在何地者。唐都亭驛即蠻夷邸矣，在朱雀街西，與鴻臚寺近。<sup>71</sup>

唐代藁街即是位在都亭驛，近鴻臚寺，元人胡三省指出具體位置是在朱雀門外西街含光門北來第二坊，<sup>72</sup>也就是朱雀門街之西從北來第二坊的

<sup>68</sup> 《舊唐書》，卷 44，〈職官志三〉，頁 1899。

<sup>69</sup> 有關阿史那婆羅門在唐仕宦及歸葬地，參看朱振宏，〈阿史那婆羅門墓誌箋證考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二十八輯（2012.12），頁 139—142。

<sup>70</sup> 另外還有一個可能性：《舊唐書·突厥傳上》記載唐太宗曾授頡利可汗右衛大將軍，併賜以田宅（頁 5159）。唐禁衛軍隊分左右，屬右軍的軍人多住在朱雀街街西，左軍住在朱雀街街東（詳下論），若此說不誤，唐太宗賜予頡利可汗的宅第當在街西，婆羅門為頡利之子，則婆羅門也有可能承襲其父宅第，居住在街西的某里坊。

<sup>71</sup> 北宋·程大昌 撰，黃永年 點校，《雍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卷 8，〈職官·藁街都亭驛〉，頁 161。

<sup>72</sup>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60，〈唐紀七十六〉，昭宗乾寧二年五月條，頁 8470，胡三省注文。

通化坊。<sup>73</sup>因此，契苾李中郎居住的地點是在外郭城通化坊內。

#### 四、突厥族居住長安城分布特點

上述整理的十六位突厥人漢文墓誌誌主的生平事蹟及其居住地，我們可以發現幾個特點：

第一、凡是能在長安城擁有居住地者，男性生前官品都是五品以上，屬於唐朝「通貴」的中高級官員；<sup>74</sup>女性則均被冊封為郡國夫人（參看文末〔附表二〕）。若進一步分析，高宗以前，其職事官都是在三品以上的「親貴」。由此可見，能在長安擁有宅第者都皆為唐朝中高級的官員。

第二、外郭城以中央的朱雀門大街為分界，朱雀大街以東（街東）屬萬年縣，縣廨在宣陽坊；朱雀大街以西（街西）屬長安縣，縣廨在長壽坊，京兆府府廨在街西的光德坊。上述十六人除阿史那婆羅門生活在宮城中，外郭城沒有居址外，其他十五人中，居住在街東者有五位，街西者有十位。以宅第的數量而言，朱雀街東的宅第多於街西一倍，原因在於唐長安城地勢東高西低，東西比降相差最少五公尺，最多約二十公尺，街東較街西為高爽，而當時住宅選擇在高爽之地是人們的一個共識。<sup>75</sup>我們進一步分析長安城里坊居民分布的差異，呈現出「東貴西富，南虛北實」的特點。<sup>76</sup>宋敏求，《長安志·東市》記載道：

次南東市。隋曰都會市。南北居二坊之地，東西南北各六百步，……萬年縣戶口減于長安，文公卿以下民止多在朱雀街

<sup>73</sup> 辛德勇，〈十、善和、通化與光祿、殖業四坊〉、〈三十四、都亭驛考辨——兼述今本《長安志》通化坊闕文〉，《隋唐兩京叢考》，頁 26—27、77—82。

<sup>74</sup> 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卷 2，〈名例·五品以上妾〉記載：「諸五品以上妾，犯非十惡者，流罪以下，聽以贖論。【疏】議曰：五品以上之官，是為『通貴』。……。」（頁 156）。

<sup>75</sup> 曹爾琴，〈唐長安住宅分布〉，史念海 主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12 增刊）「漢唐長安與關中平原」，頁 65—81。然而，在隋朝時期，高官貴權選擇宅第，朱雀大街以西地區，遠遠多於多於街東地區，此與傳統社會中「西者為上」、「尊長在西」的觀念有關，參看妹尾達彥，〈唐長安城の官人居住地〉，《東洋史研究》，第 55 卷第 2 號（1996.6），頁 38—39、辛德勇，〈《冥報記》報應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縱心所欲——徜徉於稀見與常見書之間》（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264、268—272。

<sup>76</sup> 朱玉麒，〈隋唐文學人物與長安坊里空間〉，榮新江 主編，《唐研究》，第九卷（2003.12），頁 96。

東第宅所占勳貴，由是商賈所湊，多歸西市。……。<sup>77</sup>

同書，〈開明坊〉又載：

次南開明坊。自朱雀門南第六橫街以南，率無居人第宅。

自興善寺以南四坊，東西盡郭，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sup>78</sup>

與朱雀街西居民「浮寄流寓」，<sup>79</sup>居住者多為百姓和富商大賈不同，朱雀街東的居民以貴族、官僚為主。不過，長安外郭城「東貴西富」的居住現象是在高宗龍朔二年興建大明宮、玄宗開元二年建立興慶宮之後才逐漸明顯。妹尾達彥曾對隋唐長安城內官人居住地的變遷有精闢的研究，得出官人居住地的變遷與大明宮、興慶宮建設有著密切的關連，在隋代官人居住地以朱雀街西為主；唐初（618—661）朱雀街東居住者有增加的趨勢，但在大明宮、興慶宮建設後，官人居住地開始明顯的從朱雀街西移往朱雀街東的中北部；安史亂後，親王、宦官和禁軍將領等高級官員，大多集中住在大明宮、太極宮、興慶宮等環繞街東的北部諸坊。街東中南部東市的南方、樂遊原北麓斜面的諸坊，居住著科舉進士科合格的官僚，形成一個新興發達的住宅街。九世紀前半葉，街東的中南部也成為鱗次櫛比的高官邸宅區，一般小官吏則大多居住在街西的西市周邊諸坊。<sup>80</sup>孫英剛先生在研究隋唐長安的王府與王宅的分布，也得出唐太宗、高宗時期的王宅是分散的，基本沒有甚麼規律可循，睿宗以後，為防諸王擅權，抑制諸王勢力，王宅居住地分布逐漸向三大內地區集中。<sup>81</sup>初唐的官員、勳貴，一般是居住在靠近宮城與皇城周圍附近。<sup>82</sup>長安外郭城另呈現「南虛北實」

<sup>77</sup> 宋敏求 撰，辛德勇、郎潔 點校，《長安志》，卷 8，〈唐京城二・東市〉，頁 291。

<sup>78</sup> 宋敏求 撰，辛德勇、郎潔 點校，《長安志》，卷 7，〈唐京城・開明坊〉，頁 260。

<sup>79</sup> 宋敏求 撰，辛德勇、郎潔 點校，《長安志》，卷 10，〈唐京城四・西市〉，頁 337。

<sup>80</sup> 妹尾達彥，〈唐長安城の官人居住地〉，頁 38—39、妹尾達彥，《長安の都市計画》，頁 198—199。

<sup>81</sup> 孫英剛，〈隋唐長安的王府與王宅〉，榮新江 主編，《唐研究》，第九卷，頁 187—194。

<sup>82</sup> 初唐皇室勳貴居住在長安城西的中北部與城南的中部，靠近政治中心的太極宮與皇

特點，延興門和延平門是東西相對最南的郭門，其間街道貫通，此街在城南第五、六兩列里坊間，再往南即是耕墾種植、阡陌相連、較無人煙的南四坊區域。最北邊的通化門是政府官員驛遞必經的官道。居中的春明門和金光門之間的大街，大街在皇城之南，是官吏到中央機構往來的街道，唐時朋友送別多在春明門附近，金光門外有昆明池，是唐帝狩獵、官吏游賞、百姓漁獵之地。此外，西域來到長安的僧侶、商賈，一般先到達街西之地。長安城的東、西兩市正位居春明門與金光門大街南邊，促進了兩市的繁華，也影響了周圍里坊宅第最多。<sup>83</sup>

觀察突厥人的居住分布，所有突厥人都居住在延興門和延平門大街以北人口較多的里坊。比較朱雀街東與街西的分布，高宗以前居住在街東、街西，似沒有明顯的差別；高宗以後到唐末，街西（九戶）所占的比例是街東（三戶）的三倍之多。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妹尾達彥認為唐朝的禁衛軍分左和右（東和西），屬於右軍的軍人，多住在街西。<sup>84</sup>此一觀點很具說服力，唐朝左金吾衛營原在街東的崇仁坊西北隅，中宗神龍年間，因併為長寧公主第，改徙街東永興坊西南隅，<sup>85</sup>右金吾衛營在街西的布政坊東北隅。<sup>86</sup>擔任右武衛大將軍的阿史那思摩，居住在街西的居德坊，同一時期的左衛將軍史善應，居住在街東的隆慶坊，正好是東西相對；左金吾衛大將軍康阿義屈達干，居住在街東的勝業坊，而右武衛大將軍啜祿、右武衛中郎將熾俟迺，皆住在街西的義寧坊。當然，也有例外，如擔任右屯衛將軍的阿史那摸末，是居住在街東的宣陽坊；左金吾衛大將軍阿史那從政，居住在街西的布政坊；左金吾衛大將軍阿史那懷道，居住在街西居德坊。我們認為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與其具有特殊身分有關，例如：阿史那摸末的夫人為李唐宗室女平夷縣主，或許平夷縣主原先

---

城，也可以從公主宅第的分佈地點看出，參看蒙曼，〈唐代長安的公主宅第〉，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九卷，頁216—217。

<sup>83</sup> 曹爾琴，〈唐長安住宅分布〉，頁77—78。

<sup>84</sup> 妹尾達彥，〈長安の都市計画〉，頁199。

<sup>85</sup> 宋敏求撰，辛德勇、郎潔點校，《長安志》，卷8，〈唐京城二·崇仁坊〉：「玄真觀。半以東本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宅。西北隅本左金吾衛，神龍元年（705）併為長寧公主第。」（頁275—276）；同卷，〈唐京城二·永興坊〉：「西南隅左金吾衛。神龍中自崇仁坊徙。」（頁274—275）。

<sup>86</sup> 韋述撰，辛德勇點校，《兩京新記輯校》，卷3，〈布政坊〉，頁34。

在宣陽坊即有宅第，摸末入唐妻平夷縣主後，也就居於宣陽坊。阿史那從政入唐前是十二姓突厥藥賀特勤，比照突厥默啜子左賢王墨特勤在長安的宅第是街西的懷德坊，推測對於入唐突厥可汗之子，唐廷皆在街西的里坊安置。二是，與其父祖輩居住地點有關。例如：阿史那懷道其父為阿史那斛瑟羅，垂拱初徙居內地，授右玉鈴衛將軍兼濠池都護，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sup>87</sup>推測按例將擔任右玉鈴衛將軍的斛瑟羅安置在街西的居德坊，而懷道則承襲其父，居住在街西。

第三、突厥人所居住的里坊，也是同一時期重要官僚、皇室宗親居住的地區。例如：阿史那摸末所居住的宣陽坊，為萬年縣縣廨所在地，隋恭帝楊侑禪位後，也曾住在宣陽坊西南隅的淨域寺。唐高祖李淵妻子竇氏也是住在宣陽坊。<sup>88</sup>住在隆慶坊的史善應，太宗時重臣中書令馬周也住在隆慶坊東南隅。<sup>89</sup>醴泉坊住有突厥人俾失十囊，武則天的愛女太平公主、中書令宗楚客、<sup>90</sup>右衛大將軍・揚州都督・褒國公段志玄也住在這裡。<sup>91</sup>茲製表整理如文末〔附表三〕。

此外，多數突厥人的居住地，圍繞在商業繁華的東西兩市附近里坊。從文末〔附表一〕可知，超過七成的突厥人居住鄰近東西兩市的里坊，這其中有六個緊鄰兩市。兩市靠近皇城、宮城，約有十萬餘家的店鋪，是工商貿易活動的中心地區。<sup>92</sup>宣陽坊與醴泉坊分別是街東、街西住宅數量最多的里坊，<sup>93</sup>勝業坊東與興慶宮為鄰，南與東市相接，西為人口最為密集的崇仁坊，住戶密度高。<sup>94</sup>因此，整體而言，突厥人所居住多是位在商業繁榮，人口、宅第眾多密集的地區，可說是長安城黃金地段的「蛋黃

<sup>87</sup> 《舊唐書》，卷 194 下，〈突厥傳下〉，頁 5190。

<sup>88</sup> 宋敏求 撰，辛德勇、郎潔 點校，《長安志》，卷 8，〈唐京城二・宣陽坊〉，頁 279。

<sup>89</sup> 宋敏求 撰，辛德勇、郎潔 點校，《長安志》，卷 9，〈唐京城三・興慶坊〉，頁 305。

<sup>90</sup> 宋敏求 撰，辛德勇、郎潔 點校，《長安志》，卷 10，〈唐京城四・醴泉坊〉，頁 337。

<sup>91</sup> 徐松 撰，李健超 增訂，《增訂唐兩京城坊考（修訂版）》，卷 4，〈西京・醴泉坊〉，頁 227—228。

<sup>92</sup> 王社教，〈論唐都長安的人口數量〉，頁 93。

<sup>93</sup> 曹爾琴，〈唐長安住宅分布〉，頁 77。

<sup>94</sup> 王社教，〈論唐都長安的人口數量〉，頁 105。

區」。

第四、突厥人的居住地也是胡寺的集中地。例如：義寧坊有一所波斯胡寺（大秦寺）；<sup>95</sup>祆教寺則分布在布政坊（二所）、<sup>96</sup>醴泉坊（二所）、<sup>97</sup>靖恭坊（一所）<sup>98</sup>等地區。由此可見，當時除了有突厥人外，應也有大量的西域民族居住在此地區。

## 五、結論

唐長安城承襲隋大興城，整座城市分為宮城、皇城、三苑與外郭城等四部分組成，總面積超過一百平方公里，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都城。

唐太宗貞觀四年平滅東突厥後，大量突厥部落入徙中原，唐廷設置羈縻府州安置。此外，還有數千家近萬人入居長安城。傳統史籍文獻對於這些在長安城內突厥人的居住地點語焉不詳，透過目前所蒐集到唐代突厥人漢文墓誌中，入居長安城且有明確記載居住地者有十五人，我們可以得出突厥族居住在長安城分布的幾個特點：一是，所有在長安城有宅第的突厥人都是在朝五品以上中高階級的官員。二是，住在朱雀大街街東的有五人，街西有十人，所有突厥人都居住在延興門和延平門大街以北人口較多的里坊，分布地點多半與其所擔任的官職有著對應關係，也就是右軍將領住在街西，左軍將領住在街東，少部分的人的居住地則是與其身分或承襲其父祖宅第有關。三是，大體而言，突厥人所居住的里坊緊鄰東西兩市，商業繁華、人口眾多，同時也是官僚、皇室宗親居住的地區。四是，突厥人居住的里坊，亦有大量其他民族，宗教信仰多元，因此坊內除了有佛教與道教的寺觀外，也是祆寺、大秦寺等胡寺集中的地區。

2017年9月18日 初稿

2017年9月22日第二次修改

<sup>95</sup> 宋敏求撰，辛德勇、郎潔點校，《長安志》，卷10，〈唐京城四·義寧坊〉，頁341。

<sup>96</sup> 宋敏求撰，辛德勇、郎潔點校，《長安志》，卷10，〈唐京城四·布政坊〉，頁329。

<sup>97</sup> 宋敏求撰，辛德勇、郎潔點校，《長安志》，卷10，〈唐京城四·醴泉坊〉，頁337。醴泉坊的祆寺，其中一所被稱為波斯胡寺。

<sup>98</sup> 宋敏求撰，辛德勇、郎潔點校，《長安志》，卷9，〈唐京城三·靖恭坊〉，頁309。

〔附圖一〕唐代長安宮城、皇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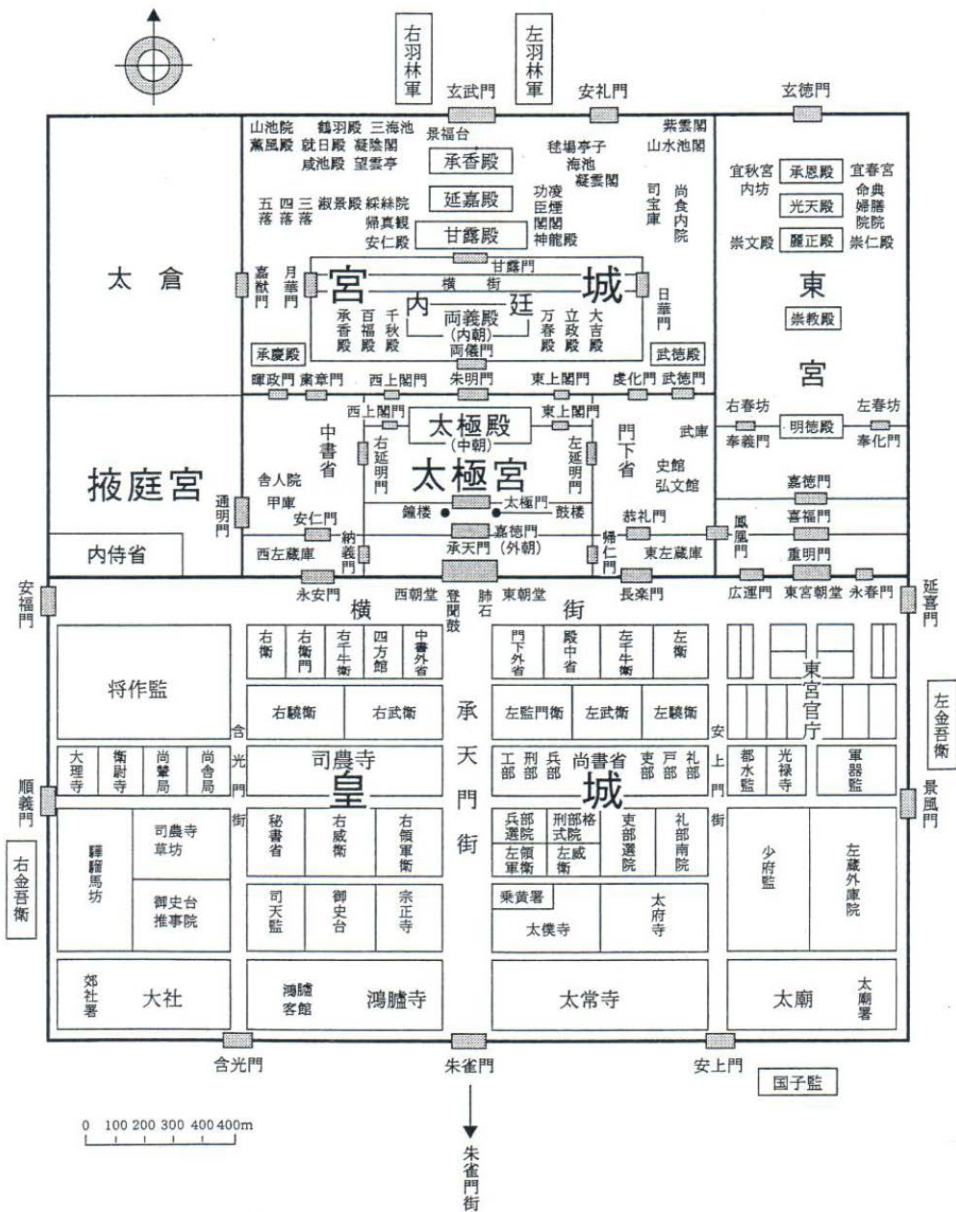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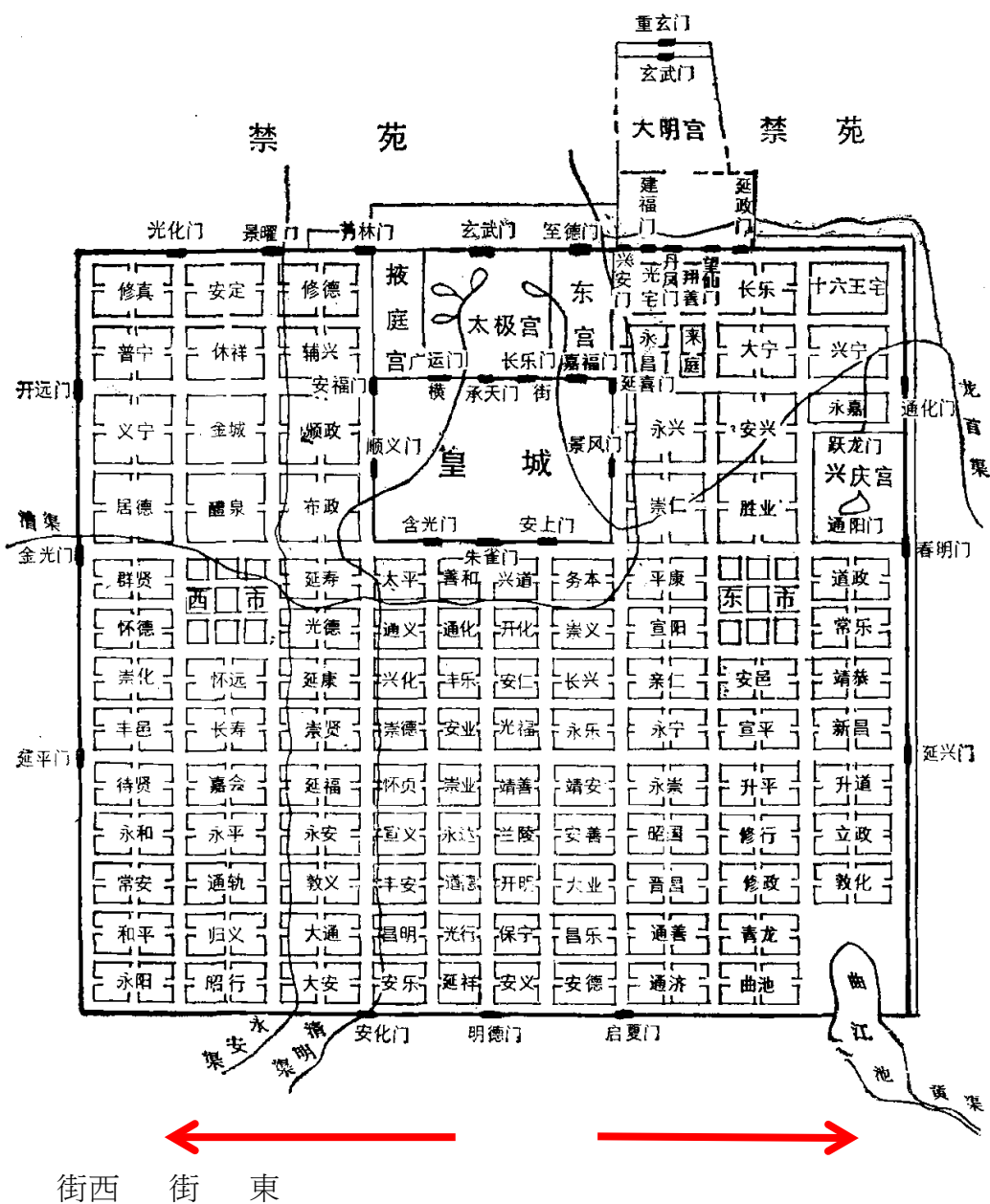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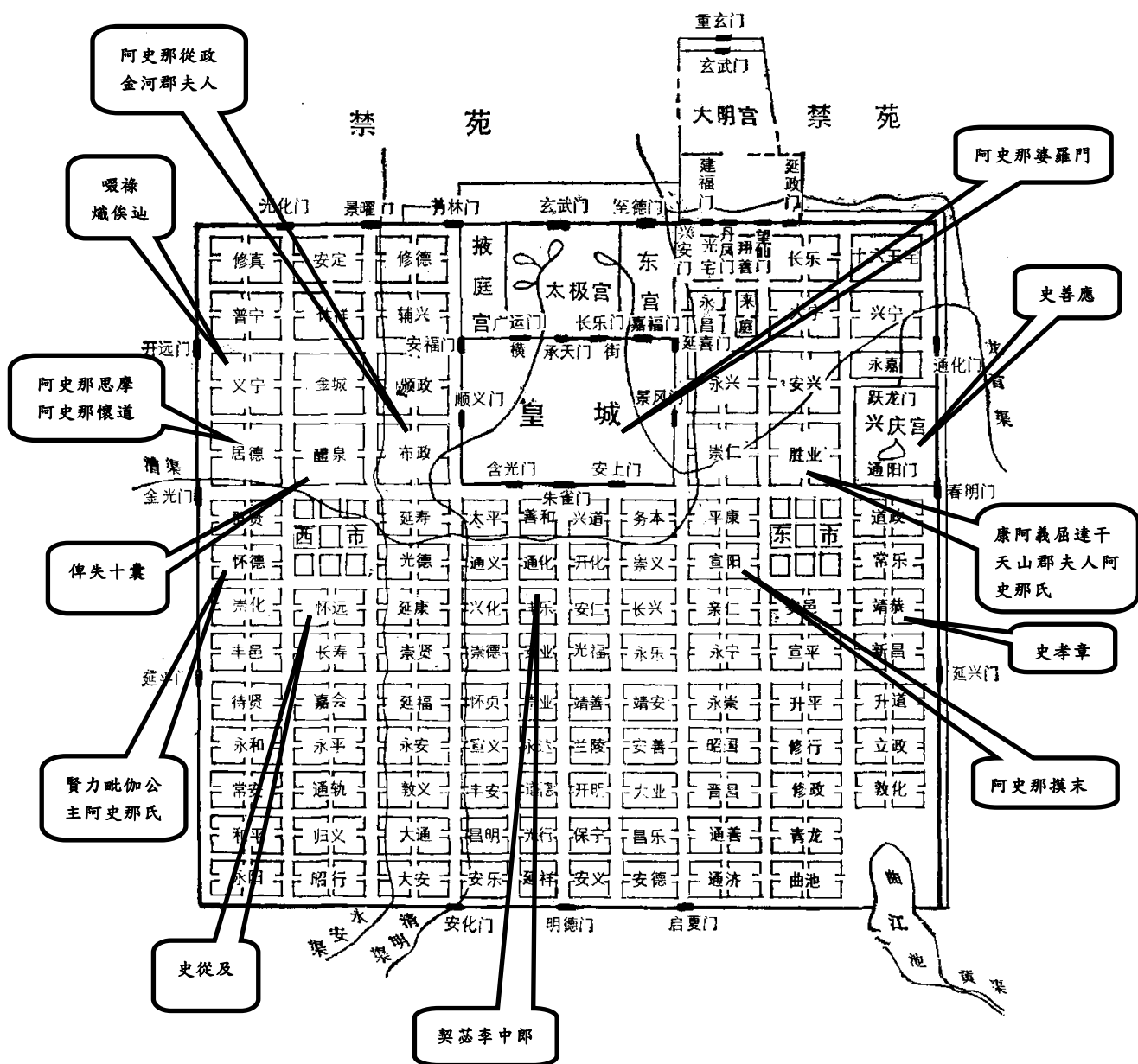
圖32 長安的宮城・皇城（妹尾，2001年）

出處：妹尾達彦，《長安の都市計画》，頁123，圖32。

〔附圖二〕唐代長安城圖



〔附圖三〕突厥人入居長安城分布圖



〔附表一〕突厥族入居長安城地域表

誌主	生活時代	居住地	長安城位置
阿史那思摩（李思摩）	隋文帝至唐太宗 583—647	居德里	街西（西市西北）
史善應	隋文帝至唐太宗 594—642	隆慶里	街東（興慶宮）
阿史那摸末	隋煬帝至唐太宗 607—649	宣陽坊	街東（東市西、萬年縣縣廨）
阿史那婆羅門	約唐太宗至唐高宗 ？—651	皇城內	
阿史那懷道	唐高宗至唐玄宗 670—727	居德坊	街西（西市西北）
阿史那從政	唐高宗至唐睿宗 673—710	布政坊	街西（西市東北）
啜祿	約唐高宗至唐玄宗 676—740	義寧坊	街西
熾俟迺	唐中宗至唐玄宗 684—752	義寧坊	街西
俾失十囊（伊羅友闕頡斤十囊）	武周至唐玄宗 688—738	醴泉坊	街西（西市北）
契苾李中郎	約唐玄宗 ？—744	蒿街（通化坊）	街西
康阿義屈達干	武周至唐代宗 690—764	勝業坊	街東（東市北）
天山郡夫人阿史那氏	武周至唐玄宗 693—746	勝業坊	街東（東市北）
賢力毗伽公主阿史那氏	武周至唐玄宗 698—723	懷德坊	街西（西市西） 突厥默啜子右賢王墨特勤京師私第
金河郡夫人阿史那氏	唐玄宗至唐代宗 742—764	布政坊	街西（西市東北）
史從及	唐代宗至唐武宗 786—841	懷遠坊	街西（西市南）
史孝章	唐德宗至唐文宗 800—838	靖恭坊	街東（東市東南）

〔附表二〕入居長安突厥人官職官品表

姓名	生前官職	官品	備註
阿史那思摩 (李思摩)	右武衛大將軍・懷化郡王	職事官：正三品 爵：從一品	陪葬唐太宗「昭陵」
史善應	左衛將軍・弓高侯	職事官：從三品 爵：從三品	
阿史那摸末	右屯衛將軍	職事官：從三品	夫人平夷縣主李氏
阿史那婆羅門	右屯衛郎將	職事官：正五品上	頡利可汗子
阿史那懷道	特進・十姓可汗・濠池大都護・左金吾衛大將軍	散官：正二品 職事官：濠池大都護（從二品）、左金吾衛大將軍（正三品）	妻瀚海國夫人安氏
阿史那從政	左金吾衛大將軍	正三品	
啜祿	冠軍大將軍行右武衛大將軍	散官：正三品 職事官：正三品	妻滎陽郡夫人鄭實活
熾俟迎	游擊將軍・右武衛中郎將	散官：從五品上 職事官：正四品下	
俾失十囊 (伊羅友闕頡斤十囊)	特進・右衛大將軍・雁門郡開國公	散官：正二品 職事官：正三品 爵：正二品	
契苾李中郎	九姓突厥	不詳	卒逝後唐追贈右領軍衛大將軍（正三品職事官）
康阿義屈達干	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	散官：正二品 職事官：正三品 勳官：正二品 爵：正二品	
天山郡夫人 阿史那氏	天山郡夫人	三品已上母妻，為郡夫人	夫為羽林軍大將軍（正三品職事官）張羲之
賢力毗伽公主 阿史那氏	雲中郡夫人	三品已上母妻，為郡夫人	骨咄祿默啜可汗女。夫為駙馬都尉（從五品下階武散官）・特進（正二品文散官）兼左衛大將軍（正三品職事官）・雲中郡開國公（正二品

姓名	生前官職	官品	備註
			爵)・踏沒施達干阿史德覓覓。
金河郡夫人 阿史那氏	金河郡夫人	三品已上母妻，為郡夫人	夫為節度副使・太常卿（正三品職事官） 公曳鶻祧賢
史從及	朝議郎行太府寺丞・上柱國	散官：正六品上 職事官：從六品上 勳官：正二品	
史孝章	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朝散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散官：從五品下 職事官：檢校戶部尚書（正三品）、御史大夫（從三品）	

〔附表三〕外郭城所住入唐突厥人及其他人物表<sup>99</sup>

里坊	入唐突厥人	其他人物
宣陽坊	阿史那摸末	隋恭帝楊侑、杞國公竇毅、虢國夫人楊氏、韋嗣立、駙馬獨孤明、秋官尚書・譙國公李晦、韋溫、恩國公主、尚書左僕射・舒國公韋巨源、陝州刺史劉希進、少府監楊務廉、國子祭酒韋叔夏、光祿卿單思遠、刑部尚書李義、益州長史李袞、太子賓客鄭惟忠、兵部尚書郭元振、司空兼右相楊國忠、右羽林大將軍高仙芝、京兆府尹李齊物、司徒薛平、右驍衛大將軍韓公武、麟台正字陳子昂、禮部員外郎常無名、將作監韋文恪、右神武統軍張義潮、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琅邪公牛秀、絳州司戶參軍慕容知敬、朝散大夫行少府監中尚署令王定、宣議郎行邛州火并縣丞驍騎尉韋瑱、朝散大夫・遂州司馬董務忠、朝散郎行潞州長子縣尉王怡、通議大夫守太子詹事・上柱國源光乘、朝議郎行殿中侍御史張翔、鄴國大長公主、曹王李皋、開府儀同三司行左衛領軍衛上將軍・陽城郡王秦朝儉、處州刺史趙璜、左神策軍散兵馬使押衙充昭戈都督知兵馬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楊公、駙馬都尉郭曖、楊鈺、通議大夫守太子詹事・上柱國源光乘
勝業坊	康阿義屈達干、天山郡夫人阿史那氏	薛王李業、寧王李憲、禮部尚書韋行儉、銀青光祿大夫薛繪、左散騎常侍徐堅、太僕卿・駙馬都尉豆盧建、禮部尚書席豫、中書舍人朱巨川、朝散大夫守司農少卿・隴西縣開國男李條、宣州司功參軍魏邈、奉義郎試洋王府長史吳達、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處存、羽林軍士王忠憲、司門令史辛察、左衛將軍・上開府考城縣開國公獨孤開遠、通議大夫索君、使持節八州諸軍事・洪州都督・上柱國・濮陽郡開國公吳廣、尚書吏部郎中張仁祿、朝議郎行蓬州宕渠縣令王思齊、尚書右僕射楊再思、濟陰郡王・李嗣莊、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鄭績、雲麾將軍・左驍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瑯琊縣開國公王守言、游擊將軍守撫王麻典軍裴華、中書司郎平章事韋德載、振武監軍使楊公、建平公主（衛國公

<sup>99</sup> 本表係依徐松撰，李健超增訂，《增訂唐兩京城坊考（修訂版）》；楊鴻年，《隋唐兩京城坊里譜》整理編製。

里坊	入唐突厥人	其他人物
		主)、李訓
隆慶坊	史善應	中書令馬周、尚書左僕射・溫國公蘇良嗣、越州都督于德芳、秘書監安喜縣子崔澄
靖恭坊	史孝章	駙馬都尉楊慎交、中書舍人王敬從、忠武將軍行薛王府典軍・上柱國・平棘縣開國男李無慮、輔國大將軍符璘、秘書監韋建、太常卿韋渠牟、吏部郎中元魯、翰林學士吳通微、刑部尚書楊汝士、驃騎大將軍論惟賢、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史孝章父)、太常卿崔邠、尚書司門員外郎仲子陵、開州司馬宋申錫、太子賓客盧携、紀王府主簿李玄濟、右威衛將軍李吉、右羽林胄曹參軍賈澄、陳王府長史崔尚、洛交郡長史・上柱國趙懷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常山縣開國子崔祐甫、朝散大夫・硤州司馬劉宗意、太原府折衝向清、湖州刺史張士階、朝散大夫守將作少監兼通事舍人知館事御史中丞苗鎮、長安縣丞庾游方、朝議郎守殿中少監兼通事舍人知館事・上柱國苗弘本、司農卿韋玢、太子太傅崔彥昭、吏部郎中韋元魯、
通化坊	契苾李中郎	行台左僕射・鄆國公殷開山、秘書監顏師古、太常少卿歐陽詢、著作郎沈越賓、鄭國夫人楊氏、京兆尹韋武、曹州司法參軍・秘書省麗正殿二學士殷踐猷、宣安郡王、京兆府美原縣丞元復業、國子監補記博士趙正卿、游擊將軍守左領軍衛翊府郎將曹惠琳、光祿卿韋師真、鄭國夫人楊氏
布政坊	阿史那從政、 金河郡夫人阿 史那氏	侍中魏知古、中書令蕭嵩、左神武大將軍・河間郡王舍利澄、功曹參軍梁君、朝議郎行尚書倉部員外郎・集賢院待制權自挹、尚書都官令史王璿、司戈張無是、王君愕、司徒・并州都督・上柱國・鄂國忠武公尉遲敬德、右翊衛陶後興、秘閣直司登仕郎王方大、秋官尚書・秀容縣開國男爾朱杲、國子祭酒嗣韓王李訥、中書省主事孫進、博陵郡夫人李氏、江陵郡太君高氏、寧遠將軍守太原府志節府折衝都尉梁朝、朝議郎行宣州司法參軍・上柱國王叔寧、文林郎守江州彭澤縣尉王常散、開府儀同三司竇弋、太子賓客竇希球
醴泉坊	俾失十囊(伊 羅友闕頡斤十 囊)	太平公主、中書令宗楚客、輔國大將軍・右衛大將軍・揚州都督・褒國公段志玄、游擊將軍張希古、朝散大夫行定王府掾獨孤思敬、左萬騎使薛莫、翊府右郎同正員・上柱國康景雲、冠軍大將軍行右威衛將軍・上柱國・金城郡開國公李仁

里坊	入唐突厥人	其他人物
		德、明威將軍・左龍武軍中郎將徐承嗣、左神策軍散副將・游擊將軍守武衛大將軍米繼芬、靈台司辰官高公、申王李撝、安金藏、金士安令節
義寧坊	啜祿、熾俟迎	尚書右僕射戴至德、青城縣令達奚思敬、右龍武軍宿衛閭庭萼、蘇州別駕沈裕、雲麾將軍・左龍武軍將軍郭文喜、昭陵令李昕、奉天定難功臣雲麾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兼試太常卿・上柱國・開國伯・右神策軍副將專知苑內都巡張寵、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守右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廬江郡開國公何文哲、朝議郎行慈州長史李霸
居德坊	阿史那思摩、阿史那懷道	司禮太常伯劉祥道、房州刺史杜元徽、左驍衛將軍折氏、洗馬蘇君、聞喜縣主、文林郎桓表、雲麾將軍・右龍武軍將軍何德
懷德坊	賢力毗伽公主 阿史那氏	天官侍郎李志遠、朝議郎行澤王府主簿梁寺、楚州兵曹參軍劉崱、李神通、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上柱國・廬國公程知節、游擊將軍賈利休，孝王李亮、右賢王墨特勤

## 徵引資料

### 正史

唐・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傳統史籍文獻

唐・吳兢 撰，謝保成 集校，《貞觀政要集校》，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唐・李吉甫 撰，賀次君 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唐・李林甫 等撰，陳仲夫 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唐・杜佑 撰，王文錦、王永興、劉俊文、徐庭雲、謝方 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唐・韋述 撰，辛德勇 點校，《兩京新記輯校》，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6 年。

唐·劉餗 撰，程毅中 點校，《隋唐嘉話》，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北宋·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北宋·宋敏求 撰，辛德勇、郎潔 點校，《長安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 年。

北宋·程大昌 撰，黃永年 點校，《雍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清·徐松 撰，李健超 增訂，《增訂唐兩京城坊考（修訂版）》，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年。

清·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清·董誥 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 石刻墓誌

北京大學圖書館金石組、胡海帆、湯燕、陶誠 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歷代墓誌拓片目錄（上、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吳鋼 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二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 年。

吳鋼 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三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年。

吳鋼 主編，《全唐文補遺》，第四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 年。

吳鋼 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五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年

張沛 編著，《昭陵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 年。

張德臣 編著，《渭城文物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年。

趙力光 主編，《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北京：線裝書局，2007 年。

趙文成、趙君平 編選，《新出唐墓誌百種》，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 年。

### 近人專書、譯著

王靜，《中古城建城傳說與政治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史念海，《中國古都和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李鴻賓，《唐朝中央集權與民族關係——以北方區域為線索》，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

李鴻賓，《唐朝朔方軍研究——兼論唐廷與西北諸族的關係及其演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張永祿，《唐都長安（增訂本）》，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

閻德華，《突厥與其他民族關係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年。

楊鴻年，《隋唐兩京考》，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

楊鴻年，《隋唐兩京坊里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趙振華，《洛陽古代銘刻文獻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

劉統，《唐代羈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

足立喜六 著，王雙懷、淡懿誠、賈云 譯，《長安史迹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

妹尾達彥，《長安の都市計画》，東京：講談社，2001年。

### 近人論文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發掘隊，〈唐代長安城考古紀略〉，《考古》，1963年第11期（1963.11）。

王社教，〈論唐都長安的人口數量〉，史念海 主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12 增刊）「漢唐長安與關中平原」。

朱玉麒，〈隋唐文學人物與長安坊里空間〉，榮新江 主編，《唐研究》，第九卷（2003.12）。

朱振宏，〈「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的再檢討〉，《隋唐政治、制度與對外關係》，台北：文津出版社，2010年。

朱振宏，〈唐太宗「渭水事件」論析〉，《隋唐政治、制度與對外關係》。

朱振宏，〈論貞觀十三年（639）「九成宮事件」及其影響〉，《隋唐政治、制度與對外關係》。

- 朱振宏，〈阿史那婆羅門墓誌箋證考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二十八輯（2012.12）。
- 朱振宏，〈附錄貳、大業十一年（615）「雁門事變」探微〉，《西突厥與隋朝關係史研究》，台北：稻鄉出版社，2015 年。
- 朱振宏，〈突厥第二汗國建國考〉，《歐亞學刊》，第十輯（2011.11）。
- 辛德勇，〈《冥報記》報應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縱心所欲——徜徉於稀見與常見書之間》，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 辛德勇，〈八、大興城的坊數及其變化和城東南隅諸坊〉，《隋唐兩京叢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年。
- 辛德勇，〈十、善和、通化與光祿、殖業四坊〉，《隋唐兩京叢考》。
- 辛德勇，〈三十四、都亭驛考辨——兼述今本《長安志》通化坊闕文〉，《隋唐兩京叢考》。
- 林超民，〈羈縻府州與唐代民族關係〉，《思想戰線》，1985 年第 5 期（1985.10）。
- 武伯綸，〈唐萬年、長安縣鄉里考〉，《考古學報》，1963 年第 2 期（1963.2）。
- 孫英剛，〈隋唐長安的王府與王宅〉，榮新江 主編，《唐研究》，第九卷。
- 曹爾琴，〈唐代長安城的里坊〉，《人文雜誌》，1981 年第 2 期（1981.2）。
- 曹爾琴，〈唐長安住宅分布〉，史念海 主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12 增刊）「漢唐長安與關中平原」。
- 蒙曼，〈唐代長安的公主宅第〉，榮新江 主編，《唐研究》，第九卷。
- 譚其驤，〈唐稱長安為西京不始於天寶元年〉，《長水集續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
- 嚴耕望，〈唐代長安人口數量之估測〉，《嚴耕望史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 妹尾達彥，〈唐長安城の官人居住地〉，《東洋史研究》，第 55 卷第 2 號（1996.6）。

# 成吉思汗西征

金兆鴻

前文大、輔大兼任教授

## 摘要

蒙古三次西征，在世界史上絕對是一件大事，首開其端的是大蒙古國（伊克·蒙兀爾·烏魯斯）創建者成吉思汗鐵木真，渠討伐花刺子模，掀起其後由其子及孫的另兩次西征，對於蒙古西征，雖然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歷來史家對蒙古西征的評價褒貶不一，而其所以西征，更有深入探討必要，而其討伐花刺子模完全攻滅該國後，其王摩訶末二世之予札蘭丁之下落，以往各書僅稱札蘭丁跳入印度河脫逃，未作進一步之追究，另者成吉思汗之西征，究竟應否納入國史，凡此均值得探討，本文擬就以上各點加以析論。

**關鍵詞：**成吉思汗、西征、花刺子模、札蘭丁

## 一、關於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姓孛兒只斤（或作博爾濟錦），諱鐵木真，係蒙古族，而蒙古族乃是北方草原游牧諸民族最晚登上歷史舞台者，其名首見於兩《唐書》，作「蒙兀」、「蒙瓦」，屬於室韋之一部，近代學者頗多考證，「室韋」即「鮮卑」之諧譯，因此可以認定蒙古為東胡系民族，與肅慎系民族（如女真）有其不同之處，鮮卑系民族在中國歷史長河中，曾寫下輝煌的篇章，建立過四個正統王朝（所謂正統王朝，係指有「正史」記載其史事之政權，如北魏、北周、北齊、契丹，其中北齊之高氏，雖自稱系出渤海豪門高氏，但論者多疑其係攀附高門，何況高歡一門已完全鮮卑化），地方性政權則有諸胡列國時代（按即一般史書所稱之五胡十六國，

但事實上當時既不止五胡，也不止十六國，因此稱諸胡列國較為妥適）之前燕、後燕、南燕、西燕、北燕、南涼、西秦等七個政權，鮮卑族在歷史舞台上之能量，僅次於漢人（此處稱漢人而不稱漢族者，蓋民族之構成，血緣雖非唯一要素，卻是重要元素，秦漢時代之漢人，已包括華夏、東夷、百越及荊吳四大系民族，之後四周民族不停融入漢人之中，越至晚近，漢人之內涵越多元，因此稱漢人而不稱漢族較合於史實），蒙古族承東胡系民族之遺緒，在歷史上綻放光芒，可說是其來有自。

兩《唐書》成書均晚於十世紀，換言之西元十世紀時，中原始知有蒙古之族，縱然依《蒙古秘史》所載，自成吉思汗鐵木真往前推，也僅推到二十五代，一般以三十年為一代，二十五代約七百五十年，鐵木真生於西元 1155 年（另有各種說法，此處採西元 1155 年說），往前推七百五十年，約為西元 400 年左右，正是北魏初建未久，諸胡列國尚未完全消失，蒙古族始祖孛兒帖赤若，馬埃豁蘭勒（即所謂蒼狼、白鹿）在西元五世紀時始出現於傳說，而當時北方草原諸多游牧民族，早已在歷史舞台上發過光發過熱，所以說蒙古族是北方草原最晚登上歷史舞台的游牧民族，是信而有徵的。

當孛兒帖赤若下傳第十二代孫時，其妻阿蘭豁阿於夫死後，又生三子，在神話傳說中，稱阿蘭豁阿的懷孕是超自然的，此段神話在《蒙古秘史》與波斯史家拉施特（Rashid ad-Din）的《史集》中，都記載了這件事，據《史集》稱她之所以無夫而生子，是因為：

「我每夜都夢見一個紅髮藍眼的人慢慢地向我走近來然後又稍稍地轉了回去，我看得很真，你們對我的任何懷疑都是不對的，我所生的這些兒子，都屬於特殊種類，他們長大了要成為萬民的君主和汗，到那時，你們和其他合剌出（指不屬於今吉思汗氏族的部落）部落才會明瞭我這是怎麼回事！」<sup>1</sup>

這一段神話式傳說，喬治沃爾納德斯基（George Vernadsky）解釋為：

「景教徒在蒙古布道所傳有關馬利亞的故事，可能變成

<sup>1</sup> 見拉施特《史集》，余大鈞、周建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年，第一卷第二分冊，頁 12~13。

《蒙古秘史》中神話的來源。」<sup>2</sup>

這可能由於喬治沃爾納德斯基氏未詳讀早於蒙古族傳說中的始祖孛兒特赤若一個多世紀，鮮卑族檀石槐誕生的記載，據《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書》，關於檀石槐之誕生，大略為：鮮卑有投鹿侯者，從匈奴軍三年（按東漢季世，有匈奴自號鮮卑者，也有鮮卑投匈奴軍者），其妻在家，有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其妻言之曰：「嘗晝間聞雷震，仰天視而電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長之。」投鹿侯固不信，其妻乃語予外家收養焉，號檀石槐。阿蘭豁阿無夫生子與投鹿侯之妻生檀石槐，所編造之神話，何其相似，設若喬治沃爾納德斯基讀過《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想來應不會將阿蘭豁阿無夫生子一事，認為是受基督教馬利亞生耶穌之影響。

阿蘭豁阿無夫所生三子中，末子為孛端察兒則為鐵木真之十二代祖，自孛端察兒五傳至海都，蒙古仍是微小部落，海都再三傳至合不勒汗，蒙古族始略有起色，再三傳至鐵木真，改寫了蒙古族歷史。

鐵木真之父為也速該巴阿禿兒，初步統一了若干蒙古部落，在草原上頗有聲望，因蒙古係採行族外婚，因此必須向外族尋覓配偶，遂從正在迎親的篾兒乞人手中，奪取了斡勒忽訥兀惕族美女訶額侖為妻，從此篾兒乞惕與孛兒只斤氏兩族成世仇。也速該既奪得嬌妻，其妻臨盆待產之際，也速該與塔塔兒部作戰，得勝，俘獲塔塔兒部人鐵木真兀格及豁里不花等人，也速該為紀念其戰功，遂將訶額侖所產之子取名鐵木真，其時為西元1155年，南宋高宗趙構紹興二十五年。

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向有早婚習俗，蒙古族也不例外，鐵木真九歲時，其父也速該攜之赴其母斡勒忽訥兀惕處，要為鐵木真尋一合適女子為妻，當行經弘吉剌部時，遇到該部德薛禪，詢以行止，也速該據實以告，德薛禪見鐵木真器宇非凡，一表人才，其相貌是「面如既望之明月，眼神如飛龍之雙珠，鼻聳如山嶽之高，唇吻如陵阜之厚，面方背長，耳大胸挺，十步之外，威風逼人。」（見史秉麟譯《蒙古青史》，蒙藏委員會出版）且昨夜又曾夢見「一個白海青，兩手拿著日月，飛來我手上立」（見《蒙古

<sup>2</sup> 見喬治沃爾納德斯基著、札奇斯欽譯《蒙古與俄羅斯》，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1955年，第一冊頁14。

秘史》卷二），現見鐵木真隨其父前來，夢中吉兆當應驗於鐵木真，此因德薛禪有一女名孛兒帖，年十歲，長得也是面貌姣好，有意與也速該結為兒女親家，便對也速該說：「也速該親家，原來你今日將這兒子帶來，應了我的夢，…：俺弘吉剌家……但有顏色的女子，便獻與您皇帝人家，后妃位子裡教坐有來，大凡結親啊，兒孩兒便看他家道，女孩兒便看他顏色，也速該親家，我家裡有個女兒，年幼小哩，同去看來。」（見《蒙古秘史》），遂引也速該父子至其住處，果見其女面貌姣好，長相富貴，心中大喜，當夜也速該父子便留宿德薛禪紮帳之處。次日，也速該為鐵木真向德薛禪求親，德薛禪自是欣然允諾，按照蒙古舊俗，將鐵木真留在準岳父德薛禪處。

也速該在返回自己駐牧處途中，巧遇一塔塔兒部落在舉行宴會，按草原上之禮儀，不能拒絕其邀宴，但蒙古與塔塔兒原有舊仇，也速該在宴後歸途中，發現為塔塔兒所毒，腹痛如絞，幾不能支，但仍勉力前進，甫抵駐牧地，毒性大發，遂對身邊之蒙力說明被塔塔兒人所害，並命其往弘吉剌部接鐵木真回來。說罷毒發身死，蒙力克依言往弘吉剌部將鐵木真接回，從此鐵木真失怙，與寡母幼弟相依為命。

也速該原為一部之長，有頗多部眾，但也速該一死，部眾多離之而去，而俺巴孩後裔泰亦赤烏惕氏更將鐵木真母子撇下，而將也速該之部眾裹脅而去，鐵木真一家人從此孤苦零丁，幸賴寡母訶額侖茹苦含辛教養鐵木真及諸弟妹，其間歷盡艱辛，甚至受到泰亦赤兀惕部人襲擊，鐵木真且被捕，但憑其機智而得逃脫，幾年後，鐵木真成了極其勇武的青年戰士。

某日，有人將鐵木真母子僅有之九匹馬中之八匹劫走，鐵木真騎上所餘一匹前去追趕劫馬者，途中得到孛斡兒出的協助，終將被劫走之馬追回，兩人遂成為莫逆之交，且願意接受鐵木真之領導、指揮，孛斡兒出後來成為蒙古帝國著名將領之一。未幾，鐵木真想到與德薛禪之女孛兒帖定有婚約，遂率其弟別勒古台前往弘吉剌部迎娶孛兒帖，德薛禪並未忘記之前的婚約，也未因也速該已死而部眾離散而毀約，仍然依約將女兒孛兒帖嫁鐵木真，並將其為珍貴之黑貂鼠皮襖作為女兒之陪嫁物，更親自送鐵木真夫婦到訶額侖母子駐牧之處，而後始返回弘吉剌部，德薛禪可說是相當信守承諾的君子。

鐵木真深知在草原上生活憑藉的是實力，目前自己一家人少力弱，雖有孛斡兒出的加入，就力量而言，仍然微不足道，他想到其父也速該生前與克烈部長王汗交稱莫逆，而克烈部在漠北草原實力強大，於是就以妻子孛兒帖陪嫁之黑貂鼠皮襖作為與王汗會晤的見面禮，面見王汗時鐵木真說：

「你與我父親契合，便是父親」一般，今將我妻上見公姑的禮物，將來與父親。」

王汗得此名貴之黑貂鼠皮襖大為高興，便對鐵木真說：

「你離了的百姓，我與你收拾，漫散了的百姓，我與你完聚，我心下好生記著。」（以上兩段引文均見《元朝秘史》）

克烈部其勢力範圍約在今外蒙古中部，克烈部是突厥回紇之族，但已經蒙古化了，而王汗原名脫斡鄰勒，曾受女真金封之為「夷离堇」（原為契丹語，其意略同於王，而金朝沿用之），而又自稱汗，因此許多文獻中遂稱之為王汗而不名，有時又作翁汗。有可能九世紀時，黠戛斯擊破回紇汗國時，回紇之眾四處逃亡，仍留在漠北草原之回紇遂成為十二世紀時的克烈與乃蠻，當然此一推論仍有待證實。在十二世紀中末葉時克烈部確為漠北草原上之強力部族，鐵木真得到克烈部長王汗的支持，確實有助於提高鐵木真在草原上的地位，至少在感覺上不再是孤立無援。

當初也速該從篾兒乞人手中奪得妻子訶額侖，按篾兒乞人駐牧於今貝加爾湖東岸，當篾兒乞人得知也速該已死，而鐵木真新婚但人少勢弱，遂興起復仇之念，乃率眾南下襲擊鐵木真，由於事出突然，鐵木真等人不及抵抗只得逃往不兒罕山，其新婚之妻因無坐騎，而被篾兒乞人所擄，篾兒乞人一行擄得孛兒帖後隨即離去，鐵木真乃得免於難，認為是得到不兒罕山的庇佑，乃向天立誓說：「我的小小性命，被不兒罕山遮救，這山久後時常祭祀，我的子子孫孫，也一般祭祀。」由於妻子被擄，更要設法奪回，但也深知憑他一己之力，絕不可能成事，於是便向克烈部長王汗求助，王汗得知詳情，當即便說：

「去年你與我貂鼠襖子來時，我曾說離了的百姓，我與你收聚，我心上常記著有來，我如今依著那言語，將篾兒乞特每滅著，你妻孛兒帖還救與你，你可教札木合兄弟知道，他在豁

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裡住著，我這裡起二萬軍馬做右手，教札不合起二萬軍馬做左手，相約會的日子，教札木合定奪來。」

（見《蒙古秘史》，其中蔑兒乞特，即蔑兒乞，「特」係蒙古多數之語尾音，「每」係元、明時，漢語複數詞，等同今日之「們」；札木合係鐵木真之好友）

果真在王汗與札木合幫助下，進擊蔑兒乞，大獲全勝，不但奪回孛兒帖，往日離散的百姓，也紛紛來歸，於是鐵木真有了自己的人民，聲名大震，時為西元 1177 年，鐵木真二十三歲，南宋孝宗趙昚（昚，音慎，吃驚瞪眼之意）淳熙四年。自此之後，鐵木真與王汗多次合作向草原擴張，實力大為增強，散處漠北的蒙古札剌亦兒氏、塔兒忽惕氏、乙牙惕氏、巴魯剌思氏、阿魯剌惕氏、別速惕氏、速勤都思氏、晃豁壇氏、捏兀歹氏、豁剌思氏、斡羅訥兒氏、巴阿鄰氏及兀良哈等族都來投奔鐵木真，聲勢大振，其時阿勒壇忽察兒、撒察別乞等商議要擁立鐵木真為汗，其中阿勒壇忽察兒是忽圖剌汗之子，地位舉足輕重，既作此提議，各氏族自是一致贊成，於是鐵木真稱蒙古汗，時為西元 1189 年，鐵木真三十九歲。

據《蒙古秘史》所載，在鐵木真之前，雖也有稱汗的，如海都、合不勒罕、忽圖剌、俺巴孩等，但力量都不大，甚至於只是《蒙古秘史》溢美之稱，充其量只能算是部落酋長而已，但是鐵木真之稱汗，確實是統一了部落林立的蒙古，可以說是真正蒙古的汗，自是蒙古民族統一在一個領袖領導之下。這對蒙古族而言，是走到歷史的拐點，將有驚天動地的變化，然而與蒙古族相鄰，且一手扶助鐵木真茁壯的克烈部長王汗，竟然毫無危機意識，當鐵木真親自到王汗駐牧地黑林，告以自己受蒙古部眾擁戴稱蒙古汗時，王汗還對鐵木真說：

「鐵木真他做了皇帝好生是，您達達每若無皇帝呵如何過，您每休把原商量的意思壞了。」（見《蒙古秘史》，達達係指蒙古，從此話正證明克烈不是蒙古族）

草原上生存法則是憑實力，強凌弱、眾暴寡是常態，和平共存幾不可能，當蒙古汗鐵木真實力日見壯大之後，認為克烈的存在，是蒙古發展的障礙，基於「成亡敗寇」的原則，而《蒙古秘史》又是唯一記載鐵木真與

王汗交惡的文獻（拉施特的《史集》可說《蒙古秘史》的波斯文版），因此雙方交惡其咎理所當然的歸之於王汗，而鐵木真稱蒙古汗後，與其執友札木合也形成對立，竟訴諸兵戎，雙方列陣於闐巴勒主惕（其地約當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呼倫湖附近），由於是札木合發起戰爭，鐵木真倉促應戰，準備不周，兩軍甫經接觸，鐵木真不敵敗，此即所謂十三翼之戰；此戰札木合雖獲勝，但其行為過份殘忍，將親鐵木真之赤那思部族人烹而食之，一共煮了七十幾鍋，據《蒙古秘史》所載：

「札木合於是回去，將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意思為：將赤那思部的所有族長們），教七十鍋都煮了。」

由於札木合過於殘暴，反而促使一批猶豫不決的蒙古部落前來投靠鐵木真，如主兒扯歹就率兀魯兀特全部族人、忽亦勒答兒率忙忽惕氏全部族人，晃豁壇氏的蒙力克也率同他的七個兒子都來投靠鐵木真，鐵木真雖然戰敗，實力反而增強不少。

西元 1193 年（金章宗完顏景明昌四年，南宋光宗趙惇紹熙四年），金朝派完彥襄率兵討伐塔塔兒部，鐵木真得知此一訊息，以塔塔兒部為蒙古之世仇（也速該即被塔塔兒部所毒害而死），認為此乃復仇的良機，鐵木真就聯合克烈部王汗（此時王汗與鐵木真雖有嫌隙，尚未交惡，雙方仍常聯合作戰，以掠奪人畜物資）共同出兵攻打塔塔兒，擒殺塔塔兒酋長篋古真薛兀勒圖，等於有功於金朝，金章宗封鐵木真為「札兀忽里」（其意思同於鎮邊使），這使鐵木真聲望添增不少，此後鐵木真仍多次與王汗合作攻打周邊各部，多有斬獲。

札木合眼見鐵木真聲勢日益壯大，又聯合泰亦赤兀惕、亦乞剌思、大魯剌思、衛拉特、撒兒助特、扎蘭荅及乃蠻等共十二部，於 1201 年大會於阿勒灰不剌河（今烏滸河一帶），共推札木合為共主以對抗鐵木真，確立札木合為「古兒汗」<sup>3</sup>，於是札木合率領十二部聯軍浩浩蕩蕩撲向鐵木真，鐵木真則與王汗組成聯軍，雙方在闊亦田對壘（其地約當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呼倫湖西北、烏滸河旁娃屯果勒一帶），據《蒙古秘史》

<sup>3</sup> 古兒汗或作菊兒汗、西遼耶律大石曾稱菊兒汗，其意大略為汗中之汗，更早回紇曾有葛勒汗其意也同。

所載，札木合軍中的薩滿不亦魯黑·忽都合，施呼風喚雨之術，但是卻將風雨都回吹到札木合陣營中，一時天昏地晦，札木合陣營被吹得人仰馬翻，潰不成軍，鐵木真、王汗聯軍大獲全勝，鐵木真更趁勝收拾了曾欺凌了鐵木真家族的泰亦赤兀惕氏族人，而王汗則率軍追擊札木合，札木合向王汗投降，而王汗接納了其降，此事使鐵木真感到不快，這使雙方嫌隙又加深了一些。

鐵木真的聲勢日見壯盛，此際在今外蒙古中部以東地方（含今呼倫貝爾大草原）都屬鐵木真所有，此時在漠北能與之抗衡者，只有克烈部王汗，及其西的乃蠻部太陽汗，鐵木真的壯盛，使克烈部王汗感到不安，但還不致於動怒，不過降於王汗的札木合對鐵木真的崛起，極不服氣，遂在王汗之前進讒，久之，王汗不免對鐵木真有所不滿，而王汗之弟札合敢不曾為爭奪克烈部汗位，而與王汗構兵，兵敗，在走投無路之際，投奔鐵木真，鐵木真納之，不僅如此，鐵木真還接納了克烈部中之禿別干及董合亦特等氏族，此實有損其與王汗之情誼，從而雙方各有心結，但表面上仍維持合作關係，並且約定共同出兵攻打乃蠻部，就在此際，札木合又向王汗進讒，王汗信了札木合對鐵木真的讒言，逕自撤軍，當鐵木真引軍來時，不見王汗之軍，也只好撤軍，雙方嫌隙幾已表面化，當然以上這些都是《蒙古秘史》所載，基於成王敗寇原則，是否完全合於史實，不能無疑。

克烈、蒙古聯軍進擊乃蠻雖未成事，但乃蠻既知其事，豈肯善甘罷休，遂派其大將可克薩兀撒卜剌黑率軍進擊克烈，王汗大敗，其子亦剌合桑昆之妻及部分百姓都被乃蠻所擄，王汗迫不得已，只好向鐵木真求助，鐵木真不計前嫌立即派孛斡兒出、木華黎、孛羅忽勒及赤剌溫等四傑率兵前往救援，擊敗乃蠻，奪回亦剌合桑昆之妻及部分克烈人民牲畜，王汗自是感激不已，一時之間似是前嫌盡釋重修舊好。此際鐵木真長子朮赤已到結婚之齡，而女兒豁真也已長大待字，鐵木真有意與王汗結為兒女親家，想以王汗之女兀兒別乞為朮赤之妻，以女兒豁真嫁亦剌合桑昆之子禿撒合。關於朮赤，須作一說明，鐵木真新婚未幾，其妻孛兒帖被篋兒乞人所擄，隔年在王汗及札木合協助之下，擊敗篋兒乞人，奪回孛兒帖，此時孛兒帖已懷有身孕，未幾即生下一子，其取名「朮赤」者，蒙語意為「客人」，也即說明朮赤不是鐵木真骨肉。鐵木真想與王汗結為兒女親家，不

無含有盡釋前嫌用意，應屬用意良好，但亦刺合桑昆長期受札木合挑撥，對鐵木真懷有成見，這其中也含有草原上權力競逐，極力反對此一婚事，聯姻遂告不成，鐵木真對聯合王汗一事，也已心灰意冷，札木合又見縫插針，向王汗父子進讒，誣指鐵木真私交乃蠻，這犯了王汗的大忌，札木合更進一步慫恿亦刺合桑昆攻打鐵木真，並說自己願意「自橫衝入去」，另有一些克烈部的人也從旁推波助瀾，聲稱願全力為亦刺合桑昆作戰，亦刺合桑昆由是心動，便去遊說王汗，起初王汗不為所動，經再三懇求，終究血濃於水，而草原上原本就不容雙雄併立，鐵木真壯大已經威脅到克烈的發展，王汗同意「收拾」鐵木真，但是卻不想出兵攻打，而是用計想誣鐵木真前來然後加以殺害。

如何誣得鐵木真到克烈部，最好的藉口莫過於鐵木真所提的兩家聯姻之事，於是騙請鐵木真前來共飲許婚之宴，預備在飲宴時加以殺害，鐵木真不知是計，帶了蒙力克等十多人前往王汗營地，但心思細密的蒙力克左思右想認為亦刺合桑昆既已拒婚在前，何以突然允婚於後，其中可能有詐，乃力勸鐵木真不宜親自赴宴，鐵木真乃採其言，改派不合台、乞刺台兩人前往王汗處，亦刺合桑昆見其計不售，乾脆出兵偷襲鐵木真，由於事出突然，鐵木真大敗，僅餘千餘人退往統格黎克河附近，不久再退往巴勒諸納水（即班朱納水，或作前水泊）附近進行整補，此時只剩下知名戰將及一些部眾共九十五人，仍然追隨鐵木真，這九十五人就是後來大受封賜的九十五功臣，時為西元 1203 年。雖經此敗，鐵木真並不氣餒，奔走於幹難河一帶，得到弘吉剌部的協助，又召回許多部眾，鐵木真深知面對強敵時，鬥智更甚於鬥力，於是向王汗進行滲透戰術，派人遊說王汗試圖軟化王汗，王汗係性情中人，況且與鐵木真曾有二十幾年合作情感，再加上王汗已經年邁神智可能有些退化，果真軟化了，只是亦刺合桑昆仍然鬥志昂揚，無意和解。

鐵木真派其弟哈不圖哈薩兒偽降王汗，於是亦刺合桑昆更加驕縱，以為鐵木真不堪一擊，結果雙方對陣時，鐵木真以閃電戰術，徹底擊潰克烈部，王汗逃往乃蠻時，為乃蠻邊境守將所殺，將其頭顱獻於乃蠻太陽汗，亦刺合桑昆則逃往党項羌的西夏，克烈部眾大部分併入鐵木真，一部分逃往今中亞哈薩克草原，成為後日哈薩克族一個氏族。設若當初亦刺合桑昆

能在戰勝時追擊鐵木真，則不會有今日的下場，鐵木真從此一戰役中領悟到對敵人不能仁慈，必須將之徹底擊潰，不能讓敵人有再起的機會，同時也體會出對敵人必須趕盡殺絕，不留遺子，以杜後患，得知亦剌合桑昆逃往西夏，遂埋下討伐西夏的原因。

鐵木真既攻滅克烈部而擁有其地、其人，同時也就與乃蠻部為鄰，乃蠻部也是突厥、回紇之族，有頗高度文明，而且有足堪使用的文字，其首長為太陽汗，其本名為台不花，其父亦難赤汗死後，台不花與其弟不亦魯黑為爭奪其父亦難汗之妾古兒別速，而訴諸兵戎，不亦魯黑兵敗向南逃亡，台不花遂嗣立為乃蠻部汗，且娶古兒別速為妻，台不花曾協助金朝，被金朝封為王，又自稱汗，於是自稱大王汗，訛讀為太陽汗。乃蠻是漠北大國，一度臣服於統治西域的西遼帝國，西遼是漢文史料的稱謂，西方史冊則稱之為喀喇契丹，是遼宗室於遼亡後，西走西域建立的大帝國，據西方文獻記載，西遼宮廷使用的是漢文、漢語<sup>4</sup>，西遼盛時曾統治今新疆及中亞地區，可見將漢語文推廣到廣狹義的西域是契丹，當時乃蠻稱乃恩蠻，是向西遼稱臣納貢的，但在漠北乃蠻仍是既文明又強大的國家。蒙古鐵木真既與乃蠻為鄰，在草原上只有征服與被征服，沒有和平共存這回事，鐵木真此際不但統一了蒙古各部，又攻滅了克烈部，其聲勢已威脅到乃蠻，彼此衝突遂成為無可避免之事。

乃蠻太陽汗想先發制人，遂派脫兒必塔失為使，去遊說汪古部的阿拉忽失的吉惕忽里（「忽里」意為部長），一起聯兵進擊鐵木真，汪古部不但不同意，反而向鐵木真告密說：

「乃蠻的塔陽（即太陽汗）要來奪你的弓箭，教我做右手，我不肯依從，我如今提省你（「提省」即提醒），若不提防，恐來奪你弓箭。」

鐵木真得此訊息，急忙起而應戰，幾經研商認為與其後發制於人，莫如先發制人，並且使用欺敵戰術，刻意令大將者別、忽必來的士兵騎乘瘦弱的戰馬作為前哨，又故意讓乃蠻的哨兵發現，於是哨兵向上報稱：「原

<sup>4</sup> 可參看法人格魯塞（RENE GROUSSET）著，魏英邦譯《草原帝國》，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86。

來達達的馬瘦」，果真乃蠻太陽汗大失警戒之心，而有了輕敵之意，但鐵木真率大軍隨後趕到，鐵木真以蒙古兵在人數上並不多，不宜直接開戰，乃布疑兵之計，令士兵夜間一人燒火五處，於是黑夜之中，只見遍地營火，乃蠻哨兵不知是計，乃向太陽汗報稱：「達達馬軍已塞滿撒阿黑客額兒地面了，想是每日增添，只見夜燒的火一如星般多了。」太陽汗聞報大驚，便對他兒子屈出律（西方史書多稱之為古出魯克）說：「達達每馬瘦，燒火如星般多，其人必眾，人曾說達達每剛硬，眼上刺叮不轉睛，腮上刺叮不躲避，今若與他聯兵，後必難解，見說達達的馬瘦，咱教百姓起了，越過金山（指今阿爾泰山），整搦軍馬，引誘著他行，此至金山，他瘦乏了，我肥馬正好，然後復回與他廝殺，可勝麼道。」（引自《蒙古秘史》），按《蒙古秘史》是由回紇人火原潔於明朝初年從蒙文（詳後）以明初白話譯出，以上這一段話意思是：「蒙古人馬瘦，但營火如天上繁星般多，想必為數極多，而且傳說蒙古人個性剛強，即使刺他的眼，也不會乍一下，刺他的腮也不會閃躲，現在如與之硬拼，可能討不到便宜，既然蒙古的馬瘦，不如我們要老百姓向西遷移，越過阿爾泰山，同時整備兵馬，引誘蒙古軍西進到阿爾泰山，其馬必然更瘦而且疲乏，屆時我方正好馬肥兵強，回過頭來與之決戰，必操勝券。」太陽汗根據錯誤的情報，又中了鐵木真的疑兵之計，而作出此一決策，當然沒有勝算。

兩軍既經接觸，蒙古軍大獲全勝，生擒了太陽汗<sup>5</sup>，活捉了其妻古兒別速，將之納為可敦<sup>6</sup>，太陽汗之子屈出律逃往西域，一時之間不知其下落，許多乃蠻部人民也向西逃亡流落西域草原；鐵木真既攻滅乃蠻，俘獲其大臣塔塔統阿，此人係乃蠻掌管文書、簿冊之大臣，力言文字及一國統計數據之重要，鐵木真深以為然，遂命塔塔統阿以回紇（或作畏兀）字母拼寫蒙古語言，從此蒙古始有文字，《蒙古秘史》就是以回紇式蒙文（或稱老蒙文<sup>7</sup>）

<sup>5</sup> 此處稱生擒太陽汗，係採《蒙古秘史》之說：《新元史》作「諸將大破乃蠻兵，擒太陽汗殺之。」《聖武親征錄》、《蒙兀兒史記》、《史集》等書均作太陽汗戰死沙場。

<sup>6</sup> 關於鐵木真將古兒別速納為可敦（妻子，原係回紇語，蒙古沿用之），詳情請參見劉學鈞《成吉思汗之大小可敦》，該文載《中國邊政》季刊第 205 期，台北中國邊政協會，2016 年三月出刊，頁 91~108。

<sup>7</sup> 關蒙文，可參見哈勘楚倫《蒙古語文》一書，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出版，1970 年。

所書就，時為西元 1204 年，從此今外蒙古全境都在鐵木真統轄之下。

鐵木真既統轄今外蒙古全境，實力大增，視野更為開闊，不以現況為滿足，有更大之雄心壯志，而其戰略思維是對敵人要趕盡殺絕不留遺子，以杜後患，前此攻滅克烈部時，王汗之子亦剌合桑昆逃往西夏，於是攻滅乃蠻後，於西元 1205 年底出兵攻打西夏，攻克西夏力吉里寨，經洛思城，大掠而歸，其所以攻打西夏，一則固然是懲罰西夏收容克烈部亦剌合桑昆，再則前此鐵木真所有戰爭對象都是游牧國家，其雄心既增，有意攻打女真族所建之金，但金朝已是城居國家，有厚實之城牆、眾多人民聚居之城市，前此未曾有過攻打城居國家之經驗，不宜冒然從事沒把握之戰爭，而西夏恰好是半城居半游牧之國家，且實力也不若金朝之強大，攻打西夏正好作為攻打金朝之練習戰，且西夏正好位處蒙古之南，基於地緣關係，遂成為鐵木真進擊之對象。

鐵木真於西元 1206 年、南宋寧宗趙擴開禧二年，歲次丙寅，鐵木真在斡難河源大會各部族首領，由各部族首領商議向鐵木真上「成吉思汗」尊號，並建九游白毛旗，這個集會就是庫利爾台大會，此後蒙古大汗的產生，都要經過庫利爾台大會，成吉思汗同時稱其國家為「大蒙古國」（蒙語讀若「伊克·蒙兀兒·烏魯斯」，並以其年為大蒙古國元年。

## 二、成吉思汗西征

鐵木真自稱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後，視野更為開闊，要建立更強、更大的蒙古帝國，不以統治草原地區為滿足，要開疆闢土向外發展，自遠古以來草原游牧民族，就如同沙漠一樣有向外擴張的天性，唐代詩人王維（701~761 年）之《渭城曲》有：「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其前兩句為：渭城朝雨浥清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可見在八世紀時陽關人仍是胡漢交界的邊關城鎮，（陽關在今甘肅省敦煌西南），但到宋時已為滾滾黃沙所吞噬，生活在草原沙漠地區的民族，幾乎都具有這種向擴張的天性，自遠古時代之匈奴、而鮮卑、柔然、敕勒（高車），突厥……而蒙古，莫不如此，這是生存空間自然條件，制約了生息其間民族的個性，成吉思汗創建了大蒙古國，初期忙於建立國家建制，分封有功者，一時之間並未向外用兵。

至於其所以稱「成吉思汗」者，歷來中外史家對此作出諸多解釋，歸納起來僅有以下幾種比較能言之成理如：

「蒙古語 **Tchink** 猶言剛強，**Guiz** 表示多數之語尾助詞，汗為可汗之縮稱。」

「太祖未起時，石上有異鳥對著太祖叫青吉斯，太祖以為瑞，就取牠的來做號，成吉思，譯語是天賜。」

「成吉思這個名詞可能是騰吉思之訛轉，意思是海，可汗是大汗、皇帝，合起來便是海內的皇帝。」

「蒙古語『成』義氣力強固，『吉思』義多數，義即多數擁戴之氣力強固之大可汗。」

「成吉思可汗就是萬汗之汗的意思，用通俗的話說就是萬王之王（King of the Kings）。」<sup>8</sup>

雖然有以上諸多解說，但仍以「萬汗之汗」、「汗中之汗」的解說較合情理，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總喜歡在官稱（如汗）之外，另起一個官號（如成吉思）<sup>9</sup>，所以「成吉思」是美稱，不必刻意作太多的解釋。成吉思汗完成大蒙古國國家建構，並對蒙古軍作一番休養整補後，對前此1205年曾攻掠西夏並大事劫掠，但未洩心中對西夏收容克烈部亦剌合桑昆之恨，且攻打金朝更需以西夏作為練習戰之對象，遂於西元1209年三月率軍進攻河西（指甘肅蘭州以西，以其位於黃河以西，遂稱河西，一般也作河西走廊，河西，蒙語訛讀為合申，因此合申也指西夏。另，因甘肅簡稱隴，因而有人誤以為隴西係甘肅西部，其實正相反，因甘肅東北有隴山與陝西相鄰，故隴西實指甘肅東北而言，此雖題外，但頗值一提），西夏皇帝李安全遣太子率兵拒蒙古軍，兵敗，蒙古攻克兀剌海城（其地當今甘肅省張掖市之東），俘獲西夏太傅西壁氏，蒙古軍進至克夷門（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西北），又戰勝西夏，遂進攻進攻西夏首都中興府（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並引黃河水灌城，河堤決口，河水外溢，反而

<sup>8</sup> 以上各說請參見《蒙古秘史》陳彬龢註《多桑蒙古史》馮承鈞譯本，馮承鈞《成吉思汗傳》、李符桐《成吉思汗傳》、胡耐安《邊疆民族志》、黎東方《細說元朝》、馬銓《成吉思汗》。

<sup>9</sup> 見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淹到蒙古軍，不得已後撤，但仍遣所俘之西夏太傅入中興府招降，西夏皇帝李安全在力不如人情況下，只得嫁女求和，按西夏自元昊建國後，自稱姓嵬名氏，李安全之女名察哈，成吉思汗納西夏公主，乃與之議和。

前曾提及成吉思汗的戰略思維，對敵人是趕盡殺絕不留遺子，前此攻滅仍蠻部時，其汗太陽汗之子屈出律向西逃往中亞草原，不知所終，只得暫行作罷。其實屈出律出逃時，也有頗多乃蠻部人民也逃往中亞草原（今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其時天山南北及今中亞兩河（錫爾河、阿姆河）之地，均為西遼所有。西遼者，係遼滅亡時（西元 1125），有遼宗室耶律大石者，率少數部屬北上大漠，向原有遼朝部屬之漠北十八部游牧民族徵集人馬，轉而向西，威服高昌回紇，逐步擁有今天山南北，建立西遼帝國，更進而併有東西喀喇罕汗國，再進而逼令中亞古國花刺子模向西遼納貢稱臣，為西域強國，耶律大石數傳後至其孫耶律直魯古為帝，屈出律逃亡西域時，正值耶律直魯古為帝，可能由於屈出律相貌偉俊而又能言善道，頗得耶律直魯古之賞識，竟以女兒渾忽嫁屈出律<sup>10</sup>，登時搖身一變成為西遼帝國之駙馬。

屈出律成為駙馬之後，極受耶律直魯古之寵信，其時西遼聲勢已大不如前，附庸之花刺子模經常不按時繳納貢賦，西遼因缺乏兵源，對之也莫可奈何，屈出律得知此種情況，乃向耶律直魯古進言說：草原上有頗多乃蠻部遺民流落其間，如獲允准，前往收集乃蠻遺民，當可得數萬人，以之充實西遼兵源，則有足夠兵力討伐花刺子模之不臣，這話正說到耶律直魯古心坎裡，當然允其所請，並撥給若干人馬，以便其前往草原收集乃蠻部遺民，屈出律果真收集到不少乃蠻遺民，約有一、二萬人之多，這在草原上也可算是一股力量，從此屈出律有了私人武力，就沿途劫掠，途中遇到花子模使者，雙方經過一番密談，竟然決定雙方合作奪取西遼政權，屈出律更想取耶律直魯古而代之，時為西元 1211 年，南宋寧宗趙擴嘉定四年、金衛紹王完顏永濟大安三年。

這年正值西遼耶律直魯古率軍出擊罕堵利瑟那（Sogdiana）地區的幹思曼，屈出律認為這是出兵奪取西遼政權的大好機會，於是先出兵攻占訛

<sup>10</sup> 見格魯塞著《草原帝國》，魏英邦譯本，但「渾忽」一詞可能漢語「皇后」之訛讀，蓋其後屈出律篡西遼自立為帝，其妻自為皇后，乃訛讀為渾忽。

跡刊城（Ozkend 或作烏茲根），盡掠城中財富，更想進攻八剌沙衮（Balasagun，西遼以之為都，稱虎思斡耳朵，其地約當今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之托克馬克，約當唐代碎葉城），耶律直魯古聞訊兼程趕回，將屈出律擊退，就在此時花剌子模應屈出律之約，出兵攻打西遼，攻破西遼怛羅斯城（或作塔拉斯），城內守軍潰敗，紛紛竄入虎思斡耳朵，於是城中大亂，屈出律趁亂率軍攻入西遼京城，《遼史》對此作如下記載：

「乃蠻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指耶律直魯古），而踞其地。」

於是屈出律篡奪西遼政權，仍稱喀喇契丹，沿用天禧年號，表面上尊耶律直魯古為太上皇，以維政權之穩定，屈出律奪得皇位後，仍稱古兒汗，開始胡作非為，原先西遼自耶律大石開國以來，對宗教採開放態度，尊重人民擁有不同宗教信仰，而當時西域幾乎全為伊斯蘭教信仰，屈出律原信奉基督教聶斯托利斯教派（克烈部王汗也信奉此教派），但稱帝後別娶一妃，此新妃係佛教徒，勸屈出律改宗佛教，又下令全國人民必須改信佛教，不得再奉穆罕默德，更召集穆斯林辯論教理，穆斯林之首領阿拉哀丁向屈出律往復申辯，屈出律竟因辭窮而惱羞成怒，將阿拉哀丁縛網釘在門上，於是激起所有穆斯林之忿怒，可見屈出律之作為不得人心，此種情況在草原上廣為傳播，遂為成吉思汗所知。

成吉思汗既知屈出律之下落，本其趕盡殺絕除惡務盡的戰略思維，豈容屈出律逍遙於其戰略思維之外，於是命大將者別率兵二萬出征屈出律，蒙古大軍甫抵西遼邊境，屈出律立即逃往合失合，蒙古軍追趕不止，屈出律又向西逃往巴達合商，終於被者別將之擒殺，乃蠻至是徹底滅絕，而散布在草原上的乃蠻遺民逐漸融入後日的哈薩克民族（此民族最初是以烏孫為主幹，漸次吸納不同民族而形成哈薩克族），至今哈薩克族中仍有許多以乃蠻曼為姓之部落。

成吉思汗既滅屈出律所篡的西遼，並將之納為大蒙古國的版圖，由是大蒙古國算是與花剌子模相鄰，花剌子模是中亞地區文明古國，當耶律大石之西遼建國後，以其英武而公正，威名遠播，時東喀喇罕汗國因不堪葛邏祿人（係突厥系民族，唐時高仙芝與阿拉伯之戰，即因葛邏祿人陣前倒戈，致令高仙芝大敗）及四周游牧民族之騷擾，因慕耶律大石之威名，自

動表示願意歸附於喀喇契丹（西遼），耶律大石因此不費吹灰之力得到東喀喇罕汗國首府八拉沙袞，並以為都，改稱虎思斡耳朵，據稱有詩仙之稱的李白即誕生於此地。

西遼獲得東喀喇罕汗國後，遂與西喀喇罕汗國為鄰，按西喀喇罕汗國領域在今中亞錫爾河、阿姆河兩河之間，時其汗易卜拉欣與伊斯蘭教神職人員不睦，以致汗國動盪不安，由是遂予耶律大石向西擴張機會，輕易拿下西喀喇罕汗國，並將兩河之間改稱為河中府，府治為今薩馬爾罕，之後耶律大石將目標放在花刺子模上，按花刺子模位於西喀喇罕汗國西北方，占有裏海及鹹海南岸、錫爾河、阿姆河下游（此兩河均注入鹹海）的廣大區域，花刺子模初為塞爾柱突厥的藩屬，由是等於塞爾柱突厥與耶律大石的西遼對峙，雙方終於發生大戰，耶律大石獲勝，因而花刺子模遂成西遼藩屬，向西遼納貢稱臣。成吉思汗崛起時，西遼已經勢衰力微，花刺子模遂有不臣之心，其時花刺子模之沙為摩訶末二世（沙為伊斯蘭教世界國家元首之意），以玉龍格摩訶末二世之母為一極有野心女性，干涉國政，離間摩訶末與其子札蘭丁，而札蘭丁為摩訶末諸子中最英勇精明者，然而在摩訶末之母挑撥離間下，使摩訶末父子不能同心協力，花刺子模內部已呈不穩定狀態，但摩訶末二世對此毫無警覺，不僅如此，對成吉思汗之崛起也毫無警惕意識，甚至後悔何以不在蒙古入侵中國前（此處中國指金朝），先行征服中國，從而可見其狂妄無知。

摩訶末二世曾在西元 1215 年（成吉思汗十年、南宋寧宗嘉定八年）派巴馬烏丁·拉濟（Baha al Din Razi）為使到成吉思汗處刺探蒙古軍力以及各方面情況，當時蒙古正全力討伐金國，並打算滅掉金國後，再順道南下攻打南宋，不料蒙古軍缺乏攻擊城市國家經驗，也無攻擊高厚堅實城牆工具，致圍攻金中都（今北京）三年，始終無法攻破，此時見花刺子模遣使來見，自然不願節外生枝，所以對花刺子模來使優予接待，並告訴來使，蒙古承認花刺子模摩訶末沙是西方的統治者，並要求花刺子模承認大蒙古國成吉思汗是東方的統治者，更建議東、西方之間應能和平相處自由貿易，並且認為摩訶末為兒子，按當時成吉思汗已經六十一歲，就當時而言，已可算是高壽，而且在成吉思汗的認知中，將摩訶末視為兒子是一種優寵，來使話帶回玉龍格赤後，摩訶末沙認為成吉思汗將之視為兒子，是一種奇恥大辱，不過對自由

貿易和平相處仍然勉於同意，於是雙方簽定和約。

蒙古攻金久未能克，但金已大受其害，遣使蒙古以賠款、割地、嫁公主乞和，成吉思汗遂允與金和，成吉思汗既接受金之求和，一時東方無戰事，西方又已擒殺乃蠻遺緒屈出律，將西遼納入版圖，心想麾下諸將隨之作戰馳騁疆場十有餘年，掠得奇珍異寶也相當可觀（游牧民族視戰爭為生財之機會），因此想與花剌子模進行和平貿易，遂派遣花剌人亦速甫等三人為使，攜帶許多珍貴禮物，前往玉龍格赤見摩訶末沙，說明和平貿易之意願，使者轉達成吉思汗的話對摩訶末沙說：

「我知君勢之強君國之大，我知君統治大地之一廣土，我深願與君修好，我之視君猶愛子也，君當知我已征服中國，服屬此國北方之突厥民族，君應知我國戰士如蟻之眾，財富如銀礦之豐，實無須覬覦他人領土；所冀彼此臣民之間得以互市，則為利想正同也。」

摩訶末召見馬合木，詢以「成吉思汗征服桃花石（按中亞人稱中國為桃花石，只是當時中國實係女真族所建之金）了嗎？馬合木回答：「此一大事孰能虛構？」摩訶末沙怒道：「我國之大，汝所知也，顧乃敢謂我為子，彼虜何物，兵力幾何？」馬合木見摩訶末沙發怒，不敢將成吉思汗強大實況回告，只敢以奉承方式告以蒙古兵豈能與花剌子模盛壯之軍隊相提並論，由是摩訶末始息怒，釋放此三使者回大蒙古國。

成吉思汗見三使者安然歸來，這三使者當然隱瞞了摩訶末沙發怒情狀，成吉思汗遂認為和平貿易之事已獲得花剌子模之認可，於是就命諸宗王，諸諾顏、諸可敦、諸將領將私人所有財物，組成一支約四百五十人之商隊，前往中亞河中地區進行貿易，成吉思汗的本意是要那些追隨他多年的宗王、諾顏、可敦、將軍等人，發一筆財，以慰其多年來的辛勞，時為成吉思汗十三年（西元 1218 年，南宋寧宗嘉定十一年）。這支四百多人的商隊走到訛答剌時，當地花剌子模守將為亦納勒朮（Inalchug），此人自稱是摩訶末沙母親禿兒罕哈敦（係康里族）的親戚，自恃有強大的靠山，又垂涎商隊所攜帶的奇珍異寶，竟然扣留商隊，同時又派人向摩訶末沙報告，誣指商隊是大蒙古國成吉思汗的間諜，摩訶末沙財迷心竅，竟然同意將商隊四百多人全部處死，並將商隊所攜帶的財物賣給布哈拉及薩瑪

爾罕的商人，摩訶末沙確實發了一筆財，但卻觸怒了成吉思汗。

商隊中有一人僥倖逃脫，遂將經過情形向成吉思汗報告，成吉思汗聞「驚怒而泣，登一山巔，免冠解帶置項後，跪地求天，助其復仇，斷食祈禱三日始下山」，成吉思汗於是決定親自率軍西征，並從此掀起蒙古西征的序幕。成吉思汗為慎重起見，於西元 1119 年在大軍出征前夕，派中亞人巴合刺為正使，另加派兩個蒙古人為副使，到摩訶末沙處傳達成吉思汗旨意，大意为：

「君前與我約，保不虐待此國任何商人，今遽違約，枉為一國之王，若訛答刺虐殺商人之事，果非君命，則請以守將付我，聽我懲罰，否則請即備戰。」<sup>11</sup>

摩訶妄自尊大，對成吉思汗之「通後通諜」竟不在意，不僅如此，更殺了中亞人正使巴哈刺，將兩個蒙古副使的鬚鬚給剃個乾淨，蒙古人視鬚鬚為男子的尊嚴，強行剃鬚，等於剝奪了蒙古人的尊嚴，這對成吉思汗的怒氣而言，無異是火上加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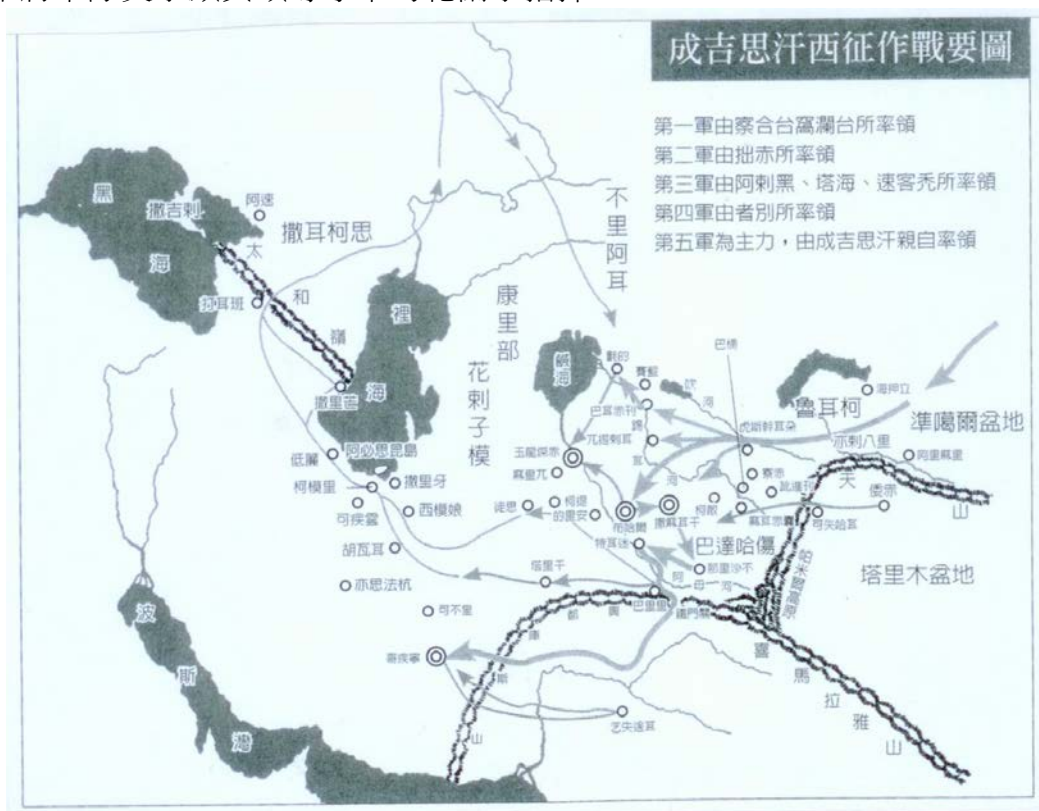
雙方都開始動員，雙方究竟動員了多少人？歷來研究者有不同看法，若干研究者曾毛估成吉思汗動員了七十萬、六十萬、二十萬人，以當時蒙古的實力而言，動員六、七十萬人，可能性不大，動員二十萬人之說，較合常情，鐵木真在動員時曾向西夏征兵，西夏皇帝拒絕出兵並說：「汝既無充分軍力，不值稱王。」<sup>12</sup>這觸怒了成吉思汗，埋下後滅絕西夏的藉口，因此成吉思汗動員二十萬人之說較為可信；至於花刺子模摩訶末沙方面，各研究者多稱動員四十萬人。成吉思汗雖動員二十萬大軍並御駕親征，但對蒙古龍興之地斡難河畔，還是極其重視，命其幼弟帖木格斡赤斤率兵留守，兼以鎮撫塞外新降各部族，以免大軍西時有後顧之憂。

此外，畏兀（即後來之維吾爾）亦都護（回紇部落領袖稱謂）巴而朮阿爾忒的斤、阿力麻里王錫格納克的斤、喀喇罕沙阿兒斯蘭等，也各率其本部兵馬從征。成吉思汗兵分五路，第一軍由次子察哈台、三字窩闊台率領；第二軍由長子朮赤統率；第三軍由阿剌黑、塔海、速客禿率領；第四

<sup>11</sup> 見《多桑蒙古史》馮承鈞譯，但多桑稱係引自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此書有何高濟譯本，江蘇教育出版，2005 年。

<sup>12</sup> 見《蒙古與俄羅斯》漢譯本上冊，頁 28。

軍由者別所率領；第五軍為中軍，由成吉思汗與其第四子拖雷所率領，其進軍形勢如所附圖，成吉思汗之軍隊在人數上雖然較少，但大部分都曾參與討伐女真金之戰爭，對攻打堅實高厚的城牆已具有相當多的實戰經驗。而花刺子模摩訶末沙雖擁有倍於成吉思汗的兵馬，但其素質低劣，而摩訶末沙本人也不具有在兵荒馬亂指揮若定的才華，當蒙古成吉思汗大軍壓境時，花刺子模眾大臣都認為如由摩訶末沙之子札蘭丁為統帥，或有勝算，但在摩訶末沙之母挑撥下，摩訶末沙對其子札蘭丁深懷戒心，唯恐一旦釋出兵權，將無法收回，更怕札蘭丁一旦握有兵權，或將進行篡位，因此絕不將軍隊交予頗具領導才華的札蘭丁指揮。



抑有甚者，摩訶末沙的思維未能與時俱進，而情報工作也未能跟上時代，仍停留在蒙古兵只能打草原野戰，不能打設防堅固的城市，因在戰略上採取：在草原地區對蒙古軍之進擊，不予抵抗，而將大部分軍隊用於防守分散各地的城市如訛答剌、不花拉、薩馬爾罕等處，僅以少數部隊用以維持諸城市間之交通及小規模的戰鬥，又命統治波斯的長官，征集軍隊以為後備之用；摩訶末沙不知道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金朝時，早已習得攻堅

的戰術，尤其在攻占金朝的若干城市之後，虜得頗多中國工匠（以今天的話說就是工程師或科技人員），協助其製造攻城必須的機械與技術，如攻城所用的弩砲、以土石填平城外的濠溝，或修築土台使與城牆等高等機械或技術，填平濠溝或修築土台所需勞力，都是運用戰俘或當地人力，對蒙古軍戰力毫無所損，或有時命這些戰俘或當地人先登上土台，充當砲灰，可見蒙古軍早已不是往昔的吳下阿蒙。

在蒙古軍發動攻勢之前，摩訶末沙曾到薩馬爾罕城堡濠溝等處巡視，見防禦工事堅固、守城將士勇壯，曾發豪語稱：「韃靼兵眾（韃靼指蒙古），投鞭足以填之。」這口氣像極了西元 386 年前秦苻堅率兵南下伐東晉所說的「投鞭斷流」，所謂驕兵必敗，摩訶末沙的心態似已注定其結果。

蒙古成吉思汗方面，其部署大致如次：

1.成吉思汗長子朮赤領一軍，附以畏兀亦都護所率騎兵約一萬多人，進攻錫爾河下游、鹹海東岸之氈的（或作贊的），預計攻下氈的並掃蕩錫爾河下游地區，然後溯錫爾河而上，與其他蒙古軍會合。

2.成吉思汗次子察哈台及三子窩闊台領一軍，以進攻位於錫爾河中游之訛答剌城為目標，也預計攻下訛答剌城後，也溯河而上，與其他蒙古軍會合。

3.以大將阿剌黑、速亦客禿及塔海領一軍，預計沿拔汗那河谷（即費爾干納河谷）進攻位於錫爾河上游之浩汗城，然後與二軍會合。

以上三軍所攻擊者，均為沿錫爾河之三大主要城鎮，屬於正面攻擊，依成吉思汗戰略，此三路軍應為「右手軍」，並非蒙古軍主力所在。

4.由大將者別率一軍，由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部出發，翻越帕米爾高原，沿阿姆河上源而下，進攻河中首府薩馬而罕，者別所率軍約二萬五千多人，因須翻越有世界屋脊之稱的帕米爾高原，沿途冰天雪地、披荊斬棘極為艱辛，較之漢尼巴攀越阿爾卑斯山，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此路軍應視為成吉思汗戰略中之「左手軍」，當也非主力軍之所在。

5.成吉思汗自率軍五萬人，並由幼子拖雷及大將速不台偕行，預計俟朮赤一軍攻克氈的城並清除錫爾河下游地區後，秘渡錫爾河，進入紅沙漠而後襲擊不花剌城（或作布哈剌，位於薩馬爾罕之西，也河中重鎮），此軍當為此次西征主力所在，為成吉思汗戰略中之「中軍」。

戰略部署即已完成，成吉思汗遂於其十四年即西元 1219 年（南宋寧宗嘉定十二年、金宣宗完顏珣興定二年）歲次己卯，各路軍展開攻擊行動，茲據《史集》、《世界征服者史》、《草原帝國》、《多桑蒙古史》等文獻所載，花刺子模摩訶末沙對蒙古軍行動似是一無所知，仍然陶醉在「韃靼兵眾，投鞭足以填之」之中，所以當蒙古軍兵臨城下，莫不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應付。

蒙古軍則按預步驟進攻，朮赤一軍攻下氈的城並盪平錫爾河下游地區後，成吉思汗率五萬人於次年（西元 1220 年）春融雪季節，秘渡錫爾河奔向紅沙漠，向不花剌推進；察哈台、窩闊台一軍圍攻訛答剌城，該城守將也就是引起此次西征的亦納勒朮，自恃城內儲糧豈足，兼以兵多將廣，遂負城頑抗，致圍城達五閱月之久始克之，執亦納勒朮殺之，以為蒙古商隊復仇。阿剌黑等三人所率一軍僅有五千多人，進攻別納克忒，此城守城守將多為康里突厥人，圍攻三日始克之，盡將城中工匠收集納入蒙古軍中，既克別納克忒，乃續向浩罕進軍（浩罕或作忽氈），浩罕守將帖木兒滅里（Timour Melik）極為驍勇，僅以千人拒蒙古軍，雖不敵退守河中一小島中，輾轉逃走，最後僅以單騎走奔摩訶末沙之子札蘭丁處。成吉思汗自率之一軍在向不花剌推進時，行近匝兒納黑（Zernouc）鎮，鎮民皆民皆避之城堡，經成吉思汗命人往諭始降，成吉思汗對該鎮人民頗為友善，除征兵一隊、毀壞城牆外，一任該鎮人民歸家各安其業；沿途又降服訥兒（Nour）城，未幾進至不花速城，此城有花子模守軍二萬，頑強抵抗數日，自忖不能支，於夜間逃出，此舉實出蒙古軍意料之外，誤以為城內守軍進行夜襲，急退，花刺子模軍竟未能把握此良機趁勢追擊，反而更加快遁逃，於是蒙古軍乃回師反擊，一路追殺及於阿姆河畔，二萬守軍死亡殆盡，既克不花剌，乃入城，成吉思汗諭全城官民曰：

「應知汝曹已犯大過，而人民之長負罪尤重，設汝曹問我所言何據，我將答汝曰：我為上帝之災，設汝曹無大罪，上帝曷降災汝曹之首？」

於是不花剌城人民頗受屠殺掠奪之災。成吉思汗率軍續向薩馬爾罕前進，自不花剌至薩馬爾罕僅五日行程，花刺子模摩訶末沙以四萬兵守城，增繕堡壘，防禦工事頗為堅固，成吉思汗作戰，必定先探聽敵方虛實，也

就是做好情報工作，成吉思汗得知薩馬爾罕有堅強的防守，遂不正面攻堅，先行略取薩馬爾罕四周之地，使該城孤立無援，之後始移師攻城，至西元 1120 年五月初終於攻下薩馬爾罕。

就在成吉思汗準備西征時，風聞中原有長春真人丘處機者，有長生不老之術，乃征召長春真人前往西征行在，按古代帝王莫不希望能修得長生不老之術，以便永掌權力，自秦始皇、漢武帝、北魏太武帝拓跋燾而唐太宗莫不熱衷此道，成吉思汗之征召長春真人，實不足為怪，按長春真人丘處機係道教全真派重陽真君之嫡傳弟子，在金朝統治下的華北地區極具聲望，甚至傳言渠已高壽三百，並有養生延命秘法<sup>13</sup>，成吉思汗遂遣使征召，其時金朝河南提控邊鄙使欲其前往講道，長春真人卻之，僅以詩頌答之，時為西元 1218 年，同年八月，南宋大師李金、彭義斌也欲邀其南下講道，同樣辭謝，此因長春真人已看出金、宋氣數將盡，不必虛與委蛇，而且已看出蒙古崛起，終將擁有「天下」，因此成吉思汗出征時駐蹕也兒的石河，遣使征召其前往西征行在，長春真人欣然應允前往西域。

按其時長春真人已經高齡七十二歲<sup>14</sup>，此一歲數在當年可算是耄耋之齡，其所以不辭辛勞跋山渡漠應召前往西域者，顯然是已看出「天下」終將歸於蒙古，此時應召前往，對未來保護全真教，必有助益（見王友三《中國宗教史》上冊，頁 470），果而如此，長春真人確屬高瞻遠矚黠慧過人；另有說法以長春真人耳聞蒙古軍極為殘暴，所過之處無不盡情蹂躪濫殺無辜，毀城滅鎮毫不憐惜，長春真人為救天下蒼生及全真教之生存，不惜以風燭殘年，應召前往西域，面見成吉思汗，以上天有好生之德，說之以情，或能有所改變，果然此說為真，則其悲天憫人情操，可與佛陀比肩。

長春真人奉成吉思汗之召後，於成吉思汗十六年（西元 1221 年）率門弟子十八人出發西行，沿途跋山渡漠翻越帕米爾高原，進入河中西遼舊壤，至當年底到達薩馬爾罕（時成吉思汗不在該城），此時大蒙古國耶律國公（指耶律楚材，係蒙古攻金時於 1215 年得耶律楚材，成吉思汗將之

<sup>13</sup> 見王友三《中國宗教史》山東齊魯出版社，上冊，頁 470。

<sup>14</sup> 關於長春真人之往西域，詳情可參見其門弟子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列《四部備要》，台灣中華書局，1974 年影印出版

帶在身邊，供隨時諮詢）及將領均出城置酒郊迎，旋入城，以時值隆冬，遂決定俟來年開春後，再行前往謁見成吉思汗，長春真人一行遂在薩馬爾罕駐冬。據《長春真人西遊記》所載此城秋夏常無雨，國人疏二河<sup>15</sup>入城，分繞巷陌，家戶始有水得用，長春真人稱摩訶末未敗之前，城中有十萬餘戶，每戶姑以五十人計，則蒙古軍攻入薩馬爾罕之前，該城應有五、六十萬人之多，但蒙古軍進入之後，該城僅餘四分之一人口，可見殺戮之慘烈<sup>16</sup>。

當年閏十二月時，成吉思汗駐蹕大雪山（即印度庫斯山系）之東南，因沿途大雪封山，乃准長春真人於來年（西元 1222 年）開春前來謁見。次年（1222 年）三月上旬，成吉思汗自行宮遣阿里鮮傳旨稱：急欲見真人，希真人毋憚勞頓，速來行宮，以便請益求道。於是長春真人一行在蒙古大軍保護下南行三日，渡阿姆河，沿途所見景象與中原迥異，於四月五日抵達成吉思汗行宮，命大臣喝剌播來迎，成吉思汗以真人辭他國之徵聘（指金與南宋）而應詔西來，大為嘉慰，並詢以有何長生之藥，長春真人直言「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成吉思汗嘉其誠實，遂在大汗宮帳旁另設二帳，以居長春真人一行。成吉思汗詢以：「人呼師為騰吃利蒙古孔（按「騰吃利」即「騰格里」，此詞自匈奴以來，北方草原諸游牧民族均稱天為騰格里，騰吃利蒙古孔，意為天人，或可譯為通天之人；「孔」與「匈」、「胡」音近，其意為人），自謂之邪？」長春真人復誠實告以此乃他人之謬稱，一般人僅稱之為先生，此時鎮海奏稱（鎮海，係蒙古大將，沿途護送長春真人到西域）：「有人尊之曰師父者、真人者、神仙者。」成吉思汗遂指定自今之後，可稱之曰神仙。

在成吉思汗西征期間，曾多次向長春真人請益，頗受大汗重視，成吉思汗且稱：「神仙說養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於外。」由於「勿泄於外」，真人所說的養生之道其內容為何？至今莫明。

當時蒙古大軍正在追擊花剌子模摩訶末沙，摩訶末沙由於錯估情勢，認為蒙古軍缺乏攻城經驗，只要堅守幾座大城，蒙古軍將莫可奈何，

<sup>15</sup> 此二河乃柴拉夫香河在城外山腳下分為支，其一為白河，另一為黑河，薩馬爾罕在西遼時設為河中府治所在。

<sup>16</sup> 見《長春真人西遊記》。

假以時日，蒙古軍必因糧秣不足，而自動退卻，屆時甚至可以趁勢追擊，然而事與願違，在成吉思汗領導下，蒙古軍陸續攻下氈的、訛答刺、布哈拉、薩馬爾罕……等大城，接著朮赤、察哈台及窩闊台也攻下花刺子模首都玉龍格赤（或作兀龍格赤），摩訶末沙沿裏海南岸逃往阿摩爾（Amol or Amul，即《元史》中之阿模里），但蒙古軍仍不放過，繼續追擊，乃乘船逃入裏海中之阿必思渾島（Abisgon），此時已身罹重病，自知不久人世，乃召集隨侍身邊之札蘭丁、斡思刺黑沙及阿里沙三子宣布遺命，以札蘭丁嗣立，並囑另二子必須效忠札蘭丁，未幾，摩訶末沙病死小島上，時為西元 1221 年。札蘭丁嗣立為花刺子模沙之後，花刺子模內部又生變化，有數萬花刺子模兵擁立闇弱無能之斡思刺黑沙，更進而謀害札蘭丁之意，札蘭丁乃逃往呼羅珊，之前從浩罕脫逃之守將帖木兒滅黑以三百騎從，急渡沙漠而至納撒（Nasa），此後札蘭丁深入各地收集流亡，其後到迦色尼城，獲該城守軍擁護，札蘭丁遂擁有武力，從事復國工作。

前曾提及成吉思汗對敵人的戰略思維是趕盡殺絕，不留遺孑，現既知花刺子模札蘭丁不但仍在人世，且又擁有武力，自是不能放過，必須加以殲滅，其時（西元 1221 年）札蘭丁在今喀布勒（Kabul）之北一百五十公里處之巴魯安曠野，遇上成吉思汗所派大斷事官失吉刊忽秃所率追擊之軍，札蘭丁驍勇善戰，擊敗蒙古軍，此役也為蒙古西征所有戰役中唯一敗績，札蘭丁獲勝後，軍威大盛，但不幸其軍中兩員大將竟為爭一匹阿拉伯駿馬，而彼此反目，其中一人竟一怒率其所部離去，使軍威甫振之札蘭丁實力大減，不得已撤回迦色尼，及聞成吉思汗大軍追來，遂棄守迦色尼而向印度逃逸。按成吉思汗原屯駐於塔里寒，聞失吉刊忽秃戰敗，急自率大軍越興都庫斯山，抵巴魯安曠原，除命失吉刊忽秃詳細報告戰敗情況外，兼程追擊札蘭丁，追至印度河邊時，成吉思汗憐惜札蘭丁英勇，欲生擒而後使之歸降，遂將札蘭丁團團圍住，札蘭丁趁蒙古軍小却之機，縱身躍入印度河中，隨波逐流，蒙古兵不善水，只得任其隨波逃逸，成吉思汗目睹此景，環顧左右贊之曰：

「犬父竟有虎子，此人可供諸子效法。」

至此成吉思汗西征告一段，未幾即行班師，於 1225 年返回蒙古。

### 三、結語

成吉思汗之西征掀起之後兩次蒙古西征，此是後話，但在世界史上，卻占了不少篇幅，但是卻被稱為「世界征服者」，蒙古西征作為蒙古民族史或元朝前期史，應該比作為元朝史更為合適，當然這只是師心之見，可供思索討論。回頭看長春真人在今中亞與成吉思汗數度會談，理應對成吉思汗行事風格有所影響，長春真人於西元 1223 年啟程東返，於次年（1224 年）八月返抵燕京（今北京），大蒙古國果真對全真教給予相當之優崇。成吉思汗於攻滅花剌子模後，於 1225 年返回蒙古，但想及西征之初，曾向西夏征兵，欲被西夏主所拒，認為西夏有不臣之心，且之前攻打西夏時，西夏表示降服，並承諾送質子到蒙古，只是始終沒有送來，乃想予以懲罰，遂於西元 1226 年親自率軍討伐西夏（前此已有五次攻打西夏紀錄），此次六伐西夏，蒙古軍分為東、西兩路，卒將西夏滅絕，而成吉思汗也於 1227 因舊傷復發，他自知將不久於人世，臨終前交待諸子及諸大將，死後秘不發喪，萬不可使西夏人知曉，以防西夏改變投降的決定，並且交待當西夏末帝開城投降時，要將前來投降的西夏君臣全部殺死，蒙古軍進入西夏首都中興府時（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極盡殺戮破壞之能事，使許多西夏文物蕩然無存。

前此奮身躍入印度河的花剌子模札蘭丁，沒有死，而在蒙古征服、攻滅花剌子模後，有部分蒙古軍隨成吉思汗返回蒙古，札蘭丁則從印度德里潛回波斯，從事規復花剌子模大業，未幾成吉思汗薨，窩闊台嗣立為大蒙古國大汗，窩闊台對於征服中國（指女真族所建之金），遠較控制波斯為甚，派其弟拖雷征金，為爭取勝利，更聯合南宋，對金形成南北夾擊之勢，蒙古承諾一旦攻滅金，可將黃河以南之地給南宋，於是雙方出師南北夾擊金，於西元 1234 年金亡，但拖雷在戰爭結束前崩殂。

在蒙古主力攻金的同時，有兩支偏師指向朝鮮與波斯，指向朝鮮者略而不談，由綽兒馬罕統率之蒙古兵團，於 1230 年進入波斯，札蘭丁不僅沒有全力抵抗蒙古軍的入侵，反而率軍向西介入近東的政治鬥爭，想將其勢力伸入伊拉克北部、敘利亞及喬治亞等地，其時札蘭丁將其軍事總部設於今亞塞爾拜疆，當蒙古軍逼近時，竟然孤立無援，只得隻身脫逃，他曾要圖再招集流亡組織軍隊，但未能成功，並為其部眾所背棄，最後又被其

扈從所出賣，在逃往小亞細亞（Anatolia）途中，復為蒙古軍所困，雖然他又脫逃了，可是卻在逃往庫得斯坦（Kurdistan）山中時，被盜匪所殺，但殺他者並不知道所殺的人竟是花刺子模沙札蘭丁<sup>17</sup>，就像晚清名將僧格林沁一樣，不是死在敵人之手，而是被土匪所殺。從此花刺子模成為歷史名詞，不再是一個國家的名稱。

關於成吉思汗西征，到此理應告一段落，但關於蒙古史有若干問題似乎須加以澄清，茲分別敘述如次：

### （一）大蒙古國與元朝

按成吉思汗所建立之國家為大蒙古國，其君王稱汗或可汗，係經庫里爾台大會推舉產生，其後窩闊台、貴由、蒙哥、忽必烈等，均經過此一程序，只因忽必烈統治中華大地，為了適應中原的歷史、文化傳統，取《易經》：「大哉乾元」之「元」字為國號，並自稱皇帝，但對草原諸游牧部落及各屬國，仍然稱大蒙古國及可汗，等於一個國家有兩個名稱，元朝諸帝幾乎都有汗號，只是中原臣民或漢文文獻對此未加注意，茲將元代諸帝廟號、本名漢字音譯、漢文諡法、蒙文諡法、在位年數、年號及其與前一可汗之關係，以表列方式呈現如次：

廟號	本名漢字音譯	漢文諡法	蒙文諡法	在位年數	年號	與前一可汗之關係
太祖	鐵木真	聖武皇帝		22 年		
太宗	窩闊台	英文皇帝		12		子
定宗	貴由	簡平皇帝		3		子
憲宗	蒙哥	桓肅皇帝		8		堂弟
世祖	忽必烈	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薛禪可汗	34	中統、至元	胞弟
成宗	鐵木耳	欽明廣孝皇帝	完澤篤可汗	13	元貞、大德	孫
武宗	海山	仁惠宣孝皇帝	曲律可汗	4	至大	侄
仁宗	愛育黎拔	聖文欽孝皇帝	普顏篤可汗	9	皇慶延祐	弟

<sup>17</sup> 見《蒙古與俄羅斯》札奇斯欽漢譯本上冊，頁 35。

廟號	本名漢字 音譯	漢文謚法	蒙文謚法	在位 年數	年號	與前一 可汗之 關係
	力八達					
英宗	碩德八剌	睿聖文孝皇帝	格堅可汗	3	至治	子
	也孫鐵木兒			5	泰定	叔
	阿速吉八			一月	天順	子
明宗	和世琜	翼獻景孝皇帝	忽都篤可汗	1	天歷	堂兄
文宗	圖帖木爾	聖明元孝皇帝	札篤牙可汗	3	至順	弟
寧宗	懿璘質班	冲聖嗣孝皇帝		一月		侄
惠宗	妥懽帖睦爾		烏哈克圖可汗	38	元統、至正	兄
昭宗	愛猷識理達臘		必里克圖可汗	8	宣光	子

上表<sup>18</sup>自鐵木真至蒙哥四位可汗之廟號，係忽必烈建立元朝後，循中國政治傳統，加以追謚；退出大都（今北京）之妥懽帖睦爾，事在西元1368年元帝妥懽帖睦爾至正二十八年，一般史書都將這一年當作元朝滅亡之年，其實不然，當年隨元帝撤出大都的蒙、漢官員、軍隊為數不少，初在應昌（今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克什克騰旗）繼續行使元朝政令，1370年病卒於應昌，明朝以其「知順天命，退避而去」，謚之為「順帝」，但此一謚號蒙人或蒙文文獻均不接受，另行謚之為「惠宗」，元朝何曾滅亡？其子愛猷識理達臘繼立為帝，改元宣光，薨後廟號昭宗，元朝何嘗滅亡？漢文文獻或史料之所以稱妥懽帖睦爾退出大都為元亡之年，其實只是為了彰顯明朝繼元朝而立的正統性而已。

一般漢文史料或文獻均稱元帝妥懽帖睦爾退出大都後，五傳至鬼力亦時，去元國號稱韃靼，棄皇帝稱可汗，這種說法多見於葉向高的《四夷考》、王世貞的《弇州史料集》、何喬遠的《名山藏》、鄭曉的《吾學篇》、《皇明四夷考》、《今言》、嚴從簡的《殊域周咨錄》，由於符合漢人的「史觀」（或說「胃口」，似更貼切），所以就成為漢文文獻的普遍說法，雖「普遍」，但卻不符史實，這點從上文元朝諸帝幾乎都有汗號，可知所謂「棄皇帝用汗號」之說，根本是錯誤的；另自成吉思汗創

<sup>18</sup> 此表係摘自黎東方《細說元朝》，台北文星書局，1966年，下冊，頁215~216。

「伊克、蒙兀兒、烏魯斯」（讀若 Ykek Mongrol Ulus，意為大蒙古國）以來，這個國號一直沿用到十七世紀初（明末，後金努爾哈赤時）林丹汗死後，大蒙古國才算完全壽終正寢，試看忽必烈只是為適應中原文化、歷史、政治傳統，在中國本部另起「元」的國號，但對草原諸游牧民族屬國、外國，仍然用大蒙古國，且看《元史》卷二〇八《外夷傳、日本》載有元世祖忽必烈致日本國王的詔書就是自稱「大蒙古國皇帝」，可見元朝皇帝對外仍自稱其國家為大蒙古國，一直到最後一位大汗林丹汗仍然自認是大蒙古國的大可汗。至於元帝退出大都後，由於生存空間自然條件已經改變。恢復游牧生活，當初追隨妥懽帖睦爾北上的漢人軍民，或漸次南下降明，少部分之後人遂漸融入蒙古族中，對於元朝或皇帝的稱謂，對草原游牧生機類型的大蒙古國而言，已經不習慣了，但是並沒有忘記「大元」這個光榮的國號，例如成吉思汗十五世孫巴圖蒙克，在其妻滿都海夫人輔佐下（滿都海夫人年長於巴圖蒙克二十五歲，在輩分上是巴圖蒙克的曾叔祖母，因夫滿都固勒死，遂嫁年幼之巴圖蒙克，且輔佐其成為大蒙古國大汗），成為大汗，其汗號明人音譯為「達延汗」，其實「達延」就是「大元」，只是明朝人不願見到「大元」二字，而音譯之為「達延」，可見大蒙古國固然沒有滅亡，「大元」也沒有消失，其時是十五世紀中葉，這一點，在研究蒙古或元朝史時，不宜予以忽略。

## （二）關於四大汗國

一般國人讀元史或蒙古史，提到蒙古西征建立橫跨歐亞四大汗國時，都有一種與有榮焉的感覺，尤其自清朝中葉以來，飽受東西方列強欺凌，被迫訂下許多不平等條約，不是賠款、就是割地、強迫開放通商口岸、圈地形成租界……讀到蒙古西征建立四大汗國，不免為之一振，像是出了一口悶氣，其實這只是魯迅筆下阿 Q 精神反應<sup>19</sup>，與中國的榮辱毫不相干，因為許多漢人讀到岳武穆（飛）的《滿江紅》一詞中的「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時，同樣的覺得慷慨激昂，這對團結國內各民族不但毫無助益，反而會撕裂民族情感，因此應以平常心看待四大汗國，就

<sup>19</sup> 見魯迅（本名為周樹人，字豫才）《阿 Q 正傳》，香港國光圖書公司出版，此書魯迅於 1921 年寫成，香港出版時已是 1960 年代。

史論事即可，茲將四大汗國簡述如下：

窩闊台汗國，成吉思汗於其十三年（1218 年）滅西遼，之後西征花剌子模，進入今中亞地區，約於 1225 年還師土拉河，隨即劃分諸子封地，按在開始西征時，即確定立其第三子窩闊台為大蒙古國大可汗繼承人，西征後以今額爾齊斯河上游及巴爾喀什湖以東地區，封給窩闊台，以葉密立為首府（葉密立或作也迷里，地當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塔城地區額敏縣）是為窩闊台汗國，西元 1227 年成吉思汗崩殂，兩年後，窩闊台入承大統，成為大蒙古國大可汗，理論上窩闊台既入承大統，窩闊台汗國已不復存在，但事實上汗國由其子貴由繼承，其後貴由又入承大蒙古國大可汗，汗國由貴由之弟合失之子海都繼承（1260~1301 年），之後由海都之子察八兒繼承（1301~1310 年），後為察哈台汗國所併<sup>20</sup>，相傳西洋歌劇中之《朵蘭多公主》一曲，就是指海都之女出嫁故事。

察哈台汗國，察哈台，或諧譯為察阿歹、察合台、察合帶、茶合帶、察干岱等，為成吉思汗次子，能征善戰，屢建戰功，1219 年隨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事後獲封西遼故地，以此為基礎建立察哈台汗國，其封地大致東起伊犁河、西及錫爾河、南及於阿姆河，而以垂河（或作吹河）流域為中心，重要的大城為伊犁河附近之阿里馬力克（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霍城縣），傳至篤哇時（1274~1306 年），聯合海都之子察八兒與大蒙古國（元朝）大汗（皇帝）忽必烈為敵，稍後又併吞了許多窩闊台汗國領地，1370 年察哈台汗國實權為蒙古疏族帖木兒所奪，察哈台汗國已是名存實亡，其後又蛻化為東、西兩汗國，東汗國再蛻化為葉兒羌汗國，最後為額魯特蒙古準噶爾所滅。

伊爾汗國，大蒙古國大汗貴由崩殂後，成吉思汗後裔爭奪大汗已趨於激烈，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蒙哥與金帳（欽察）汗國之巴都（或作巴禿，係成吉思汗長子朮赤之次子）合作，巴都支持蒙哥奪取大汗之位，一旦奪得大汗之位後，同意金帳汗國一切自主<sup>21</sup>，等於承認金帳汗國是另一個蒙古國，由是蒙哥成為大蒙古國第四任大汗，疆域包括今日的伊朗、

<sup>20</sup> 見黎東方《細說元朝》下冊，頁 298。另于寶林編著《中華歷史紀年總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年，頁 843。

<sup>21</sup> 見黎東方《細說元朝》下冊，頁 202。

伊拉克、約旦、一部分敘利亞、今屬於俄羅斯之喬治亞與屬於土耳其之小阿美尼亞，就疆域而言相當廣袤，由於旭烈兀與忽必烈、蒙哥是同胞兄弟，所以當蒙哥崩殂後，忽必烈自立為大汗，旭烈兀給予支持，而且始終與元朝維持良好關係，承認元朝為其宗主國，於 1394 年為帖木兒所滅。

金帳汗國或作欽察汗國，為幾個汗國中位處最西邊、而且也是疆域最大者，巴都係朮赤（成吉思汗之長子）之次子，他之得以繼承朮赤而為金帳汗國之汗，實由於其能征善戰，蒙古第二次西征歐洲時，就是由巴都作統帥，如果不是因窩闊台崩殂，很可能征服整個歐洲，他繼承汗位後，將東方領土賜予其兄長兀兒答，別立為白帳汗國，因此金帳汗國等於有東、西個汗國，東汗國領地大致為西北利亞及今哈薩克斯坦之地，西汗國則擁有歐俄、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及今屬波蘭之加利西亞。上文提到蒙哥為爭奪大蒙古國大汗之位，曾與巴都約定一旦在巴都支持之下，奪得大汗之位，承諾讓金帳汗國自主，因此金帳汗國與拖雷系之元朝維持友好關係。

以上為蒙古四大汗國概略情況，其建立的時間並非同時，而彼此雖均為成吉思汗之後裔，但彼此之間時友時敵互相兼併，絕非和睦如「兄弟之邦」。

### (三)四大汗國與元朝之關係

一般文獻，甚至歷史教科書往往稱元朝統治四大汗國，然而史實並非如此。當忽必烈自立為大可汗建立元朝時，其弟阿里不哥也在蒙古故壤召開庫里爾台大會立為大可汗，因此雙方訴諸兵戎，結果阿里不哥不敵，不得不向忽必烈請罪，忽必烈赦之，但次年（1266 年）阿里不哥就因「病」而死。至於窩闊台汗國之海都，曾經附和阿里不哥，可見窩闊台汗國與元朝的關係相當緊張，稱其屬於元朝，殊非所宜。

察哈台汗國始終與拖雷系不和，稱元朝統治察哈台汗國也與史實不合，按察哈台汗國領地為西遼故壤，其地早住民族在宗教上早已伊斯蘭化，在語文上已突厥化，因察哈台死後，其汗國已經突厥化、伊斯蘭化，且察哈台生前即與窩闊台友善，而與朮赤對立，與拖雷系也乏好感，元朝實未統治之，只是以往有關察哈台汗國的文獻或論著不多，雖也有一些史料，多是以察哈台文寫成（所謂察哈台文，是指以阿拉伯文字母拼寫突厥、回紇語言，今日維吾爾文就是察哈台文），能識且能譯者不多，所幸近年中國大陸學者劉迎勝著有《察哈台汗國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篇幅頗大，欲對察哈台汗國作較深入探研者，此書當為不可或缺者。

金帳汗國，係赤朮之子巴都所創建，上文曾敘及蒙哥為欲奪得大可汗之位，曾與巴都約定，如獲得其支持，一旦得以入承大統，將同意金帳汗國一切自主，按蒙哥為大汗時在西元 1251 年，而九年後（1260 年）忽必烈始自立為大汗並建立元朝，金帳汗國不屬於元朝，乃是極明顯之事，只是朮赤向來與拖雷友善，因此朮赤系諸汗國與拖雷系的元朝，維持友好關係，則是可能的。

至於伊爾汗國，係蒙哥任大汗時，派其胞弟旭烈兀西征時所建，之後忽必烈（係旭烈兀胞兄）自立為大汗並建立中國傳統式的元朝，旭烈兀均給予支持，並承認元朝為其宗主國，如旭烈兀死後，其諸子、眾異密均跪拜請旭烈兀之長子阿八哈接受旭烈兀遺命承接伊爾汗國之汗位，但阿八哈則說：「忽必烈合罕（即大汗）是長房（指忽必烈是旭烈兀之兄長），怎能不經他的詔賜就登臨（汗位）呢？」<sup>22</sup>因而阿八哈在未取得元帝忽必烈認可冊封前，只自任攝政，多桑（C. d. ohhson，係瑞典人）就認為：「阿八哈以未奉忽必烈命，不敢就汗位，坐一凳上，執行最高大權，追認旭烈兀之一切遺命。」<sup>23</sup>五年後，元帝忽必烈，同時也是大蒙古國薛禪可汗所派遣特使始抵達伊爾汗國汗廷「帶來了賜給阿八哈汗的詔旨、王冠、禮物，讓他繼承自己的光榮的父親成為西亞地區的汗，沿著父祖的道路前進。」<sup>24</sup>阿八哈接元帝、大可汗的冊封後，於西元 1270 年十一月正式登上伊爾汗國汗位。

從上述伊爾汗國的汗，需要經過元朝的冊封，當然可以認定伊爾汗國是中國元朝的藩屬，且再看當伊爾汗阿八哈死後，其子阿魯渾與阿八哈之弟帖古迭兒（或作阿合馬）爭奪汗位，其時（1284 年）全體哈敦、宗王與異密，都擁戴阿魯渾繼承汗位，但仍需等到兩年後（1286 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三年）元朝派「兀兒都乞雅從合罕處來到，帶來詔如下：

<sup>22</sup> 見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史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三卷，頁 103。

<sup>23</sup> 見多桑著、馮承鈞譯《蒙古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下冊，頁 575。

<sup>24</sup> 見《史集》第三卷，頁 136。

冊封阿魯渾繼承其父為汗。」<sup>25</sup>阿魯渾此時才正式舉行登汗位儀式，從而可見伊爾汗國確實屬於中國元朝。不僅如此，元朝中央政府不僅對伊爾汗予以冊封，而且對伊爾汗國的功勳大臣也賜官封爵，當阿魯渾與帖古迭兒爭奪汗位時，大異密不花為阿魯渾之登上汗位，立下大功，之後阿魯渾拜不花為伊爾汗國的丞相，元朝中央在冊封阿魯渾的同時，也賜封不花為汗國丞相。及至元泰定帝也孫鐵木兒泰定元年（1324 年），伊爾汗國大異密出班以擁戴不賽因有功，伊爾汗廷上奏朝廷請給出班加官晉爵，據《元史》載：「冬（十一月）乙丑，諸王不賽因言其臣出班有功，請官之，以出班為開府儀同三司、翊國公、給銀印、金符。」<sup>26</sup>此外另有許多史料、文獻證明伊爾汗國確實承認中國元朝為其宗主國，茲且再舉一例以證之，初忽必烈為征伐南宋，在圍攻南宋襄樊（襄陽、樊城）時（時為 1271 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南宋度宗趙禔咸淳七年），歷時五年未能攻下，忽必烈必急如焚，時畏兀人（即後日之維吾爾）阿里海牙建議使用回回炮，忽必烈立派特使向伊爾汗國阿八哈汗征調回回炮匠來華，阿八哈遂派阿老丁及其弟子亦思馬因舉家馳驛元大都（今北京），製造回回炮，協助元軍攻宋襄樊，卒於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 年）一炮擊中襄陽城譙樓（城門上之望樓，俗稱譙樓），聲如雷霆，全城震動，令宋軍心大亂，一年之內襄樊二城先後被元軍攻占，加速南宋之滅亡<sup>27</sup>，凡此均可證明伊爾汗國確實為元朝之藩屬。

成吉思汗西征其規模之大，殺戮之慘烈，在人類史上實屬罕見，人類自詡為萬物之靈，但在地球上的動物，似乎只有人類會從事有組織的去殘殺同類，似有愧於「萬物之靈」稱號，因此對成吉思汗及其後的兩次西征，實不必興「與有榮焉」之感，直當一歷史事件看即可，質之賢者，未省以為然否。

<sup>25</sup> 見《史集》第三卷，頁 194。

<sup>26</sup> 見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元史》頁 651。

<sup>27</sup> 見徐良利《伊兒汗國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90。

## 夏格巴《藏區政治史》與「西藏福利會」

孟鴻

前文大兼任教授

### 摘 要

夏格巴之《藏區政治史》，或作《西藏政治史》，將中國清朝中央與西藏之關係描敘為「供施關係」，由於夏格巴是藏族，其人世代在西藏地方噶廈政府為官，1951年十四達賴及隨從官員從印度返回拉薩時，夏格巴留在印度噶倫堡，與達賴二哥嘉頓珠、堪窮、洛桑堅贊共同組織「西藏福利會」但渠等自稱為「西藏幸福事業會」，此三人為「西藏福利會」首腦人員，竭力破壞西藏地噶廈政府與中共所簽之《十七條協議》，更倡言西藏獨立，鼓動十四世達賴外逃，1959年三月達賴被「四水六嶺衛教軍」擁簇流亡印度，組織西藏流亡政府，夏格巴擔任流亡政府駐新里辦事處代表，更前往美國促請美國關注西藏問題，1965年夏格巴辭去流亡政府職務，寓居美國耶魯大學，專心撰著《藏區政治史》及英譯工作，英文版發行十年後，夏格巴又對該書大事增補，於1976年在印度新德里出版，由於夏格巴既是藏人，又曾在噶廈政府為官，其書頗為西方研究藏事者之注意，且有奉之為圭臬者，本文擬對其人、其書及西藏福利會酌為介紹、評論。

**關鍵詞：**夏格巴、《藏區政治史（西藏政治史）》、  
西藏福利會（西藏幸福事業會）

## 一、夏格巴其人與《藏區政治史》

夏格巴全名為夏格巴·旺秋德丹（1907 年 1 月 11 日~1989 年 2 月 23 日）簡稱夏格巴，以其曾為孜本之官，故又稱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係西藏貴族，屬三大領主之一，從本質上反對任何改革，其父曾任拉薩米本（即拉薩市長，也是前噶倫赤門·羅布旺秋之侄，可以說是一門顯赫。夏格巴於二十三歲時（1930 年）進入西藏地方噶廈政府金庫任職，九年後（1939 年）升任為噶廈政府孜康（主管財政單位，相當於財政局）孜本（財政局長），擔任此職長達十一年（1939~1950 年），其間於 1947 年至 1949 年初，兼任西藏商務代表團團長，前往美國、英國、義大利等國，尋求與各國特別是美國，簽訂貿易協定的可能，想透過與歐美各國特別是美國簽署貿易協定，達到西藏獨立的目的<sup>1</sup>，但結果都未能如願。這個貿易或商務代表團雖未能完成預定的任務，據當時的一位印度官員告訴美國的大使說：

「在他們看來，使團（指商務代表團）出使的唯一目的是代表他們為自己撈一把，他們關心的是把能夠買到的黃金再設法從西藏拋回印度，以看漲的有利價格在黑市上倒賣出去。」<sup>2</sup>

夏格巴曾任噶廈政府中財政官員多年，對操作金融、黑市買賣固優為之。

1949 年十月中共宣布建政後，由北京和青海西寧廣播電台宣布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中共必將予以解放，西藏方面也透過拉薩廣播電台宣稱：「中國和西藏僅僅是施主和福田關係，西藏根本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在西藏也沒有外國帝國主義的勢力。」<sup>3</sup>但中共力量勢如破竹席捲大陸，西藏地方噶廈政府經過求神占卜，派孜恰堪窮（堪窮，為四品僧官）土登杰波及夏格巴為與中共談判的代表，並由彭措札西（或作塔克拉·彭措札西，為十四世達賴姐夫，曾就讀於南京中央政治學蒙藏班，

<sup>1</sup> 以上多係參考王小彬《夏格巴日記與西藏幸福事業會》一文，王小彬係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sup>2</sup> 見譚·格倫夫著、伍昆明、王寶玉譯《現代西藏的誕生》，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0 年，頁 130~133，但此處係轉引自張云《西藏歷史問題研究》，北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 年，頁 303。

<sup>3</sup>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230。

1960 年後曾多次來台)為漢語翻譯，以拉文匡佐車仁色·齊美松曾為英語翻譯，透過雅色杰頓(即達賴之二哥嘉樂頓珠，此人也曾就讀南京中央政校蒙藏班)之岳父朱洲乎(係漢人，其女嫁嘉樂頓珠)，將要與中共進行談判的信件，轉交中共中央，次年(1950 年)四月八日，中共中央復函，表示將派員到香港與西藏地方當局進行談判，但由於夏格巴未能取得入港簽證，其事遂寢。夏格巴仍留在印度噶倫堡；其後西藏地方改派以阿沛·阿旺普美為首的五人代表團，到北京與中共中央進行談判，最後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此項協議共十七條，一般均稱之為：《十七條協議》，時為 1951 年五月二十三日，此協議經過長達五個月之久，西藏地方內部應是經過詳細的討論，最後十四世達賴於 1951 年十月二十四日正式致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表示擁護《十七條協議》，塔斯社於十月二十七日引用新華社文稿，發布了達賴電報全文如下：

「中央政府毛主席：

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權代表噶倫阿沛等五人，於 1951 年四月底抵達北京，與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權代表進行和談，雙方代表在友好的基礎上，已於 1951 年五月二十三日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地方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並在毛主席及中央政府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謹電奉聞。

西藏地方政府達賴喇嘛

公曆 1951 年 10 月 24 日

藏曆鐵兔年 8 月 24 日」<sup>4</sup>

就上引達賴之說法，西藏地方僧俗人民對《十七條協議》並無異議，但在噶倫堡之夏格巴則全力反對《十七條協議》，蓋因此一協議與藏獨理念全然不合之故，於是他開始撰寫《藏區政治史》，其所以要撰寫此書，

<sup>4</sup> 引自梅·戈爾斯坦著·杜永彬譯《喇嘛王國的覆滅》(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31~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下冊頁 843。

是由於夏格巴之叔父（赤門巴·諾布旺杰）曾擔任西姆拉會談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司倫夏札·班覺多吉之助手，參加了該會談，而將會談的第一手資料交給了夏格巴；如所周知，英國始終蠱惑西藏脫離中國，而創造了「內藏」、「外藏」這兩個名詞，這是想援外蒙古、內蒙古之稱謂，而清末宣統三年，外蒙古在俄國操導下宣稱獨立，英國想援外蒙古之例，將「外藏」（指西藏地方）置於其保護之下，其實所謂「內、外藏」根本不符史實，只是帝國主義者妄想分化、裂解中國、憑空杜撰出來的詞彙，但是夏格巴卻照單全收，他對中國歷史所知太少，不知道「內蒙古」、「外蒙古」這兩個名詞明載於《大清會典·理藩院則例》，如所周知，《大清會典》乃是清代的法律匯編，因此「內蒙古」、「外蒙古」就是法律名詞，但在既往中國任何文獻中，從未出現「內藏」、「外藏」這兩個詞稱，夏格巴居然接收了英帝國所刻意捏造的詞彙，可見其基本心態就是要搞西藏獨立，因此無視許多既有的史實，如其叔父在藏曆鐵羊年（1931年）的某日，曾對夏格巴說有關從前驅逐駐藏的中國滿洲皇帝的全體官兵一事<sup>5</sup>（按係宣統三年川軍被驅逐一事），這件事夏格巴如果肯花一些腦筋去推敲一下，如果西藏不是中國清朝領土，清朝如何能派軍隊入藏？如果夏格巴肯花一點工夫翻讀一下《大清會典·理藩院則例》，就會知道在中國清朝西藏是屬於中國的領土，中央派有駐藏大臣，在西藏重要地點還派兵駐防，這些既有的史實，夏格巴都不去瞭解、或者裝着不知道，然而這並不能改變既有的史實。

夏格巴認為既有其叔父噶倫赤門巴·諾布旺杰的教誨，又擁如此重要的文獻資料（指其叔父交給他的有關西姆拉會議的資料），又有充裕寬鬆的時間，就要把《藏區政治史》寫出來，其所以要寫此書，「其原因還在於：滿洲王朝和後來的國民黨以來，中藏間的檀越關係（即佛教施主與福田的關係）就遭到了歪曲，編造了許多西藏是中國領土的圖書和地圖。對此，藏人中一時還無人進行批駁；又因限制外國人入藏區，因而大多數外國人都以為可能就像中國人說的那個樣子。對此也未能給以糾正。特別是具有愛國心的藏族年輕一代，難于得到更多的圖書和文獻，即便到手，也難于認真參究。為了解決此類困難和麻煩，並滿足還想弄明白從吐蕃法王

<sup>5</sup>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上冊頁4。

時期到眼這個末劫惡世的藏區政史等多種需要，特別據確鑿可靠的資料，撰寫出這部政治王統史以申所願。」<sup>6</sup>

從以上這一段自敘撰書目的，已經很清楚看出這部《藏區政治史》至少有兩個主要目的，其一根本否定西藏屬於中國清朝代的史實，而捏造出西藏與中國只是檀越關係（即佛教施主與福田的關係）；其二想透過此書煽動藏族年輕的一代走向藏獨。

夏格巴在敘述撰書目的中，從開頭就扭曲了歷史真象，將西藏隸屬中國清朝與繼承清朝的中華民國，曲解為檀越關係（即佛教施主與福田的關係），這說法用以迷惑喇嘛教信徒，或許會產生一些效果，但是從史實來看，這只是一廂情願的囈語，就如同夏格巴書中（漢譯本上冊頁 5）所說布達拉宮內寢所供奉的夜息天母神像「曾經開口說過話」一樣，騙騙一些喇嘛教信徒，或有可能。如果看看後金（滿清入關前之稱號）皇太極（1627~1643 年在位）如何看待喇嘛及喇嘛教，皇太極曾說：

「喇嘛等口作訛言，假以供佛持戒之名，潛肆淫邪，貪圖財物，悖逆造罪，又索取生人財帛、牲畜、詭稱人免罪于幽冥，其蕪誕妄為尤甚，喇嘛等不過身在世間造作罪孽，欺誑無知之人耳。」<sup>7</sup>

皇太極以此心態看待喇嘛及喇嘛教，怎會是施主與福田的關係？皇太極所說的「潛肆淫邪」，絕非無的放矢，而是自元代引入喇嘛教後，諸多喇嘛在內地確有淫邪之行，如元末明初時人葉子奇就曾在其著作中指出眾多喇嘛之不端行為，葉氏稱：

「都下受誡（都指元大都即今北京；誡同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時時延帝師（元時以薩迦派法座為帝師）堂下戒師，於帳中受戒，誦咒作法，凡受戒時，其夫自外歸，聞娘子受戒，則至房不入，妃主之寡者，間數日則親自赴堂受戒，恣其淫佚，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sup>8</sup>

<sup>6</sup>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上冊頁 6。

<sup>7</sup> 見《清實錄·太宗朝》卷二十八，天聰十年（1616 年）三月庚申。

<sup>8</sup> 見葉子奇《草木子》，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卷四之下，頁 84。

可見皇太極指喇嘛「潛肆淫邪」乃是有所本者。再看皇太極可見皇太極之孫康熙皇帝（1662~1722 年在位）如何看待喇嘛及喇嘛教，康熙曾說：

「若蒙古等惑于喇嘛，室中所有為之罄盡，此皆係愚人崇信禍福之說，而不知其終無益也。」<sup>9</sup>

再看康熙之孫乾隆（1736~1795 年在位），就明白說出清廷之所以保護、優遇喇嘛教之格魯派（俗稱黃教），實由於「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sup>10</sup>可見其優崇喇嘛教，乃是出於政治目的，縱觀自皇太極至乾隆祖孫五代是以如此心態看待西藏喇嘛教，何來施主福田之說。以上還只是清帝對待喇嘛、喇嘛教的態態，一旦落實到執行層面，那就是在清律上如何約束喇嘛，據《大清會典·理藩院則例》所載，從喇嘛所穿服色、為人治病、為人念經時不可殺生（意即為人念經時應素食……等都有詳細規定，如有違犯，輕則罰牲，重則鞭笞，請問夏格巴，果真中國清朝與西藏是施主與福田的關係，施主可以如此種福田嗎？可見夏格巴所說的檀越關係，全錯，在邏輯上前提如錯，所有推論都不會對。

夏格巴為了謀求藏獨，為爭取國際支持，「暫且先把這部政治王統史（即《藏區政治史》）用英文出版發行顯得格外重要。」夏格巴於 1963 年辭去西藏流亡政府所派任的駐德里代表職務，在亞洲基金會的幫助下，到美國耶魯大學委由其子及羅斯金邦德譯成英文，並由美國「藏學家」威利編輯校訂，當時書名為《藏區政治王統史》，於 1967 年出版，這書名顯然是模仿五世達賴喇嘛的《西藏王臣記》、索南堅贊的《西藏王統記》<sup>11</sup>而來，不無東施效顰之意。至於亞洲基金會基本上存有反中國（無論何人、何政黨執政之中國）立場，秉持美、歐傳統反華思維，所以支助夏格巴赴美以及英譯此書。此英文譯本問世後，頗受到美、歐反華者及浮淺之研究藏學者之重視，許多美國「藏學家」奉之為圭臬，因此美國許多「學

<sup>9</sup> 見《康熙起居注》十二年（1673 年）十二月初六日，但此處係轉引自余梓東《清代民族政策研究》，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 年，頁 289。

<sup>10</sup> 見乾隆御製《喇嘛說》，以全文過長，僅引此一句，全文批評喇嘛者甚多。

<sup>11</sup> 《西藏王臣記》原名《天神王臣下降雪域（西藏）陸地事跡要記一圓滿時節，青春喜筵之杜鵑歌聲》，而《西藏王統記》原名《吐蕃王朝世系明鑑》，該書作者為薩迦派喇嘛，為元朝末期人，早於五世達賴。

者」、民眾受此書誤導，再加上反華的潛意識思維，一時之間產生了支持藏獨的言、行，可見此書具有相當影響力。

之後，夏格巴在《藏區政治王統史》的基礎上，加以擴充，於 1967 年之後，開始擴充此書之編寫工作，曾造訪印度、錫金、不丹乃至一些外國圖書館，查閱有關西藏的史料文獻，於 1976 年終於完成藏文本《藏區政治史》並在印度德里出版。此書英、藏本出版後，對於宣揚藏獨如虎添翼，曾有學者評論如下：

「本書打著起民族情緒，保持民族宗教和歷史文化傳統的旗號，大力宣揚極端的民族主義。書中時時處處都流露出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憂患意識，很容易激發起民族主義情緒，也很容易博得人們對處於流亡狀態的弱者的同情心理。熱愛本民族、關心民族的發展和命運是人之常情，可是本書從頭到尾都在兜售“西藏獨立”的觀點，都在以歪曲事實為代價來宣揚民族仇恨，從整體來看，該書更像一部政治宣言書，而不是嚴格的歷史書。在那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國際上是長期交惡的冷戰雙方，國內是動亂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因此，一種非理性的幽靈在盤旋著，影響到閱讀本書的讀者，而給本書以巨大的鼓勵和熱情，助長了歪曲歷史、虛誇事實的風氣，使本書有了一定的市場。」<sup>12</sup>

此項評論頗稱公允，筆者也曾在多篇文章中對此書提出批評<sup>13</sup>，夏格巴之書對傳統的、文化的、歷史的中國，造成頗大的負面影響，理應引經據典予以辨正，以免以訛傳訛危害民族融合國家統一。但以其書篇幅頗大，藏文本又是在英文本基礎上予以擴充的版本，要譯為漢文有其一定的難度，但以此書旨在製造民族矛盾、宣揚西藏和中國只是宗教上的檀越關係（即施主和福田的關係）——是一部宣揚西藏獨立的政治宣傳品，但是引

<sup>12</sup> 見張云《詳夏格巴的〈藏區政治史〉一書》，此文輯入張著《西藏歷史問題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 年，頁 309。

<sup>13</sup> 筆者蒐集近年有西藏之文章十餘篇，集結成書，書名暫定為《掀開西藏神秘面紗，認清達賴真實面目》，其中有篇對夏格巴之書作出批評，此書將由台北知書房出版。

用了頗多藏文文獻以及漢文史料（這一部分往往被夏格巴任意刪節或篡改），使政治文宣披上了「學術」外衣，尤其英文本更是如此，使美、歐一些所謂「藏學家」以及意圖分化、裂解中國（指文化、歷史的中國）的政治人物奉為圭臬，貽害頗大，有鑑於此，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副總幹事、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扎西澤仁建議將此書全文漢譯（扎西澤仁之職稱係 1992 年之職稱，至今已有半個世紀，必然已是物換星移有所變更），由是責成四川省「歸國藏胞接待辦公室」負責翻譯此書之組織，計邀請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四川民族研究所、四川藏學研究所、西藏社科院、西南民族學院、四川省歸國藏胞接待辦、四川人民廣播電台、四川民族出版社等單位相關學者組成翻譯組，計有：

翻譯顧問：劉立千（曾譯有《西藏王臣記》、《印藏佛教史》、《續藏史鑑》等專書）、欽繞威色；

內文翻譯：劉立千、羅潤蒼、扎西尼瑪、楊秀剛、余萬治、央京娜姆、茨仁拉姆；

二審校訂：羅潤蒼、喻忠猷、余萬治；

終審通纂：羅潤蒼；

排版校對：余萬治、扎西尼瑪、羅潤蒼

資料索引：茨仁拉姆

組織協調：陳新福

出版單位：中國藏學出版社。<sup>14</sup>

由於《藏區政治史》作者夏格巴強烈的藏獨思想，對史料往往憑己意「做了大肆的閹割和斷章取義的工作，使史料變得面目全非。」<sup>15</sup>或許由於《藏區政治史》這一類的錯誤太多，怕讀者受其誤導，因此漢譯本並未公開普遍發行，屬於內部資料，但無可避免已有英文本、藏文本流入坊間，為免誤導讀者，大陸西藏自治區特別組織了「西藏自治區《西藏政治史》評注小組」（按《西藏政治史》即《藏區政治史》）編寫了《夏格巴

<sup>14</sup> 以上係引自《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351~352《譯後記》，劉立千引號內所譯之書係筆者所加。

<sup>15</sup> 見張云《評夏格巴〈藏區政治史〉一書》，該文輯入張云《西藏歷史問題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2008 年，頁 317。

的〈西藏政治史〉與西藏歷史的本來面目》一書批駁《藏區政治史》，據該「編寫組」的《出版說明》中作出如下的說明：

「這是一本以翔實可靠的史料全面評注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的資料集。評註的主要內容有：

1. 凡史籍中沒有而夏格巴杜撰的部分，指出其杜撰的部分，澄清事實；
2. 凡夏格巴引用史料時，錯引漏引的部分，引用史料，指其錯漏之處；
3. 凡夏格巴引用史料時，故意篡改的重要詞句，引用史料進行核對，指出修改的部分，還原史料的真實面目。

本書不僅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同時也是一本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好教材。」<sup>16</sup>

此書共指出《藏區政治史》六十七條錯誤，仍不夠全面，如認真分析，全書幾乎錯的多，對的少；而《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一書並未公開發行，無法與此書比照對讀，是一大缺憾，而在《出版說明》中末句「同時也是一本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好教材。」實屬狗尾續貂，既是純學術批評（《說明》所舉三項均屬純學術者），無需冠以政治含義之「愛國主義教育」。由於編寫組所出版之書，與已出版的《藏區政治史》漢文譯本，在頁碼上並不一致，編寫組所據者為藏文本，這對未擁有藏文本或不識藏文者而言，失去比照對讀功能，理想的作法應是以漢文本（英、藏本也然）全文照錄，在錯誤之段落之下，以另一字體大一號字加以批駁（英、藏文本也然），如此方能使讀者能夠前後貫通一目瞭然，雖然篇幅會更大，但效果絕對會提高，而且可以公開大量發行，使夏格巴篡改、杜撰史料的劣跡惡行公諸世人，所謂西藏與中國中央只是檀越關係，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等都只是美麗的謊言。

此處且不談大的錯誤，就其對西藏首府的描述，就可知此書的可信度有多低，《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上冊頁四十七至四十八對拉薩市有如下的

<sup>16</sup> 見《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與西藏歷史的本來面目》，北京民族出版社，1996年，首頁。

描述：

「拉薩市內常住人口有五～六萬人，藏曆元月，傳曰法會期間，加上三大寺僧侶和各地來的朝佛者，人口可增加到十～十二萬人。拉薩市人不論地位高低貴賤都十分悠閒自得。不管是經常性的還是臨時性的，只要與佛事有關的節慶活動，他們一到晚上就敲鑼打鼓在八角街跳舞唱歌。乞丐們也是白天乞討要飯，到夜晚醉醺醺地呆著。人們具有悠閒、舒暢、營養豐富，勿須為生活奔波，一切順其自然等奇異的天性。」

這一段文字把拉薩描述的如天堂一般，而拉薩人仿佛活在桃花源裡悠然自得，現在且看同樣在《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上冊頁四十五，如何描述拉薩市：

「拉薩城內的街巷狹窄，即便是要道衛生條件也差，不美觀，每年傳大小召法會期間的飲用水，必須從大河經水管提取外，平常主要飲用井水，……。但因陰溝不很暢通（按陰溝，指下水道），每年三月份八月街一帶都要掏陰溝，把污物泥土撈上來，使得城內好幾天臭氣熏天。」

夏格巴並沒有交待從陰溝掏上來的污物泥土如何處理，想來應是堆在路邊，任其自然乾燥，試想在這種條件下，人們如何一到晚上，「就敲鑼打鼓在八角街跳舞唱歌」？夏格巴於 1950 年離開拉薩到印度，此後再沒有回到拉薩，因此他所描述的拉薩情況，應是 1950 年以前的情況，現在且看在同一時代，在拉薩的德國人海因利希·哈勒（Heinrich Harrer）如何描述拉薩，他說：

「大昭寺門口盤踞了不少乞丐，他們深知人在神面前是慈愛又體貼的。在西藏，如同在多數其他地方，乞丐是一項公害，在我建壩那段時候，（西藏地方噶廈）政府決心化乞丐為人力。他們集合拉薩千名乞丐，從中挑出七百位合於受雇者，安排上工，支付其食物、薪資。詎料，第二天就跑掉一半，再過幾天人全跑光了。可見這些人並非因為找不到工作才成為乞

丐，多數人也沒有身體殘疾，純粹只是因為懶而已。」<sup>17</sup>

試看上段引文字，拉薩市常住人口不過五～六萬人，而乞丐竟然多達上千人，平均每五～六十個人，就有一個乞丐，這比例是否太高了，這與上段夏格巴所說拉薩市的，人們具有悠閒、舒暢、營養豐富，勿無為生活奔波，一切順其自然等奇異天性」，是否落差太大了？夏格巴的敘史論事，大多以這種美化自我，醜化他人，乃至篡改史料等方式，實應一一加批駁，以正視聽。

夏格巴在印度噶倫堡期間，與十四世達賴喇嘛二兄嘉樂頓珠、堪窮·洛桑堅贊三人籌組「西藏福利會」或稱「西藏幸福事業會」，初期並未定下名稱（1952~1954 年），而以「哲堪孜松」為名，這個組織名稱以英文字母拼寫成 Jenkhentsisum，縮寫為 JKTS，其所以取此名者，為便於從事西藏獨立運動<sup>18</sup>，「哲堪孜松」係 Jenkhentsisum 的漢字音譯，而 Jenkhentsisum 又是藏語稱謂的英文音譯「Jen」是兄長之意，是十四世達賴二兄嘉樂頓珠而言；「Khen」是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四品官堪窮的縮譯；（tsi）是指噶廈政府審計、財政當位四品官孜本的縮譯；而「sum」則是藏語中「三個」之意，總的意思就是這是一個由三個人組成的秘密組織與美國、印度接觸，期冀尋求支援其西藏獨立運動。按 1951 年十月，十四世達賴喇嘛致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聲稱擁護半年前西藏地方與中共中央所簽訂的《十七條協議》（本文前段曾引錄該電文全文），墨跡未乾，夏格巴、嘉樂頓珠、洛桑堅贊等西藏僧俗高層已經在境外，組建秘密組織，勾結帝國主義者，從事西藏獨立活動，而夏格巴又口口聲聲指責中共不遵守《十七條協議》，何其矛盾，像是「賊喊捉賊」，需知許多事並不必然是先喊先贏。

<sup>17</sup> 見 1997 年 3 月 17~20 日，台北《自由時報》，標題為《我與少年達賴》，海因利希·哈勒撰、刁筱華譯。按海因利希·哈勒係德國，原為納粹分子，1939 年 9 月在印度被英軍俘獲，1944 年越獄逃往西藏，1946 年接近達賴，1950 年中共軍隊入藏後，倉皇逃離西藏，匿居列支敦士登，撰有《在西藏七年》，上引當係此書之一篇。

<sup>18</sup> 見王小彬《夏格巴日記與西藏幸福事業會》專文。

## 二、關於「西藏福利會」

上節指出自 1950 年後，夏格巴就滯留印度噶倫堡稍後與十四世達賴二哥嘉樂頓珠及堪窮·洛桑取贊籌組「哲堪孜松（JKTS）的秘密組織，勾結美印等帝國，從事西藏獨立活動，這個秘密組織，就是「西藏福利會」（或稱「西藏幸福事業會」）的前身，當藏獨分子、西藏流亡政府指責中共違反《十七條協議》時，何不反躬自省己身所為，究竟是誰先心存異見？也就在「哲堪孜松」組織前後，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已經將布達拉宮金庫裡的金銀，運到錫金首都甘托克存放<sup>19</sup>，西藏噶廈政府金庫所存放的金銀珍寶，乃是自五世達賴喇嘛時代起，累積歷代達賴所聚斂之財富，總量究竟有多少，難以推估，但可以推測是非常之多，可能多達數以萬噸計，何以見得？且看衛拉特蒙古（清代稱之為額魯特或厄魯特蒙古）最大活佛咱雅班第達呼圖克圖（或作咱雅班智達），其所以稱咱雅班智達者，「咱雅」係地名；「班智達」，在喇嘛教中凡喇嘛精通五部大論，並於大昭寺辯經中獲得拉然巴格西學位者<sup>20</sup>，可得「班智達」名號，一世咱雅班智達為和碩特部（為四衛拉特之一部）諾彥（係蒙古語，意為長官或首領）巴巴汗之子納姆哈嘉木錯，在五世達賴身邊習喇嘛教法二十餘年，被認定為咱雅地方之轉世活佛，至 1638 年（明末帝朱由檢崇禎十一年，後金皇太極崇德三年），五世達賴及四世班禪（時尚未有額爾德尼之號）均認為咱雅班智達已然學有所成，應返回衛拉特蒙古弘揚喇嘛教格魯派法。

從此咱雅班智達不辭辛勞奔波於衛拉特各部，乃至遠到裏海北境，伏爾迦河一帶的土爾扈特蒙古弘揚喇嘛教法<sup>21</sup>，收取大量供養（包括金銀及牲畜），1659 年夏季某日，衛拉特部車臣汗問咱雅班智達呼圖克圖：你為何四處奔波？咱雅班智達呼圖克圖回答稱：

「一方面是為了傳播至高無上的佛教，另一方面是籌集禮

<sup>19</sup>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309。

<sup>20</sup> 所謂五部大論，指般若、中觀、釋量、戒律及俱舍五論。而格西係「格西喜聯」之簡稱，係藏語，其意為「善知識」，格西學位分四等，依序為：拉然巴格西、曹然巴格西、林瑟格西及日然巴格西；拉然巴格西位階最高。

<sup>21</sup> 明末衛拉特四部之一的土爾扈特部，從今新疆西北部塔城一帶舉部西徙裏海北境，西方文獻均以喀爾瑪克（Kalmak Mongol）稱之，甚至以喀爾瑪克泛指全部衛拉特蒙古者。

品和捐獻品（按即收集信徒的「供養」），以便酬謝在我  
求學期間，給我糧食吃，讓我享福的寺院，教授我學問，  
給我以巨大恩惠的達賴喇嘛金庫。」<sup>22</sup>

可見咱雅班智達呼圖克圖不辭辛勞，四處奔波接受供養，其目的是奉獻給五世達賴喇嘛以充實其金庫。再看本文前段所引皇太極說：「喇嘛等口作訛言，……又索取生人財帛、牲畜……」、康熙曾說：「若蒙古等惑于喇嘛，室中所有為之罄盡……」，這些喇嘛取得信徒財物（供養）後，或多或少會奉獻到達賴的金庫；再看十三世達賴於 1904 年英軍攻入拉薩前夕，率若干親信遭往外蒙古，初在庫倫接受蒙人供養，稍後因與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不和，又到三音諾顏部（注意，此部不稱汗）接受蒙人供養，總計在外蒙期間獲得「紙鈔、銀板、金沙、玉器、駝鳥等項，幼銀二、三百萬。」<sup>23</sup>外蒙古經十三世達賴之「弘法」及接受蒙人「供養」，外蒙古大約二、三年元氣難復（見註 23 所引書），可見達賴金庫之豐碩。經過幾世達賴喇嘛的累積，其金庫所藏黃金、白銀、珍寶的數量必然相當驚人，「哲堪孜松」籌組時，必然要有經費支持，否則如何運作？何況夏格巴、嘉樂頓珠、洛桑堅贊都是貴族身分，其生活雖未必奢華，但也絕非一般平民化生活，長期滯留印度，由誰支付其生活及活動經費，除非有某一個國家支付，否則動用到貯存在錫金甘托克的金庫中金銀，也是極其正常的，如果過份撇清，反而會啟人「此地無銀三百兩」的疑竇。

「哲堪孜松」於 1954 年七月十四日，在印度政府支持下，正式轉型為「西藏福利會」（或作「西藏幸福事業會」<sup>24</sup>，從 1955 年至 1956 年，西藏福利會組織與活動都有所加強，在這兩年該組織與印度、美國、西藏境內，錫金王室都加強聯繫，據《夏格巴日記》自稱西藏福利會積極促成

<sup>22</sup> 見喇德納巴德喇著，成崇德譯《咱雅班第達傳》該傳輯入北京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編《清代蒙古高僧傳譯輯》，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出版，1990 年，頁 10。

<sup>23</sup> 見李廷玉《游蒙日記》，頁 41，此書係手抄本，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 年）於東京影印出版，1990 年北京中國社科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將之輯入《清末蒙古史地資料薈萃》予以出版，仍以手抄本影印出版。

<sup>24</sup> 見王小彬《夏格巴日記與西藏幸福事業會》。

美國從軍事上、特工人員培訓方面給予支援，對大陸西康地區康巴人的動亂給予支持，西藏福利會是通過美國駐加爾各答領事館與美國情報機構聯絡，最晚在 1958 年八月，西藏福利會已經得到美國將支援他們的明確訊息（見註 24），而且美國情報單位（後來的中央情報局）經西藏福利會的「努力」聯繫之後，已經展開實際的「援藏行動」，其內容包括訓練特工，提供武器彈藥等，1959 年三月拉薩發生動亂後，有一批康巴所組成的「四水六嶺衛教軍」流亡尼泊爾木斯塘，美國也協助其建立基地<sup>25</sup>，雖然沒有明顯的證據指明這些都是西藏福利會的「工作績效」，但可以推測西藏福利會絕對與之有關。

西藏福利會既要從事以上這些工作，必然需要經費支持，如果動用稍早運到錫金甘托克存放的金銀寶，以支付「哲堪孜松」（即後來之西藏福利會）生活費及工作開支應該都是合法合理的，刻意迴避西藏福利會的經費問題或再三表明運存甘托克的金銀財寶如何的原封不動，反而有欲蓋彌彰之嫌，現在且看夏格巴對西藏福利會（渠稱之為西藏福利協會）、及存放在錫金甘托克的「我政府的金銀」如何解釋，當 1959 年三月拉薩暴發動亂後，十四達賴及其家人、官員在五、六百康巴衛教軍擁簇下離開拉薩，當達賴一行於四月二十日到達印度密蘇里時，夏格巴等人，到西里古里拜見達賴後，立刻回到噶倫堡，召集了所有「西藏福利協會」代表開了一次會議，夏格巴說：

「達賴喇嘛在西藏期間，其兄長（指二哥嘉樂頓珠），堪布和孜本我等，就像沒有公雞打鳴，只得由毛驢報曉一樣，為西藏事業盡心盡力開展工作；現在達賴喇嘛已平安來到印度，西藏內外全部事務，都由達賴喇嘛和噶廈負責。從今天起，我們這個組織撤銷，我們大家都要服從達賴喇嘛的領導。」<sup>26</sup>

從這段文字看，似乎從 1959 年四月二十日起，西藏福利會就不存在了。在西藏福利會存在期間，顧名思義理應從事有關西藏的福利事業，

<sup>25</sup> 見厲聲、孫宏年、張永攀《十四世達賴喇嘛人和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196。

<sup>26</sup>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309。

「福利」這個詞，很難與「政治」、「間諜行動」等同起來，但西藏福利會卻以政治與間諜活動，作為其主要工作內容，其中以與美國、印度情報單位聯繫、與西藏境內聯繫較為重要，美國學者梅·戈爾斯坦依據夏格巴日記所撰著《西藏現代史卷三：山雨欲來：1955~1957》（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3, Theorm Clouds descend 1955~1957》，美國加利福尼亞出版社，2014 年）一書第六章，多所引用，茲就西藏福利會與美國、西藏境內之關係酌予敘述如次<sup>27</sup>：

#### （一）西藏福利會與美國之關係

自中共席捲大陸建政後，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司徒登雷並未立即離開南京，意圖與中共建立關係，但為中共所拒絕，由是美國感到緊張，遂產生新對華（指中共）政策，其核心目的，旨在削弱中共，由是利用西藏製造問題，認為可以作為牽制中共的一個籌碼，初期（1951~1952 年）十四世達賴曾到亞東觀望情勢發展（此時夏格巴已在印度），美國情報單位想必是透過夏格巴，設法勸說、引誘十四世達賴流亡海外，但是沒有成功，當達賴返回拉薩已明白致電中共毛澤東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十七條協議》，美國情報單位仍然勸說達賴逃離拉薩，這項勸說工作主要是透過夏格巴負責，另外，達賴的二哥嘉樂頓珠（係「哲堪孜松」成員之一）及大哥當才·土登諾爾布也從旁幫腔，並呼籲美國給予政治、經濟及道義上之支持。

嘉樂頓珠於 1951 年秋至 1952 年二月曾到美國，美國並未特加重視，放是回到印度，曾於同年九月六日，與美國駐加爾各答領事館官員索倫（Gary soulen）會面，也不得要領，至十一月十二日，嘉樂頓珠直接致函，其在美時曾見過面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要求美國建立專門研究西藏問題之機構，其重點目的是希望在美國協助下，建立軍事抵抗組織，而這一點正是嘉樂頓珠離開拉薩之主因。美國之所以對嘉樂頓珠不感興趣，原因雖多，但認為「嘉樂頓珠所提供的資訊沒有價值，假話連篇。」<sup>28</sup>

<sup>27</sup> 以下多參採前引王小彬所撰《夏格巴日記》與《西藏幸福事業會》專文，該專文附錄列有《夏格巴日記摘編》。

<sup>28</sup> 王小彬專文頁 19。

美國艾森豪威爾當選總統後，美國對外政策有了極大改變，對外發展秘密軍事行動，因此西藏福利會與美國情報單位也有了新發展，1954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簽署之對美國涉藏秘密軍事行動產生重大影響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秘密軍事行動計畫。」<sup>29</sup>至此西藏福利會與美國情報單位關係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因為此一計劃，美國開始公然介入西藏事務；從夏格巴 1956 年日記，看到西藏福利會（哲堪孜松）透過美國駐加爾各答總領事瑞姆（Reams）向美國尋求支助，而美國也積極支持西藏福利會，就時程而言，1951 年十月，達賴致電毛澤東說是「西地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十七條協議》，而達賴家人、僧俗官員（堪窮洛桑堅贊為僧官，孜本夏格巴為俗官）就開始勾結外國謀求西藏獨立，充分顯示西藏僧俗高層的雙面性格。

## （二）西藏福利會與西藏境內的關係

十四世達賴與西藏福利會的關係，極為微妙，從表面上看像是毫無瓜葛，但其二兄嘉樂頓珠又是西藏福利會重要成員之一，想要完全撇清，相當不易，達賴的侍從長帕拉、噶廈的官員幾乎都與西藏福利會有所牽扯，當然也不能就此認定西藏福利會所有行動，達賴都知情。如夏格巴日記：

<sup>29</sup> 該計畫稱：鑑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與共產主義中國及其操縱的政府、政黨、團體，醜化並破壞美國及自由世界其他國家的目標與機構，按照杜魯門（Truman）政府 2 月 10 日與 5 月 10 日頒佈的國家安全計畫，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決定，為世界和平和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起見，美國政府對外機密活動必須增補秘密軍事行動……國家安全委員會決定這樣的秘密軍事行動，在切實可行基礎上最大程度地考慮到美國和蘇聯潛在能力以及戰爭的危險的前提下，必須規劃如下：a. 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製造麻煩，並利用之，挑撥蘇聯和中國，以及他們各自與其衛星國之間的關係；使蘇聯、中國及其衛星國內部的統治趨於複雜化；阻礙蘇聯集團經濟及軍事的發展。b. 醜化國際共產主義形象，詆毀共產主義思想意識形態，削弱共產主義政黨及其他成員的力量。c. 為獲得對自由世界國家的主導權，對共產主義的壓制反映迅速，反抗任何來自政黨或個人、直接或間接的威脅。d. 擠壓和縮小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全球所控制的地區。e. 增進對美國及世界自由國家人民的瞭解；盡可能強調自由國家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同時支持那些在共同利益的發展過程中，真正擁護和肯定我們的團體；提高這些國家和人民抵抗國際共產主義的能力和意願。f. 依據制定的政策，在切實可行範圍內，在受國際共產主義主導和威脅的地區，盡最大程度地發展地下抵抗組織，幫助他們實施秘密軍事行動和遊擊戰爭，如果爆發了戰爭要保證這些武裝力量在戰爭中的有效能力，使他們在戰爭中盡可能獲得可能用於擴大力量的軍事基地、敵後潛伏的有利條件、逃跑及躲避的裝備設施。以上係王小彬專文之原註。

1956 年一月五日就記有：陛下（指達賴）發來一封無線電訊息，通過錫金政府的司機送達嘉樂頓珠，其內容為：

「你的兩份信件都收到了，內容知悉，因為諸困難，我尚未確定是否能夠赴印度。你們應當為國憂慮，無論眼前還是長遠，要運用秘密方法來繁榮西藏政教大業。但是有關絕密事情，你們不能做得太多，也不能做得太少。至於信件聯絡，有很多內外障礙，暫時先停止發信來。」（引自王小彬專文頁 24）

達賴中所指「我尚未確定是否能夠赴印度」，是指印度要舉辦釋迦牟尼佛誕生二千五百周年紀念活動，夏格巴等透過錫金王子爭取邀請達賴參加此項紀念活動，此時尚不知中共中央是否同意其前往，故有此語。從上引達賴電文，可證實他確實知道此一秘密組織的存在，也瞭解其主要運作情形，所以電文才会有「要運用秘密方法來繁榮西藏政教大業」這句話，可見十四世達賴對西藏福利會的存在及其活動是知情的。

1956 年八月十九日，西藏福利會開會討論向美國尋求以下幾項具體援助：

- 1.金錢。
- 2.武器。
- 3.向大陸藏區空投武器。
- 4.向大陸藏區空投宣傳品。
- 5.舉辦尋求西藏獨立的多種講座。
- 6.要求美國及其盟國支持我們向聯合國呼籲。
- 7.設法從美國用藏語向大陸藏區播放新聞。
- 8.培訓大陸藏區藏人使用武器與爆炸物技能。

西藏福利會人員會將這些具體需求，在與美國駐加爾各答總領事瑞姆（Reams）會面時交給他們（見王小彬專文頁 22），從而可見大陸康區的動亂，與美國提供武器有密切關係。

1957 年初，西藏福利會第二號人物嘉樂頓珠安排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在旅居印度的藏人中挑選了六個康巴人接受美國特工訓練，訓練基地在美國科羅拉多州洛磯山脈下的哈爾營，之後又陸續送去一百七十多個藏

族（可能多是康巴人）到此基地受訓，為期四個月，結訓後，這些訓畢的特工，有些從印度潛入西藏，有的分批空投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理塘及西藏之山南、邊壩、納木湖、唐古拉山區、芒康、仲巴等地<sup>30</sup>，這些人就成為後日西藏動亂的骨幹，推本究源，都是西藏福利會的「傑作」。

西藏福利會要從事以上這些「艱巨」的工作，不可能沒有預算支持，縱然動用貯放在錫金甘托克西藏金庫裡的金銀，也屬合理，但是夏格巴對存放在錫金甘托克西藏金庫的說法是：

「在錫金甘托克存放的我政府的金銀，有很多無根據的謠傳說被佛兄（按指達賴二哥嘉樂頓珠）、堪布和孜本（指堪窮洛桑堅贊、孜本夏格巴）三人動用了。但實際上，存放處門鎖和封條都完整無缺，沒有動用一絲一毫，隨時可以移交。」<sup>31</sup>

夏格巴說這話的時候，是拉薩動亂，十四世達賴一行已經流亡印度，在時間上不會早於 1959 年五月，那麼從「哲堪孜松」組建開始這八、九年間的活動經費從何而來，美國初期並不贊同這個組織，所以不可能成為西藏福利會的提款機，難道是夏格巴、嘉樂頓珠、洛桑堅贊三人「毀家抒難」？果真如此，其熱愛西藏之情操令人欽敬。

不過，從另一項資料看到不同的訊息，辭卸西藏流亡噶廈政府噶倫職務的宇托扎西頓珠來台後，曾說：

「達賴喇嘛於四十八年（1959 年）離藏赴印度時由宇托經手運印之西藏地方政府黃金白銀（不是存放於甘托克者），約值印幣二千萬盾，以當時價值約合美金四百萬元，爾後此財產之大部分，已為嘉樂頓珠貸放印商失敗而耗損。」<sup>32</sup>

設若宇托扎西頓珠之說屬實，既能動用 1959 年運到印度的金銀於後，未必不會動用早先運到甘托克存放的金銀於前？

<sup>30</sup> 見厲聲、孫宏年、張永攀《十四世達賴喇嘛人和事》頁 194~195。

<sup>31</sup>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309。

<sup>32</sup> 宇托來台後，曾與蒙藏委員會部寄嶠委員長多次談話，郭氏之將之提報國民黨中央，詳見劉學銑編輯《民國以來蒙藏重要政策彙編》，蒙藏委員會，2001 年，頁 229

### 三、結語

夏格巴其人極為黠慧，明知中國元、清兩朝實際統治西藏，卻很巧妙的篡改了中國元朝統治西藏的史實，對中國清朝之質實統治西藏，則刻意曲解為「供施關係」（即施主福田關係），企圖混淆視聽，因此其所撰《藏區政治史》，不是史書，只是一部政治宣傳品，關於供施關係或檀越關係，本文前段已有批評，至於中國蒙元時期，吐蕃（即西藏）降於蒙古，不僅漢文史冊明白記載此一史實，即使藏文史料也載有此事，關於吐蕃薩迦派薩班與蒙古闊端在涼州會談後，將吐蕃納入大蒙古國（伊克、蒙兀兒、烏魯斯）及其後的元朝版圖，藏文史料也如實記予以記載，如《薩班致番人書》就明確記載了蒙元統治者要求吐蕃各地領主將官員姓名、百姓數目及貢品數量如實上報，接受蒙元法律統治<sup>33</sup>，這就證實吐蕃屬於蒙元行政管理；另有藏文《朗氏宗譜》也如實記載：蒙古將領道爾達率兵入藏後，擊敗抵抗者，迫使止貢京俄把西藏裝木門人家的戶口名冊獻給蒙古統帥，最後「以蒙古的法令進行統治，使地方獲得安寧。」<sup>34</sup>《朗氏宗譜》還詳載大蒙古國蒙哥時期，在吐蕃地區推行千戶、萬戶的制度，更記載了蒙元朝廷派官員到吐蕃進行審判案件，委任官吏、調解紛爭等事，凡此均足證西藏確實屬於中國元朝，這些確鑿的史實，在夏格巴篡改、扭曲之下，變成：

「火羊年（即公元 1247 年），闊端汗與薩迦班智達會面，當時的西藏須向蒙古獻道若貢品，表面上似乎處在蒙古武力的控制之下，但事實上，西藏內政的統治權仍掌握在藏人自己的手裡。」<sup>35</sup>

夏格巴所描述的完全背離了史實，既有的史實，縱然有不同的詮釋空

<sup>33</sup> 見阿旺·貢噶索南著，陳慶英、高禾福、周潤年漢譯《薩迦世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藏文本頁135~140，漢譯本頁91~94。但此處係轉引自張云《評夏格巴〈藏區政治史〉一書》，此文輯入張著《西藏歷史問題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頁317。

<sup>34</sup> 見大司徒降曲堅贊著，贊拉·阿旺、余萬治漢譯、陳慶英校訂《朗氏宗譜》，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75，此處係轉引自張云《西藏歷史問題研究》頁317~318。

<sup>35</sup>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上冊頁170。

間，但不能背離既成史實，但夏格巴卻任意篡改史實，整本《藏區政治史》類此事例，可以用不勝枚舉來形容。

《藏區政治史》雖然錯誤百出，但夏格巴卻以篡改史料，偷天換日手法意圖欺騙世人，其目的是要製造西藏獨立，然而夏格巴也知道中國元、清兩朝確實統治西藏；西藏為中國元、清兩朝版圖，不但明載於中國的歷史，也為世界各國所共認，不是憑一本《藏區政治史》所能抹煞的，於是利用美、歐、日部分想分化、裂解中國的「學者」曾經提出過「滿蒙非中國」論，然而均未得逞，夏格巴拾人牙慧，進而指出蒙元、滿清非中國之說，企圖說明西藏，並未屬於中國，如所周知，我國自周秦漢唐一直到唐宋元明清，共有五、六十個政權或王朝，各有其政權或王朝名稱，均未以「中國」為正式國號，但又無不以中國自居，縱然是胡族所建的政權或王朝，亦復如此（如匈奴族所建之漢趙或作前趙、夏，羯族所建之後趙，鮮卑族所建之諸燕、代、南涼、西秦、北魏、北周及鮮卑化之北齊、鮮卑餘緒之契丹，氐族所建之前秦，成漢、後涼、羌族所建之後秦、羌族別支党項所建之西夏，盧水胡沮渠氏所建之北涼，女真族所建之金、清，蒙古族所建之元等，既使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之年號、廟號，也各有史書傳世，或為正史，或列於正史《載記》之中，其為中國正統王朝或政權，中外從無置疑者），夏格巴如因讀書不多知識有限，而受少數美、歐、日邪惡謬論（指蒙元、滿清非中國說）之影響，勉稱情有可愜，如果明知元、清兩代，乃是中國正統王朝，而仍持蒙元、滿清非中國之說，則屬罪不可逭，然而既成之史實，絕不會因夏格巴之無知或刻意扭曲，而有所改變。

至於「哲堪孜松」即「西藏福利會」或「西藏幸福事業會」成立之初就反對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共中央簽訂《十七條協議》，從而可以發現西藏僧俗高層之雙重性格，表面上由十四世達賴致電中共毛澤東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十七條協議》，而骨子裡卻在印度成立「哲堪孜松」秘密組織，勾結印度、美國情報單位，從事西藏獨立工作，爭取武器空投大陸藏區，製造動亂事件，其雙重性格暴露無遺。大陸西藏地區或四川境內藏族自治州藏人，在海外西藏流亡政府蠱惑、慫恿下從事亂動事件，犧牲了不少藏、漢人生命，拔本溯源，始作俑者就是「西藏福利會」或「西藏幸福事業會」，這些犧牲生命的藏漢人民，真的會認為他們的犧牲是「福利」或「幸福事業」？

## 臺灣岩畫與大陸岩畫之比較研究

張嘉馨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民族學博士後

吳楚克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教授

### 摘 要

海峽兩岸一衣帶水，從史前文化開始兩岸就有著頻繁的交流與互動。萬山岩畫是臺灣目前所發現的唯一一處岩畫遺跡，主要圖像有人面像、凹穴、蛇紋、渦旋紋、方格紋等，其主要類型和造型風格與大陸地區的岩畫，特別是東南沿海的岩畫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關聯性。對海峽兩岸岩畫的探討和比較研究是我們探索兩岸史前文化和史前交往的重要途徑之一。

**關鍵字：**海峽兩岸史前文化；萬山岩畫；人面像；凹穴

岩畫是指在洞穴、崖壁、岩面上鑿刻或彩繪類圖像的總稱，其產生晚于晚期智人的出現；到目前為止，歐洲、亞洲、美洲、大洋洲的 70 多個國家、150 多個地區有岩畫遺存發現，但僅非洲和澳洲少數族群目前還存有岩畫製作的傳統。在歐洲，岩畫多塗繪於洞穴的牆壁或壁頂，故歐洲岩畫也稱為洞穴藝術。在中國，二十世紀晚期的著作中偶見用“崖畫”、“崖繪”、“石刻”、“岩石地畫”、“巫畫”指稱岩畫。在中國大陸目前一般稱為“岩畫”，在臺灣通常稱為“岩雕”，這一稱謂始於臺灣岩畫學者高業榮關於“萬山岩雕”的論述之中。按照岩畫表現方式的不同，又可分為岩刻（petroglyphs、rock painting）和岩繪（pictographs、rock

engraving) 兩種類型，岩刻是指用鑿刻方式製作的岩畫、岩繪是指用色彩進行塗繪製作的岩畫；其中臺灣萬山岩畫是典型的岩刻類岩畫。

國際上，岩畫於 1879 年在阿爾塔米拉 (Altamira) 岩洞被首次發現，西班牙學者紹托拉在洞址發掘舊石器文化層時，他五歲女兒偶然的一瞥，看到洞穴岩壁上精美的繪畫，紹托拉將其認定為舊石器時代的繪畫，直到 20 年之後他的認定才得到學術界的承認。而最古老的岩畫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 ([upper palaeolithic](#))，在歐洲、澳大利亞和非洲均有發現。岩畫研究肇始於 19 世紀晚期法語學者 (francophone scholars) 對歐洲西部舊石器時代晚期洞穴岩畫的系統研究。岩畫對於世界許多地方的人都非常重要，他們把岩畫看作神聖之物，也是他們重要的文化遺產之一。<sup>1</sup>目前，岩畫被認定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世界遺產的國家有中國、法國、義大利、印度、阿塞拜疆、蒙古、利比亞、挪威、瑞典、坦桑尼亞、西班牙、葡萄牙、墨西哥、馬拉維、印度、保加利亞、哈薩克斯坦等國<sup>2</sup>。岩畫是一種全球性的現象，在世界不同地區的文化中都有發現，岩畫的創作貫穿於人類的整個歷史進程，許多民族志資料的記錄上把岩畫作為儀式產物的一部分；岩畫可以被用來理解象徵、巫術、藝術起源、文化邊界與演變等。

在中國，岩畫的分佈十分廣泛，如東北地區的大興安嶺岩畫、鞍山岩畫；西北地方的陰山岩畫、賀蘭山岩畫、阿勒泰岩畫；青藏高原的西藏岩畫、玉樹岩畫；西南地區的花山岩畫、滄源岩畫；中原及東部沿海的具茨山岩畫、將軍崖岩畫、仙字潭岩畫、寶鏡灣岩畫等；其中寶島臺灣的萬山岩畫是我國一處重要的岩畫遺址，對海峽兩岸岩畫的比較可以使我們知曉兩岸在史前社會文化的交流與互相影響。

## 一、臺灣萬山岩畫

臺灣萬山岩畫位於臺灣高雄市茂林區中央山脈的西側，濁口溪上游；海拔 900-1400 公尺；山中植被茂密、地形複雜；萬山岩畫所處的地理環

---

<sup>1</sup> Whitley, David S, *Introduction to Rock Art Research*, California: Left Coast Press, 2005, P1

<sup>2</sup> 來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方網站：<http://whc.unesco.org/>

境為始新世（Eocene）畢祿山層，岩性主要為砂岩。目前發現的萬山岩畫群共有四處，分別是：1978 年高業榮在萬山社部落魯凱族人的指引，首次發現一處岩畫點，根據所在地點的地名命名為“孤巴察峨”；1979 年發現“祖布裏裏”、1984 年高業榮和劉益昌發現“莎娜奇勒娥”；2002 年發現“大軋拉烏”。2008 年岩畫遺址考察時，又發現“祖布裏裏”一幅新岩畫點及“大軋拉烏”三幅新的岩畫，到目前為止，萬山岩畫共計 4 處岩畫點，14 幅岩畫圖像。2008 年 2 月 22 日萬山岩畫被指定為臺灣官方確定的第七處遺址。

### 1.1 孤巴察峨 Kopaca' e (TKM1)

孤巴察峨在原住民的語言中，意思為“有圖案的石頭”；主要岩畫圖像有人面像、蛇紋、渦旋紋等，多種不同的主題在同一塊巨大的岩石上；在魯凱族和排灣族中，渦旋紋被看作太陽的符號，象徵著宇宙中的靈力；人面像和凹穴象徵著生殖崇拜和巫術功能。在原著民的觀念中，人面像是百步蛇湖神（aididinga）的化身，孤巴察峨的整個畫面描述了魯凱族的祖先自湖池雲霧中誕生的古老創生神話。

### 1.2 祖布裏裏 Tubulili (TKM2)

祖布裏裏岩體呈現三層階梯狀，在橫向的平面上刻有足掌紋、凹穴，其中足掌紋有密集的点敲鑿組合而成，有的足掌紋上有一條或兩條斜線，並有圖形的疊加現象。整個畫面中紋樣的視覺導向為從左向右，臺灣本土的岩畫學者認為這是在描述部落遷徙時的方向和路徑。

### 1.3 莎娜奇勒娥 Sanaginaeh (TKM3)

莎娜奇勒娥岩畫點由兩塊砂岩構成，兩塊砂岩的裂縫之中有人為的石板疊砌；岩面上有凹穴和溝槽；在臺灣，凹穴具有“本源”的意象，是生殖崇拜的象徵，而在凹穴中穿插的抽象線條表示了部落的發展脈絡和繁衍。

### 1.4 大軋拉烏 Takalravoe (TKM4)

目前，在大軋拉烏岩畫點方圓 200 公尺的範圍內，已發現 10 處岩雕，是整個萬山岩雕群中數量最多且最密集的區域。大軋拉烏有人面像、人形、網格、渦旋紋、凹穴、同心圓、蛇紋；其中凹穴數量較多，在人面

或人形中，又有頭部呈菱形的人面像、蹲踞式人形、懷孕狀人形。由於受到雨季降水的影響和地勢的特點，大軋拉烏不適宜長時間的居住，故很難形成大型聚落；當地民俗學家認為此處為原著民間歇性停留的場所。

目前萬山岩畫附近主要生活著布農族、魯凱族、卑南族、排灣族。其中距離萬山岩畫最近的社群為魯凱族下三社群萬山舊社（Oponohu），該部落位於萬山岩畫西南三公里處，根據臺灣學者高業榮的描述，過去該社群的原住民如果為生活所需經過此地，在習俗上必須把岩畫上的落葉敗絮清掃乾淨，他們相信當晚的夢境辨識凶吉的徵兆。除了吃蛇女人的故事外，萬山社與岩畫並無儀式或文化上的直接關聯性。岩畫東側的內本鹿區域過去曾是萬山社的狩獵區，在岩畫點附近較為平緩的山林中，可以看到許多萬山社居民早年耕作遺留下的石板建築遺址。<sup>3</sup>

## 二、萬山岩畫中主要圖像類型與大陸岩畫之比較

萬山岩畫中圖像十分豐富，比較典型的圖像有人面像、凹穴、渦旋紋、蛇紋、方格紋等，這些圖像在大陸的岩畫中也有十分廣泛的分佈，基於海峽兩岸岩畫圖像在母題和風格上的相似性，就這幾類岩畫圖像進行闡釋說明和比較研究。

### 2.1 人面像

“人面像”岩畫是對具有類似面部特徵岩畫的統稱；目前在國內是岩畫界一種約定俗成的稱謂。此外，人面像在中文還有“獸面”、“鳥面”、“類人首”、“神格面具”、“人面紋”等等稱謂出現；在英文中有“mask”、“human face”、“Anthropoid Faces”、“eye-mask faces”、“eye/nose faces”等稱謂。義大利岩畫學者阿納蒂（Emmanuel Anati）多次來中國分別考察了將軍崖岩畫<sup>4</sup>、陰山、賀蘭山等涉及人面像的岩畫區，認為在中國人面像岩畫開始的時間大概類似於俄羅斯黑龍江流域人面像的年代，即距今五六千年。<sup>5</sup>在空間分佈上，人面岩畫通常分佈

<sup>3</sup> 高業榮 第49頁。

<sup>4</sup> 阿納蒂於2010年考察了將軍崖岩畫1-4組，尤以禾苗人面為主，雖當時第五組已發現，但山路崎嶇未安排考察。

<sup>5</sup> 陳兆複：《中國的人面像岩畫》，《尋根》，1994年第2期，第27頁。

在環太平洋沿岸。在時間上，人面像通常產生於新石器時代，往往沒有歐洲舊石器時代的洞穴岩畫那麼古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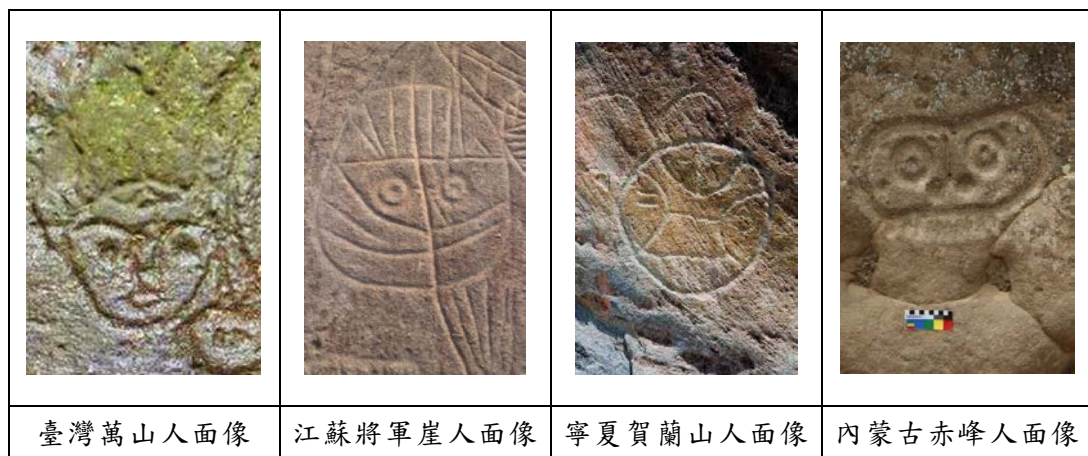


圖 1 人面像岩畫

中國岩畫學者陳兆複認為：“人面像岩刻最重要的特徵是：絕大多數並非描繪真實的人面，倒像是某種確定的面具。大部分人面像作品，有著驚人的簡潔，以及圖案化、抽象化的表現，每一個人面又都有著自己的性格，有著互相區別的特點和細節。換句話說，我們看到同一個題材卻有著無窮的多樣性。這些粗糙的石頭上所銘刻的印記，揭示出史前藝術的奇異而神秘的世界。”<sup>6</sup>之後，宋耀良先生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系統的調查了中國的人面岩畫，並對其分佈規律進行了總結、對其來源、意涵和意義進行了探討。宋耀良認為：“據近十多年來的考古發現，中國境內至少存有約十萬餘幅古代岩畫，可以分作若干的區域或系統。其中人面形岩畫是意涵最為深刻的一個系統，它分佈在中國北部和東部沿海總長為四千公里的帶狀區域中，構成了中國上古文化源頭的一個方面……觀全體岩畫又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人面形岩畫，又是最具有規範特性的，它變幻無窮，卻又萬變不離其宗，數以千百計的散佈在相距三、四千公里範圍內，卻嚴格地遵循著其內在的規定性，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極壯觀的史前奇跡。這只能用同一的文化或文化的同一性才能給予合理的解釋。”<sup>7</sup>宋耀

<sup>6</sup> 陳兆複：《中國的人面像岩畫》，《尋根》，1994年第2期，第25頁。

<sup>7</sup> 宋耀良：《人面形岩畫的圖像特徵與類型》，《學術月刊》，1993年第2期，第45頁。

良先生進一步在其著作《中國史前神格人面岩畫》一書中將中國的人面像岩畫分為東部、中部和北部分佈帶，並進一步推論分佈在北美洲太平洋西海岸的人面像岩畫是從中國東部傳播過去的。即：人面岩畫的源頭可能在連雲港將軍崖，並由此分別向南和向北傳播。向南傳播到福建仙字潭、臺灣萬山；向北傳播到內蒙古的西遼河流域，並由此向西到達陰山，在陰山形成第一個繁榮期，繼續向西到達賀蘭山，在賀蘭口形成第二個繁榮期，並最終消失在寧夏中衛縣的北山一帶。根據宋耀良的岩畫傳播假說，臺灣萬山岩畫起源於大陸的江蘇省連雲港市將軍崖岩畫，是將軍崖岩畫南傳的所致。目前這一假說僅是從風格類型上做出的判斷，尚缺少足夠的科學證據進行驗證。

## 2.2·凹穴、渦旋紋

凹穴，在國內又稱為“石穴”，英文稱為：“Cup and ring marks”、“cup marks”或“cupules”；所謂凹穴，多指刻鑿成半球狀，多發現于岩石的水準岩面上，偶見位於垂直或傾斜的岩面之上的岩畫。在尺寸上，凹穴岩畫直徑通常在 2cm-10cm 之間，深度在 0.5-2cm 之間<sup>8</sup>，偶爾也有尺寸較大的凹穴岩畫，其剖面大抵呈半球或鍋底狀。凹穴岩畫的空間分佈，也是全球性的，除了南極洲之外，各大洲均有發現，且數量巨大。<sup>9</sup>此外，凹穴圖形與溝槽（linear grooves）、方格紋組合出現的形式，也具有普遍性。凹穴通常被認為在更新世和全新世時期已經出現，在考古資料和民族志資料中有關凹穴的記錄並不常見，凹穴在世界範圍內普遍存在，且具有較長的歷史傳統且在部分地區一直延續至今，凹穴也是世界上目前現存數量最多的岩畫類型。貝納裏克認為凹穴、溝槽、圓環、多重同心圓、三叉線、之字線、波浪線、多重弧線的岩刻技術普遍存在於舊石器時代中期。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凹穴位於印度中央邦的首府博帕爾市東北方 45 公里處的貝特卡岩畫（Bhimbetka rock shelters）<sup>10</sup>，其中凹穴岩畫和溝

<sup>8</sup> Bednarik, R.G, *A short ethnography of cupules*, In: Querejazu Lewis, R., Bednarik, R.G. (Eds), *Mysterious Cup Mark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upule Conference*.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2073, Archaeopress, Oxford, 2010. pp. 109–114.

<sup>9</sup> Bednarik, R.G. *Cupules*. *Rock Art Research* 2008, 25(1), pp61–100.

<sup>10</sup> 貝特卡岩畫於 2003 年列為 UNESCO 世界遺產，貝特卡岩畫可分為五個岩畫點，共 400 多幅彩繪岩畫；這裏的文化序列從舊石器時代早期一直延續到中世紀的早期。

槽發現於舊石器時代早期的考古地層中。<sup>11</sup>


		
河南具茨山凹穴 (淺凹穴)	連雲港將軍崖凹穴 (杯狀穴)	臺灣萬山凹穴 (淺凹穴)
		
寧夏賀蘭山渦旋紋	萬山岩畫渦旋紋 (人面像與渦旋紋組合)	

圖 2 凹穴及渦旋紋岩畫

在中國，凹穴岩畫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和中部平原，且以河南最為集中，數量最多；此外，在遼寧鞍山、江蘇連雲港、臺灣萬山凹穴也相對集中。其中凹穴與人面像伴生的現象在將軍崖岩畫、仙字潭岩畫、萬山岩畫中均有出現。李洪甫認為這是少昊文化亦東夷文化逐漸南傳所致。但基於凹穴以及凹穴與人面像相伴生的現象在澳洲、美洲西海岸等較廣的全球時空尺度內皆有存在，這種組合不是偶然，其背後的文化意涵和製作目的還有待於進一步的探討和實證。

目前，關於凹穴的解釋已經有上百種，包括星象、血祭杯、聖水杯、性穴、太陽、月亮、氣候變化、道路、對於生死或戰爭的記錄。陳兆複認為“凹穴在古代的東方宗教中，特別是在古代及後來的印度宗教中，在祭

<sup>11</sup> 在 1969 年，Wakanakar 挖掘了禮堂岩石。最底層提供了阿舍利文化工具（手斧、劈刀、各種刮板、齒狀物、刀、凹位、薄片和刀片）。中間層生成了舊石器時代中期的石英砂石工具，頂層是細粒石英的中石器時代工具。

祀的雕像中，大都與崇拜母親——土地的多產有關，象徵整個生命的開始。奧德柯拉尼科娃在她的《西伯利亞和北美太平洋岩畫》中，曾介紹北美印第安人婦女將生孩子的时候，丈夫要上山刻制環形凹穴，以祈求生育順利。世界許多地方發現的凹穴岩畫，是作為生殖崇拜的符號存在的。而在日本和韓國發現的凹穴岩畫則被直接稱為‘性穴’”。張亞莎認為：

“新發現的鞍山東南部淺山區的大量凹穴岩畫，在凹穴岩畫主題集中出現且分佈密集、遺址地貌、製作手段等諸多方面，與河南具茨山、連雲港凹穴岩畫均有較高的相似性……上述幾個地區的凹穴岩畫是能夠找到一些共性的：一是這些岩畫遺址旁邊或附近通常也會出現舊石器時代或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二是岩畫遺址通常會與一些天然石棚相伴生；三是凹穴岩畫的排列方式中有成排排列，也有散漫排列，並均有相當數量的‘梅花’圖；四是凹穴以淺穴為主，但均有所謂‘杯狀穴’的存在。”<sup>12</sup>湯惠生在《玦、闕、凹穴以及蹄印岩》一文中，談及凹穴岩畫，認為是通天的象徵，鏈結凹穴的溝槽則是通天的通道，凹穴是中國古代薩滿文明中以“通天”為核心的信仰體系的遺存物。<sup>13</sup>

### 2.3 蛇紋、折線紋、方格紋等抽象圖形

關於蛇紋的民族學闡釋，萬山岩雕的孤巴察峨和祖布裏裏的來源有一個傳說：很久以前拉巴巫賴(Laba—U--Lai)祖先娶了異族的女子為妻；這個妻子趁拉巴巫賴外出時，引來了百步蛇，並煮熟食用；後來，這個女人吃蛇的惡行被拉巴巫賴知道並被趕出家門，她走到孤巴察峨和祖布裏裏岩雕處，等待丈夫回心轉意接她回家，等待中就用手指在岩面上作畫；最後等不到丈夫就只好沮喪的回娘家。在萬山岩畫周邊地域一直有蛇崇拜的習俗，在高山族、魯凱族、排灣族中都有以蛇為主題的民間美術作品遺留。有時候，折線紋我們也會認為是蛇紋的一種變形形式。關於折線紋在大陸浙江省仙居縣的西塘岩畫中較為典型，在臺灣萬山岩畫（TKM 4-1）南側坡面東半部右側也有類似的圖像。

<sup>12</sup> 顧玉順：《鞍山岩畫》，瀋陽：瀋陽出版社，2015年，第4頁(序言)。

<sup>13</sup> 湯惠生：《玦、闕、凹穴以及蹄印岩畫》，《民族藝術》，2011年第3期，第97-102頁。




		
浙江仙居折線紋岩畫	河南具茨山方格紋岩畫 (凹穴與方格紋組合)	浙江仙居西塘方格紋岩畫

圖 3 折線紋、方格紋岩畫

方格紋又稱為“棋盤”或“棋盤紋”，是存在比較廣泛的一種岩畫形式，通常，關於方格紋的闡釋，有“棋盤”、“河圖洛書”、“周易八卦”等觀點。在中國方格紋主要存在於北部草原地區、東部沿海地區（含中原岩畫）的岩刻中，在廣西等西南地區也有發現，但就目前所掌握的調查資料而言，西南地區的方格紋數量不多。方格紋以河南具茨山、方城最為集中，與凹穴相伴出現，或凹穴與溝槽相連形成方格紋；在浙江仙居也較為集中，其中筆者對送龍山的方格紋（方框）微腐蝕斷代的年代為距今 1300 年左右。方格紋有時候單獨出現，有時候和凹穴一起出現，這種和凹穴組合出現的形式在仙居、連雲港、具茨山、方城、內蒙和臺灣萬山均有發現，也是一種比較常見的組合形式。

萬山岩畫目前所發現的四個岩畫點，其岩畫的製作可能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如將軍崖岩畫從微腐蝕斷代的結果判斷，其製作過程持續了幾千年。此外，我們還要關注萬山岩畫中的圖像疊加和製作方式，從這個角度也可知曉其大致的年代，根據觀察萬山岩畫中凹穴為石器製作而成，較為古老；有些方格紋和蛇紋為金屬工具製作，年代相對晚近一些。萬年岩畫的確切年代尚需科技斷代進行進一步的實證。但在萬山岩畫中，人面像、人面像與凹穴的組合、凹穴與方格紋的組合、蛇紋、渦旋紋等與大陸岩畫之緊密關係是可以肯定的，至於彼此之間傳播或相互影響的年代還須考古學證據的支援和民族學資料的佐證。

### 三、從海峽兩岸岩畫之關係探討兩岸史前文化

臺灣海峽為西北東南向的淺海，最深處不過 100 米，過半地域深度僅 50 米。在更新世期間的冰河時代，水平面下降，冰層覆蓋，可以通行。從福建平潭島臺灣新竹 130 公里，距離是最短的。從福州到基隆港 280 公里，從廈門到高雄 310 公里。即使臺灣海峽已經形成，臺灣脫離大陸成為海島，在風侯和洋流有利的情況下，遠古人用竹筏、木筏或獨木舟跨越臺灣海峽是完全可行的。凌純聲在《臨海水土志》中，撰《古代閩越人與臺灣土著族》一文，從方位、氣候、地形、物產、習俗（幹蘭、崖藏、獵頭、鑿齒）等都說明海峽兩岸的臺灣和大陸自古就一脈相承。

關於兩岸史前之關聯，史學家方豪認為：在長濱文化未發現以前，日本學者金關丈夫、國分直一、鹿野忠雄等人，已於日本佔據末期，在臺灣所發現的史前遺物，證實它們和大陸文化有密切關係。鹿野忠雄曾就當時已發現的遺物，將臺灣先史時代的文化層，分為繩紋陶器文化層、網紋陶器文化層、黑陶文化層、有段石斧文化層、原東山文化層、巨石文化層和菲律賓文化層。鹿野忠雄認為繩紋陶器可以確定是從亞洲大陸直接傳入臺灣，而這是最底層的文化層。網紋陶器大約自華中傳入臺灣、黑陶文化屬於中國東海岸文化系統。有段石斧可能從福建傳來。原東山文化，鹿野氏僅指出它的輸入年代，約在紀元之前，而沒有說明來路。凌純聲先生認為亦自大陸東岸傳入。<sup>14</sup> “西元前 5000 年——西元前 3000 年間臺灣海峽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是南島語族祖先的富國墩、大坌坑文化。在西元前 3000 年左右，龍山形成期的文化影響很有利地波動到東南海岸，這個文化與漢藏語族可能是關係密切的。海峽西岸的富國墩、大坌坑文化被新的文化所取代，這種新的文化為考古學上的曇石山文化所代表。舊的南島文化在海峽東岸即臺灣西海岸繼續生存，但接受了龍山形成期強烈的文化影響而形成新的鳳鼻頭文化。”<sup>15</sup> 張光直認為：“臺灣中南部與澎湖的鳳鼻頭文化早期的陶器中的若干重要特質可能是由大坌坑文化原型進一步發展出來的，但鳳鼻頭文化的許多新穎的文化物質如稻作農業、農具和陶器形制中的鼎和豆，與大坌坑文化扯不上關係，卻與海峽西岸的馬家浜、崧澤、河

<sup>14</sup> 方豪 臺灣早期史綱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 年，第 13 頁。

<sup>15</sup> 張光直 中國考古學論文集 北京：三聯書店，2013 年 第 273 頁。

姆渡與曇石山文化有顯著的類似，可能是在後者影響之下而產生的。新文化在臺灣出現的年代與曇石山文化開始年代相近。”<sup>16</sup>鳳鼻頭文化，大約從西元前 2500 年——前 400 年，這一時期這裏的居民主要從事農業、漁獵以及貝類採集。張光直認為：鳳鼻頭遺址的兩個階段在年代學上與曇石山遺址的兩個階段相對應，它們亦共有若干的陶器器型，其陶器風格一致，靠近河口環境的生活方式亦相似。<sup>17</sup>

筆者認為在兩岸的岩畫研究中，尤為關注的是龍山文化南下輻射到臺灣對其造成的影響，以及鳳鼻頭文化與馬家浜、崧澤、河姆渡文化之間的關聯性，將軍崖岩畫第一組圖像中人面像的年代即為龍山文化時期，萬山岩畫中的人面像是否受其影響還有待於進一步的關注。但萬山岩畫中凹穴、人面像、方格紋、渦旋紋、凹穴與人面像、凹穴與方格紋的組合、與大陸岩畫在類型和風格上的相似及關聯性是無疑的，同時，萬山岩畫、將軍崖岩畫、仙字潭岩畫、賀蘭山的賀蘭口岩畫、周圍都發現了農耕遺址，其人面像及其內涵與農業文化具有很強的關聯性。同時，萬山岩畫中的渦旋紋、蛇紋、折線紋與大陸的東南沿海、東南亞、澳洲等南島語族地區具有很強的文化關聯。

## 結語

岩畫作為早期人類對世界觀和自我的表達，狩獵和食物採集表徵出了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武器、工具及其他器物表徵出了當時人的技術能力；一些表現神話和信仰的圖像根植於當時人的精神世界和對人、自然、超自然關係的認識。岩畫的研究會使我們對人類歷史的構建、特定族群文化的認知產生重要的影響，所以，對岩畫的“閱讀”是我們探知史前文化方方面面的一個通道，它承載著人類初期的歷史和記憶。臺灣萬山岩畫與大陸的諸多岩畫特別是大陸東南沿海的岩畫在類型和風格上有諸多相似；兩岸史前文化也有密切關聯，對海峽兩岸岩畫風格的比較研究以及年代、內涵的探索是未來岩畫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也是破解兩岸史前交流重要途徑。

<sup>16</sup> 張光直 中國考古學論文集 北京：三聯書店，2013 年 第 273 頁。

<sup>17</sup> 張光直 中國古代考古學 北京：三聯書店，2013 年，第 340 頁。

參考文獻：

- [1]. David S Whitley , Introduction to Rock Art Research ( Second Edition ) , Walnut Creek: Left Coast Press. 2011.
- [2]. Jean Clottes , Cave Art , London , London: Phaidon Press. 2010.
- [3]. 高業榮, 萬山岩雕, 臺灣: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2011 年.
- [4]. 許勝發、曾逸仁、徐明福、高業榮, 從周邊聚落發展推論臺灣萬山岩雕群可能的創作所屬族群。 2014 年. (學術交流, 未發表)

# 天命六年滿文變革考析

張華克

中國邊政協會常務監事

## 摘 要

明萬曆二十七年（己亥，1599）二月，清太祖努爾哈齊為因應情勢所需，決定創制本民族的文字。下令額爾德尼等人，仿照蒙古字母，書寫女真語言，而開創了滿文。草創時期的滿文，全由蒙古字母組成，沒有圈點，故稱之為「無圈點滿文」，或「老滿文」。這種文字，存在著不少缺點，使用上並不方便。據史書上記載，天聰六年（壬申，1632）皇太極頒佈命令，由達海承擔完成了改進「老滿文」的任務。經達海改進的滿文，因有圈點，故稱之為「有圈點滿文」，或「新滿文」。不過從研究《滿文原檔》上的原始資料顯示，早於達海改進滿文前的十一年，即天命六年（1621）時，一種可稱為「中古滿文」的有圈點滿文，其實就已經具體出現了，研發者依然還是額爾德尼。「中古滿文」所採用的拼字規則，與「新滿文」不盡相同，所開發出來的新元素，包含圈、點、豎等三項，卻因極具開創性，而為新滿文所全盤接受。由於額爾德尼、達海師徒二人，在天命七年（1622）正月十三日，都因案革職。導致這場「中古滿文」的改革運動，無法順利繼續下去。否則後來滿文發展的面貌，必然會有所不同。「中古滿文」雖因額爾德尼的失勢，導致半途而廢。但是有兩項功績，卻是無法磨滅的。一是開發出圈、點、豎這三種新元素，讓新滿文有能力脫離蒙文的羈絆。二是提供了概念，讓滿文的「特殊字」找到了改革的原則。

**關鍵字：**額爾德尼 圈點豎 中古滿文 達海 新滿文

## 壹、前言

明萬曆二十七年（己亥，1599）二月，清太祖努爾哈齊下令文臣額爾德尼和噶蓋，利用蒙古字母，書寫女真語言，開始創制了滿文，並定為國書，頒行傳布。<sup>1</sup>由於滿文承襲了蒙古字母的一些缺點，既不能完美表達所有的滿文語音語意，又有漢字漢音如何拚音的問題，於是到了後金天聰六年（壬申，1632）初，這種文字面臨了改革的壓力。史料記載，達海奉清太宗皇太極之命，在老滿文上增加圈點，並增設了十個特定字母，<sup>2</sup>讓字母更為充實完善，一舉解決了老滿文在過去應用中出現的各種語音語意問題，稱為新滿文，或有圈點滿文：

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努爾哈赤決定創制本民族的文字，命額爾德尼和噶蓋仿照蒙古文創制。初創時期的滿文，基本上仿照蒙古文字母而成，沒有圈點，故稱之為“無圈點滿文”，或“老滿文”。這種滿文，存在一定的缺點和不足，無論是學習，還是使用，都有所不便。故於“老滿文”使用 33 年後，即後金天聰六年(1632)初，努爾哈赤的繼承者皇太極頒佈命令，由達海承擔完成了改進“老滿文”的任務。經達海改進的滿文，因有圈點，稱之為“有圈點滿文”，或“新滿文”。<sup>3</sup>

所謂「後金天聰六年（壬申，1632）初」的這場文字變革，《東華錄》、《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等史冊裡，都能找到依據，時間點出現在當年三月：

三月，以國書十二字頭向無圈點，上下字雷同無別。命巴克什達海酌加圈點，以分析之。<sup>4</sup>

《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則記得更為詳細，時間點確定是天聰六年

<sup>1</sup> 蔣良騏撰，林樹惠，傅貴九校點，《東華錄》，（北京市：中華書局，1980，第 1 版），頁 4。

<sup>2</sup> 于鵬翔，〈論從老滿文到新滿文的演變〉，《松遼學刊(社會科學版)》，（四平市：[松遼學刊(社會科學版)編輯部]，1988 第 3 期），頁 34。

<sup>3</sup> 吳元豐，〈《滿文老檔》芻議〉，《清史研究》，（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2011 年 2 月 第 1 期），頁 138。

<sup>4</sup> 蔣良騏撰，林樹惠，傅貴九校點，《東華錄》，（北京市：中華書局，1980，第 1 版），頁 33。

（1632）三月初一（戊戌），理由則是皇太極認為，沒有圈點標記的滿文，「尋常語言，視其文義」，還容易通曉。但是遇到「人名、地名，必致錯誤」，因此需要「酌加圈點」：

是日，上諭巴克什·達海曰：國書十二頭字，向無圈點，上下字雷同無別。幼學習之，遇書中尋常語言，視其文義，易於通曉。若至人名、地名，必致錯誤。爾可酌加圈點以分析之，則音義明曉，於字學更有裨益矣。<sup>5</sup>

不過《滿文原檔》的〈洪字檔〉中一頁木刻版印刷文字，卻打破了這些原本排列的時間順序。因為乾隆時期重抄的《內閣藏本滿文老檔》，將這一頁木刻版印刷文字，放在天聰六年（壬申，1632）春正月十七日，<sup>6</sup>比原來漢文本《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所記錄的時間，足足提早了一個多月。

以下是《滿文原檔》的原始紀錄，及《內閣藏本滿文老檔》重抄過的滿文及翻譯。滿文文字部分，乾隆重抄時並未更改，<sup>7</sup>二者完全相同：

juwan juwe uju, dade tongki fuka akū, dergi fejergi hergen  
ilgan akū, ta da, te de, ja je, ya ye fakcan akū, gemu emu adali ofi,  
bai gisun hese bithe ohode, mudan ici be tuwame uthai ulhimbi, ja,  
niyalmai gebu, ba na i gebu ohode, tašarame ojarahū ofi, aisin gurun  
i sure han i ningguci aniya niyengniyeri ujui biya de, han i hesei,  
dahai baksi tongki fuka sindame temgetulehe, da uju be inu uthai fe  
kemuni uju de arahabi, amaga mergese tuwafi, ilgahangge tumen de  
emu niyececun bici wajiha, murishūn waka oci, fe uju getuken bi,  
○ tere inenggi juwan juwe uju arafi wasimbuha.<sup>8</sup>

<sup>5</sup> 華文書局輯，《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臺北市：華文：華聯書局，民53[1964]），卷十一，頁18-19。

<sup>6</sup> 吳元豐主編，《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瀋陽市：遼寧民族，2009，第1版），頁5780。

<sup>7</sup> 吳元豐主編，《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瀋陽市：遼寧民族，2009，第1版），頁5790-5792。

<sup>8</sup>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94-95[2005-2006]，初版），冊五，頁139-140。

十二字頭，原無圈點，上下字無別，塔達、特德、扎哲、雅葉等，雷同不分。書中尋常語言，視其文義，易於通曉。至於人名、地名，必致錯誤。是以金國天聰六年春正月，達海巴克什奉汗命加圈點，以分晰之，將原字頭，即照舊書於前。使後世智者觀之，所分晰者，有補於萬一則已。倘有謬誤，舊字頭正之。○是日，繕寫十二字頭頒佈之。<sup>9</sup>

由於木刻版印刷的文字，已是完全的新滿文，只有「汗 han」一字，未加圈、點，這種筆法，接近天聰九年（1635）五月的檔子。<sup>10</sup>

因此老滿文專家李學智斷言，天聰六年（1632）三月初一（戊戌）皇太極所說的「上諭」，基本上「完全是偽造的」。<sup>11</sup>

對這個時間點存疑的，還有學者關克笑。關克笑認為天聰六年春正月，清太宗皇太極命達海改革老滿文，至「是日」，即該月十七日，頒布通行使用。短短十七天之中，一是要要在某些字母旁加圈、點，使「多音一字」的情況不再發生。二是規範字體，即一個字母只有一種寫法，消除「一字多寫」的毛病。三是制定特殊字母，解決拼寫外來借詞的需要；第四是創制滿文字的連寫切音形式，以解決漢字人名、地名等的音譯。達海在公務繁忙的情況下，完全憑著自己的探索，要在半月之內完成上述老滿文改革的工作，達海雖「生而聰穎，九歲即通滿漢文」也難以勝此重任了。<sup>12</sup>

以上推論，言之成理。不過關克笑雖推翻了天聰六年春正月說，卻認為達海改革老滿文應是始於天命八年（1623），理由是老滿文的創制者額爾德尼於天命八年五月處斬。於是改革老滿文之事便「自然而然地落在達海手中，達海又可算是閉門思過，戴罪圖功」，這種推論方式，似乎有些

<sup>9</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年，第1版），頁1196-1197。

<sup>10</sup>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60[1971]），附錄（一），頁27。

<sup>11</sup>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60[1971]），附錄（一），頁26。

<sup>12</sup> 關克笑，〈老滿文改革時間考〉，《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究編輯部]，1997年02期），頁13。

輕忽，因為證據不大充足：

老滿文的創制者額爾德尼理應是改革老滿文的第一最佳人選，因為老滿文是其一手所草創，其使用老滿文的時間又最久，故而對老滿文瞭解的最徹底，可謂瞭若指掌，對老滿文的諳熟無出其前者。然天命七年因受賄罪被革去副將之職，“貶為庶人，其所管牛泉，賜與蒙噶圖”。第二年即天命八年五月被處死。於是改革老滿文的重任便落到了達海肩上。達海雖曾一度受到努爾哈齊重用，“置內廷機密重地，專司文翰”，但從天命五年因與內廷侍女通姦幾被處死，天命七年又與額爾德尼同坐受賄罪而被革職受刑之後，顯然倍受冷落，天命七年之後達海之名不見史籍便是證明。此時努爾哈齊要改進老滿文以適應社會發展對文字的需要，而最適於這項工作的額爾德尼又在其一怒之下殺之，偏偏達海又獲罪不再如前倍受信任，於是改革老滿文之事便自然而然地落在達海手中，達海又可算是閉門思過，戴罪圖功吧。綜上淺析，達海改革老滿文應是始於天命八年(1623)，而絕非天聰三年或六年。如前所述，老滿文的改革決非輕而易舉、一蹴而就之事，是達海經過冥思苦想、絞盡腦汁、多方的探索之後才最終完成的，故用時五六年的時間，至天聰三年新滿文才正式用於記事。<sup>13</sup>

此外關克笑所說的結論：「天聰三年新滿文才正式用於記事」，同樣也是無法證實。因為天聰三年（1629）《滿文原檔》有著完整的紀錄，是否使用了新滿文正式記事，一查便知，不須任何虛飾：

第二十四冊原編成字，故宮編第二十四冊。係清太宗天聰三年(己巳)正月至六月，四年(庚午)七月至十一月，五年(辛未)正月、二月及閏十一月，與明朝所送書信檔。內編二十六號，共計四十八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五九公分，橫四二.二公分。第二十五冊原編陽字，故宮編第二十九

<sup>13</sup> 關克笑，〈老滿文改革時間考〉，《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究編輯部]，1997年02期），頁17。

冊。清太宗天聰三年(己巳)正月、二月及閏四月記事檔。內編三號，共計四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三六.一五公分，橫二四.〇五公分。第二十六冊原編秋字，故宮編第三十七冊。自清太宗天聰三年(己巳)十月起，至同年十二月止。內編四十四號，共計八十五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四二公分，橫二八.九公分。<sup>14</sup>

〈成字檔〉、〈陽字檔〉、〈秋字檔〉等三份原編檔案，是《滿文原檔》內有關天聰三年(1629)的滿文正式紀錄，根據老滿文專家李學智所述，記事均為「無圈點老滿文」，並未採用新滿文。

因此關克笑所說的推論：「天聰三年新滿文才正式用於記事」，也是無法採信的。

## 貳、圈點豎

按照以上的一些論證，新滿文的改革時間，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事情似乎錯綜複雜，撲朔迷離，根本很難辨別清楚了。

不過這都是因為二手傳播形成的迷霧所造成的。大家如果在這個問題上，輕信《東華錄》、《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等二手資料，那麼謎團永遠難解。

要想處理這類問題，從原始的資料中尋覓答案，或許會比聽信一般的泛泛之言，容易得到答案。尤其要是能掌握到核心關鍵，就更能事半功倍。

而新滿文產生的關鍵，其實就在於圈點，否則不用稱其為「有圈點滿文」。因此找到圈點出現的時間，或許就是新滿文開創的起始。但是這麼說，又有一點過於空泛。因為所謂的圈點，根本就是滿文與生俱來的產品，並無須要外求。

例如萬曆四十年(壬子，1612)〈滅烏拉部〉的記事，文字一開頭就有一個大圈「○」，前三次提到「布占泰 bujantai,,」時，都打了雙點「,,」。可見當時對圈點的應用，非常熟練：

<sup>14</sup>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 60[1971])，附錄(一)，頁 15。

○ dain de bahafi jafafi wara beye be ujihe bujantai,, ilan jui be buhe ilan jergi hojihon bujantai,, nadan jergi gashūha bujantai,, gūwaliyafi ujihe ama sure han i harangga hūrhai gurun be juwe jergi sucufi gamaha,, jai ujihe ama sure kundulen han i yabufi ulha jafan buhe yehei bujai beilei jui be bujantai durime gaimbi seme gisurehe,<sup>15</sup>

○ 昔布占泰為我陣獲，既赦其死，予以收養之妻以女三，三為我婿，七與我盟。然布占泰竟負盟約，二次來侵養父聰睿（恭敬）汗所屬呼爾哈國。又揚言奪娶養父聰睿恭敬汗以牲畜行聘葉赫貝勒布寨之女。<sup>16</sup>

這時可是明萬曆四十年（壬子，1612），距離發明滿文的明萬曆二十七年（己亥，1599）才十三年，使用的是老滿文，但是在書寫的基本構造裡，卻並不缺少圈點。可見滿文從早期開始記事時，對於圈點的應用，就不陌生。如果後來開發新滿文，繼續採用圈點這種素材，來加以變化與改良文字，可說並不令人意外。

面對原始資料，就需要痛下功夫，細密爬梳，不能坐享其成，或是半途而廢。以往有許多例子，就是由於大而化之，而讓機會失之交臂的：

最足以證明用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檔冊，確為最原始的真正原檔的理由，要為各冊原檔上原有紀錄人的被發見。因為從前介紹原檔的幾位先生，如謝國楨、張玉全、李德啟、方甦生等，均未加以細檢，故均略而未談。僅謝國楨氏在清開國史料考一書中曾說：「滿文老檔（即原檔）三十一冊，著者不詳。」實際上著者並非不能詳，祇是謝氏不知與未詳檢罷了。<sup>17</sup>

《滿文原檔》裡面，有當時所記錄的第一手資料，真實程度超乎想

<sup>15</sup>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二，頁 161-162。

<sup>16</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12。

<sup>17</sup>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 60[1971]），附錄（一），頁 41-42。

像。從原檔各紀錄人的署名看來，包括：庫爾纏巴克什（kurcan baksi）、尼堪巴克什（nikan baksi）、達海都司（dahai duse）、張覺巴克什（janggio baksi）、愛巴里巴克什（aibari baksi）、準拓巴克什（jontoi baksi）、希福（hifu）、占住（janju）、苗錫渾（miosihun）、兩紅旗的尼堪，布爾善（juwe fulgiyan i nikan bursan）等，不但可以確證用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檔冊，為原始的紀錄檔冊；進而尚可看出原檔紀錄的確切時間，即事情發生與檔冊紀錄，僅僅相隔數日而已。因此《滿文原檔》裡的滿文，可以當作最直接的史料，加以研究：

茲根據原檔所載，舉例於後。（附圖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蓋原檔撰寫者很多，原圖片無法全部印出，故僅附原檔照片三張，以資徵信。茲併將各撰者姓名用羅馬音註明如下：附圖四十五第一行：滿文曰：kurcan baksi 庫爾纏巴克什 nikan baksi 尼堪巴克什 ejehe dangse 記錄的檔子。附圖四十六第一行，滿文曰：jawan biyade, dahai duse ejeme gaiha dangse, 於十月，達海都司記錄的檔子。附圖四十七第一行，滿文曰：janggio baksi, aibari baksi ejehe dangse,, 張覺巴克什，愛巴里巴克什記錄的檔子。他如：張字原檔第四百頁第一行，滿文曰：juwe biyade, jontoi baksi ejehe,, 於二月，準拓巴克什記錄。又張字原檔第六十五頁第一行，滿文曰：hifu,, janju,, ejehe dangse,, 希福、占住記錄的檔子。又列字原檔第三十八頁第一行，滿文曰：miosihun ejehe biyai dangse 苗錫渾記錄的一月檔子。又列字原檔第一百八十二頁第一行，滿文曰：sunja biyade juwe fulgiyan i nikan bursan i ejehe dangse,, 由上舉原檔各紀錄人的署名看來，不但可以確證用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檔冊，為原始的紀錄檔冊；進而尚可看出原檔紀錄的確切時間。如上引附圖四十六所記：「於十月達海都司記錄的檔子」。此一段史事，是記載天命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的事情，而達海是在十月裏紀錄的。事情之發生與檔冊之紀錄，僅僅相隔數日；於此，當知其真實的程度了。<sup>18</sup>

<sup>18</sup>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老滿

學者李學智指出，這類珍貴資料，以往學者如謝國楨、張玉全、李德啟、方甦生等，大多輕忽掠過，並未正視，以致錯失解謎良機。

對於新滿文的出現，李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採取實證主義，依靠證據來說話。認為滿文的增加圈點，並不是像《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上所說，由清太宗由上而下，發號施令，達成改革。而是由文臣在工作實踐中，逐步取得經驗，一步步達到目標。甚至當初的發明，跟後來的成果，根本上並不一致。

滿文之增加圈點，並非如清太宗實錄所說，清太宗為神為聖，一夕之間即將無圈點的老滿文，施上了圈點。要知道無論何種文字的創造與改進，均是循序漸進的，其必係從日常應用老滿文所發生的困難中，慢慢加以改進者，所以現存的原檔與老檔，有最早的蒙古字形滿文，亦有偶加圈點的老滿文，但是這種偶然間所加的圈點，與後日通行的滿文圈點，並不相同。<sup>19</sup>

李學智的研究結論，認為新滿文是來自於「偶加圈點」。這就與一般人對新滿文的認識，相差甚遠了。

一般大眾的理解經常是，滿文的改革，是從上到下的，是清太宗一聲令下，滿文要增加圈點，然後由達海製作十二字頭字母表，全國一體遵行。

而李則從實際案例中看出，滿文的變革，是一條曲線，是由下而上，幾經波折，最後才能帶動風潮，而達成一致的共識的。所以「這種偶然間所加的圈點，與後日通行的滿文圈點，並不相同。」

也就是說，圈點的加入，與現代人所了解的新滿文規律，不大一樣。因此他以老滿文的「韓」han 字為例，說明改革的發展途徑：

如（附圖二十三）的張字原檔第一百五十八號，最後一行起首的二字，原為漢人名曰「韓參將」；但是老滿文的「韓」

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 60[1971]），附錄（一），頁 41-42。

<sup>19</sup>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 60[1971]），附錄（一），頁 27-28。

han 字，已在右旁加上了一個圓圈。此字的寫法在新滿文中應讀「汗」han，亦即是滿人尊稱清太祖或其他國君的專用名詞。可是在書寫此段史事時（清太祖天命六年，明天啟元年，西元一六二一），老滿文的「汗」han 字，與漢姓之「韓」han，書寫上並無分別。在此種情形下，恐怕是很自然的，書房中的巴克什要區別「汗」與「韓」二字，惟有在二字之中設法加一記號，以區別何者為「汗」，而何者為「韓」，但是滿人之稱「汗」，原為一種最尊貴的稱謂，或因對「汗」字不敢任意改動，而且在當時老滿文原檔中，用「汗」字的機會太多，而用漢姓「韓」字的地方又較少些，所以在用漢人姓氏的「韓」字時，而將此「韓」han 字加上一個圓圈的記號，以便區別「汗」與「韓」字的不同。這恐怕是很自然的發展。<sup>20</sup>

也就是說，當初為了區別何者為「汗」，而何者為「韓」，文臣其實是先「韓」字旁邊加圈，而不是像後來的新滿文，在「汗」字右邊加圈，「韓」字右邊加圈、左邊加點。

李學智所說的這段文字，《滿文原檔》紀錄於清太祖天命六年（1621）七月二十日項下，現摘錄其文字如次：

orin de ice hecen i iogi joo ihoo boolanjime nikan i mao iogi  
liodunci burlame tucike han\* sanjan, wang sanjan be gaifi, burlame  
genehe ilan minggan cooha mederi be jihai jifi, orin i dobori jen  
giyang hecen be kara jakade, jen giyang i cen junggin hecen i ejen  
iogit tung yang yuwan i ama jui be jafafi bufi dahaha,<sup>21</sup>

二十日，新城遊擊趙義和來報：“明毛遊擊率自遼東逃出之韓\*參將、王參將及其敗兵三千，於二十日夜乘舟渡海來圍鎮江城。鎮江城陳中軍執獻城主遊擊佟養元父子以降。…”<sup>22</sup>

<sup>20</sup>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 60[1971]），附錄（一），頁 27-28。（附圖二十三）原文誤排為（附圖三十三）。

<sup>21</sup>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二，頁 161-162。

<sup>22</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

這裡的「韓\*han\*」，在清太祖天命六年（1621）時期，很特別的在「韓\*han\*」字右邊加圈，以與右邊不加圈的「汗 han」字加以區分。因此「圈\*」的用法，在當時並沒有新滿文「圈\*」代表字母發音「h\*」的含意。<sup>23</sup>只是做一點區別，表示這個字不是國王「汗 han」而已。

後來清太宗天聰年間，新滿文的發展對「圈\*」的用法，產生了新的定義。「圈\*」開始用以表示字母「h\*」的發音，於是漢姓之「韓」han字加圈，國王的「汗」han字也要加圈，大家都有了「圈\*」。因為按照新滿文的規範，要標示「h」音的，就得加圈，不許省略，於是「韓」、「汗」二者又不易區分了。

當時的文書人員為了克服這種新困境，想到的方法是另以左邊加點來標示漢姓的「韓」han字，以免混淆。現以「·han\*」來表示「韓」字。以下是兩段不同時期的對照本，可以看出其中的時代差異。

第一段是天命十年（1625）元月初二《滿文原檔》上摘出的檔案，其中「汗 han」、「韓潤 han yūn」、「韓義 han i」有三個「han」字接連出現，發音相同，甚易混淆。解決的方法，就是在漢姓的「韓」han字右邊加圈，而國王的「汗」han字旁不加圈，讓人易於分辨，現以「\*」來代表「圈」，書寫如下：

han donjifi, baime jihe jilakan seme, han\* yūn be iogi obuha,  
eshen i jui deo han\* i be beiguwan obuha, niyalmai baitalara ai ai  
jaka jalukiyame buhe,<sup>24</sup>

汗 聞之，憫其來歸，著 韓\*潤為遊擊，其堂弟 韓\*義為備  
禦，給足所用之諸物。<sup>25</sup>

第二段是後來乾隆四十三年（1778）重抄的《內閣藏本滿文老檔》。

中華書局，1990年，第1版），頁1196-1197。

<sup>23</sup> 例如（k、g、h）漢字注音為（ka 卡、ga 嘎、ha 哈）。h與哈可以相對應，新滿文h是有「圈\*」的。而有「圈\*」的還包含其他元音組合，如：he、hi、ho、hu、hū等，都帶有「圈\*」。

<sup>24</sup>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247。天命十年（1625）元月初二。

<sup>25</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年，第1版），頁620。

由於早期的規則不再適用，這時「韓」、「汗」二字右邊都需要加圈，「韓」字為了凸顯不同，則在左邊添加一個點，現以「·」來表示這個「點」，「韓」字可記為「·han\*」，以下文字可看出其中明顯有所不同：

han\* donjifi, baime jihe jilakan seme, ·han\* yūn be iogi  
obuha, eshen i jui deo ·han\* i be beiguwan obuha, niyalmai  
baitalara ai ai jaka jalukiyame buhe,<sup>26</sup>

汗\*聞之，憫其來歸，著·韓\*潤為遊擊，其堂弟·韓\*義為  
備禦，給足所用之諸物。<sup>27</sup>

以上是天命年間，滿文書寫漢姓的「韓」han 字，與國王的「汗」han 字，要如何加圈，來區分彼此字義不同的方法。可知清太祖天命六年（1621）到天命十年（1625）之間，加圈新滿文的規則，已經形成慣例，只是形式簡古，不易為人注意而已。

與此類似的加圈做法，也出現在早期新滿文的「f」字母之中。早期新滿文的「f」是以「b」字母右邊加圈來表達的，還一直沿用到天聰年間。這與後來成熟的新滿文寫法，並不相同。<sup>28</sup>

由於加圈的作用，初期僅在於區分字義、字母。所以從「韓」字、「f」字右邊加圈區分彼此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早在清太祖天命六年（1621）的時候，滿文加圈的實例就已經紛紛出現了。

由此可以看出，學者關克笑所推論的，老滿文的創制者額爾德尼於天命八年五月處斬，而改革老滿文的重任就落在達海手中，因此他認定老滿文的改革應是始於天命八年（1623）。這種推測，顯然有其不足之處。不過學界呼應關克笑先生的，也還不乏其人：

筆者認為，關克笑先生的“天命年間說”是正確的。這是  
關於老滿文改革初始時間問題研究上的最新成果，是一個更重

<sup>26</sup> 吳元豐主編，《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瀋陽市：遼寧民族，2009，第1版），頁2929。天命十年（1625）元月初二。

<sup>27</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年，第1版），頁620。

<sup>28</sup> 張華克，〈從清初滿文創制談起〉，《中國邊政》，（臺北市：中國邊政雜誌社，民106[2017]6月，210期），頁127。

大的突破。但是，關於老滿文改革究竟是在天命哪一年，史籍沒有明確記載，不得而知，只能加以推定。關克笑先生認為應當是天命八年至十一年間。理由是，原本可以充當改革者的額爾德尼已於天命八年五月被處死了，而精通滿漢文義的達海天命七年被革職後正居家閉門思過，因而完全有可能集中精力專事老滿文改革之事。<sup>29</sup>

從上引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張虹的論述，有其盲點。問題在於「滿文改革究竟是在天命哪一年，史籍沒有明確記載」，她就採信了關先生的推論。其實，史籍沒有明確記載的事情很多，只要有足夠的史料存在，還是可以從許多徵象中，找出正確的時間點，而不必隨意聽信。

上面藉著學者李學智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新滿文加圈規則的歷程，起於天命六年（1621）間。不過李所未提到的，則是新滿文加點規則的形成部分，這部分的謎團，史籍同樣沒有明確的記載。不過從《滿文原檔》精細的圖像版面之中，要找出這些小點，似乎並不如想像中的困難。

經過一番搜尋，發現新滿文所加的有文字意義的「點」，也是在天命六年（1621）間出現。雖然當時這個「點」所呈現的文字涵義，與現今新滿文並不全然相同，但是其時代意義卻是不容忽視的，應該就是現今新滿文的前身，以下就詳細說明如下。

第一段是一份曉諭眾漢人的降書，時間在天命六年（1621）十一月二十七日項下出現。這份檔案中的最後一句「因地制宜 ba tuwame」可記為「因地·制宜 ba· tuwame」，其中「地」滿文譯為「ba」。

如果按照天命六年（1621）一般書寫老滿文的習慣，這個「地」ba 並不需要打「點·」做記號為「地·」，就可以過關。因為這是由於老滿文的彈性大，一字多音，這個「ba」既可以唸做「ba」，意思是「地」，也可以唸做「be」，意思是「把」或「我們」。不過這裡打「點·」做記號後，就限制他的念法，固定為「ba·地·」，而不做他想：

○ nikasa de wasimbuha bithe, orin niyalma de emu niyalma

<sup>29</sup> 張虹，〈老滿文改革的初始時間〉，《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究編輯部]，2006年02期），頁30-31。

be cooha ilibumbi, cooha iliha niyalma han i hecen de tembi, aika baita oci terebe takūrambi, gūwa be takūraci ulin gaime ojarahū, suwe orin haha de emu cooha ilire niyalma be tucibufi benju, tanggū de emu bejang ilire niyalma be tucibufi tuwabunju, ba · tuwame sindambi.<sup>30</sup>

○降書諭眾漢人曰：“著二十人抽一人從軍。其從軍之人駐於汗城，有事即差遣之。倘差派他人，恐索取財物。著爾等於二十丁內選一從軍之人送來。百人中選百長一人，前來引見，以因地·制宜，酌情委任。”<sup>31</sup>

這種打「點·」做記號的用法，與天聰年間的新滿文寫法並不盡然相同。因為「ba」右邊加上一個「點·」，天聰新滿文唸做「be」，意思是「把」或「我們」，並沒有「地」的意思。所以「ba」在右邊加上「點·」又有「地」的意思，僅存於天命年間，是新滿文開發初期的特殊現象，現代學滿文的人可能看不懂其中奧妙。

與此呼應的案例，在天命六年（1621）六月初二，也就是更早的半年前，即已經出現了。不過這裡的「ba」右邊加上一個「點·」，意思是姓氏的「巴」，在此將其羅馬拼音記為「ba·」，翻譯為「巴·」，其檔案文字列示如下：

○ ice juwe de, hūwang ni wai fui ejen, ba · iogi de enggemu hadala tohohoi emu sain morin buhe, tereci erinhe erinde hecen dosika.<sup>32</sup>

○ 初二日，賜黃泥窪主將 巴·遊擊備鞍良馬一匹，自此於已刻入城。<sup>33</sup>

<sup>30</sup>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二，頁 279-280。天命六年（1621）十一月二十七日項下。

<sup>31</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266。「以因·地制宜，酌情委任」原文為「以酌情委任」，此係配合翻譯，而略有增添。

<sup>32</sup>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二，頁 117。天命六年（1621）六月初二。

<sup>33</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

以上兩個案例中的「ba·」，之所以要加上「點·」，以表示其不同於一般。分析其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要避免讀者誤會其為主語的「be 我們」。

因為以上兩個「ba·」的前方，都有一個逗點，表示前面句子已經結束或中止，致使這兩個「ba·」字，都落入了句子開頭的位置，而句子開頭的字詞主語化的傾向增強，閱讀者可能不自覺的將「ba」念作「be 我們」，而錯失原意。

於是擔任檔案記錄工作的巴克什，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開始以圈點來區分必要的字詞。

「韓」、「汗」二字右邊以加「圈\*」或不加「圈\*」來區分，剩下的「點·」，就用以區分「ba」與「be」。其採用的理念，完全相同。

所謂的理念，就是要符合經濟原則。例如「韓」、「汗」加「圈\*」或不加「圈\*」的處理方式，是經過比較的。

「汗 han」經常出現，就不必加「圈\*」，而「韓」偶爾使用，就加「圈\*」標示，這種作法，相當合理，且符合經濟原則。

「ba」與「be」之間，因為「be」是經常出現的，所以不必加「點·」。而「ba」偶爾才使用，就加上一個「點·」。這種標示法，同樣符合經濟的要求。

經濟原則的影響力，甚至延伸到新滿文逐漸興盛的年代。天聰三年（1629）與天聰七年（1633）之間，轉錄〈冬字檔〉的時候。在〈冬字檔〉頁 385 中可以發現，像是 ulgiyan、ice、tabunang、han、yamun、susai 等六個字，在整份檔案中，都顯然沒有施加圈點的意願。因其容易區分，沒有誤解為其他字詞的可能，以致似乎故意不加圈點，這就是受到「經濟原則」波及的證據：

第二種則是故意不加。像是 ulgiyan、ice、tabunang、han、yamun、susai 等六個字，在〈冬字檔〉全部檔案中，都顯然沒有施加圈點的意願。其理由當為容易區分，沒有誤解為其他字的可能，以致不予施加圈點。<sup>34</sup>

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208。

<sup>34</sup> 張華克，〈〈冬字檔〉滿文解析〉，《中國邊政》，（臺北市：中國邊政雜誌社，

不過聰明的巴克什很快就發現，如此只根據「經濟原則」使用「圈\*」、「點·」，實在是一種浪費。因為老滿文待解決的問題，不僅只是「韓」、「汗」、「ba」、「be」而已。老滿文分不清楚的語音，大致上有(k、g、h)、(a、e)、(o、u)、(t、d)、(k'、g'、h')等，其實都可以藉著「圈\*」、「點·」，來劃分清楚。

(k、g、h) 漢字注音為(卡、嘎、哈)、(a、e) 漢字注音為(阿、額(陰平))、(o、u) 漢字注音為(奧、烏)、(t、d) 漢字注音為(塔、達)、(k'、g'、h') 漢字注音為(卡、嘎、哈)等，其中輔音字的漢字注音，均是以該輔音字與元音 a 相拚合而成。<sup>35</sup>

於是天命年間的「韓」、「汗」、「ba」、「be」系統，到了天聰年間，很快就改為(卡、嘎、哈)、(阿、額)系統。很多人了解新滿文，也有人知道老滿文，但是對於「韓」、「汗」、「ba」、「be」系統，以往無人介紹，也沒有別的名稱，因此很難形容。<sup>36</sup>現姑且命名為「中古滿文」，以便稱呼及定義。

「中古滿文」在經過天命年間的一場風波之後，似乎就偃旗息鼓，被人拋諸腦後了。天命七年(1622)正月十三日，滿文創造者額爾德尼因受賄罪被抄家，革去副將之職，貶為庶人。這次事件連帶讓工作同仁達海巴克什也受到殃及：

汗曰：“漢官之饋，少受尚可。所受過多也。”故將額爾德尼巴克什治罪，還給奴僕六對，馬七匹、牛三頭。其餘人、馬、牛皆沒收之，賞給阿巴泰阿哥。革額爾德尼副將之職，貶為庶人，其所管牛泉，賜與蒙噶圖。至於達海巴克什，箭刺其耳鼻，革其遊擊之職。<sup>37</sup>

第二年即天命八年(1623)五月，額爾德尼又因私藏金珠的事發，被

民 106[2017]9 月，211 期），頁 129-130。

<sup>35</sup> 愛新覺羅·烏拉熙春，《滿語語法》，（呼和浩特市：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第一版），滿文字母表，頁 1-3。

<sup>36</sup> 台灣對於半新不舊、可以買賣的汽車，稱為「中古汽車」，因此對於介於新舊之間的「韓」、「汗」、「ba」、「be」系統，或可稱為「中古滿文」。

<sup>37</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299。

判處了死刑，留下了歷史汙名。<sup>38</sup>這使得文字改革工作，再也無法持續進行，「中古滿文」似乎也隨著額爾德尼的過世，而淹沒不彰。

不過凡走過，必留下痕跡。除了前面提到的「經濟原則」，在天聰三年（1629）與天聰七年（1633）之間，轉錄〈冬字檔〉的時候，發揮作用。還有滿文的「特殊字」*g' |* 加一「豎 |」的來源，竟然也還是出現於天命六年（1621）。

天命六年（1621）十月初一，有一份〈來字檔〉紀錄說到了「海州、蓋州」，這兩州的滿文發音，在老滿文上，是一模一樣的，為了區分，滿文的「特殊字」就用上場了：

juwan biya ice inenggi, nikan i hafasade wasimbuha gisun,  
ishun aniya coohai niyalma jetere jeku, morin de ulebure orho liyo,  
tarire usin gaimbi, liyodun i sunja ūi niyalma ejen aka usin be  
tebume orin tumen inenggi,, haiju *g' |* aiju fūju, ginju duin ūi  
niyalmade, ineku ejen akū usinbe tebume juwan tumen inenggi  
usinbe tucibufi buu,,<sup>39</sup>

十月初一日，降諭眾漢官曰：“明年徵收軍人食糧，飼馬草料及耕種之田地。遼東五衛之民，可耕種無主田二十萬垧，又從該無主田內撥出十萬垧，給海州、蓋 | 州、復州、金州四衛之民耕種。”<sup>40</sup>

「蓋州 *g' aiju*」的「豎 |」，以羅馬拼音表示並不容易，這裡拼音寫成「*g' |*」，有些奇怪。因為額爾德尼把這一「豎 |」，加到字母上去了，以便跟海州的「海 *ha*」字，有所區別。

不過這也開始形成了慣例，後來（擦 *ts'*、滋 *dz*）等滿文的「特殊字」，那一「豎 |」都加到字母上去，並無例外。

<sup>38</sup> 陳捷先著，《皇太極寫真》，（臺北市：遠流，2004[民 93]，初版），頁 58。

<sup>39</sup>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三，頁 63。天命六年（1621）十月初一。

<sup>40</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244。「眾漢官」原文為「漢人」，此係配合《滿文原檔》翻譯，而略有增添。

到這裡可以看出來，天命六年（1621）額爾德尼已經開始運用「圈\*」、「點·」、「豎丨」三個新元素系列，來進行滿文變革了。

尤其這個「豎丨」的發明，涉及了（卡 k'、嘎 g'、哈 h'）字母的改良，值得說明。

天命六年（1621）「蓋丨州 g'a | iju」的「蓋丨 g'a |」，是以「ge」字母加上一「豎丨」所構成的。並沒有考慮（卡 k'、嘎 g'、哈 h'）三個字母該怎麼發音，所以比較原始。跟後來新滿文的「卡 k'」字上只加「豎丨」不加圈點，「嘎 g'」字上加「豎丨」右邊再加上一點，「哈 h'」字上加「豎丨」右邊再加上一個圈等的完整區分，是不可相提並論的。但是當時「海州、蓋州」文字連著寫，迫於情勢，非區別不可，只好以「ge」字母加上一「豎丨」，臨時區別一下。沒想到就此形成慣例，在新滿文中引進了「豎丨」這個新元素，讓後來在寫（擦 ts'、滋 dz），也得以援例引用加「豎丨」。這就是「中古滿文」以區分為主的用意，前後是完全一致的。

這種精神，在「特殊字」區域範疇中，繼續發光發熱。例如（知 jy、吃 c'y）等字，屬於加「圈\*」系列，這個「圈\*」的作用，不在於表達「h」音，而是用於區分與「j」、「c」字母的不同，這跟當初「中古滿文」以區分為主的用意，基本上是相通的。

然而許多人認為，（卡 k'、嘎 g'、哈 h'）、（擦 ts'、滋 dz）、（知 jy、吃 c'y）等滿文的「特殊字」，是在額爾德尼過世後多年後才出現的，而史家多把這份功績，算在達海頭上。因為達海幼年即是滿漢俱修，鋒芒畢露：

又當時太宗朝之滿文，稱曰有圈點檔案。太祖朝之滿文，稱曰無圈點檔案云。達海實於滿洲文字之集成，可謂最有貢獻者矣。彼姓覺爾察，九歲通滿漢文義，弱冠草太祖詔令，彼奉命翻譯大明會典及素書與三略，太祖視之稱善。天聰六年，病死，時年三十八，諡文成。<sup>41</sup>

<sup>41</sup> 稻葉君山著，但燾譯，《清朝全史》，（臺北市：中華書局，民 49[1960]，臺一版），上一，頁 102。

無可諱言，達海對滿文的繼續發展，有其功勞。他是天聰六年（壬申，1632）病死的，當時有圈點檔案的發展，已然逐漸成形，又獲得皇太極的賞識，自然會將好的名聲，加在他的身上。不過回溯到天命六年（1621），「中古滿文」方興未艾之時，史上留下的證據，達海只是文書部門裡的一名「都司」而已，尚未躋於「巴克什」之列：

進而尚可看出原檔紀錄的確切時間。如上引附圖四十六所記：「於十月達海都司記錄的檔子」。此一段史事，是記載天命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的事情，而達海是在十月裏紀錄的。事情之發生與檔冊之紀錄，僅僅相隔數日；於此，當知其真實的程度了。更而由此尚可證明，達海在天命六年時，僅為「都司」之職，尚未躋於「巴克什」之列。<sup>42</sup>

經查「都司」為十五世紀明朝所首設的官制名稱，位階約為現今中低級軍官。<sup>43</sup>由於清朝官制，多襲自明朝。綠營軍階由高至低分別為提督、總兵、副將、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千總及百總。前面說過，天命七年（1622）正月十三日，額爾德尼因案革去副將之職，而達海當時是游擊，比都司雖高了一級，卻也受到波及而革職。

由於額爾德尼、達海這師徒二人，在天命七年（1622）正月十三日，都因案革職。可以看出，天命六年（1621）的這場「中古滿文」改革，顯然是後力不濟，無法繼續推展下去了。推測要是額爾德尼當時沒有違犯法紀，順利的推動「中古滿文」改革，後來滿文發展的面貌，必然是會有所不同的。

再回頭來看天命六年（1621）。額爾德尼是當時滿文文書紀錄的負責人，而達海只是一名中低級文員，聽命於額爾德尼。因此「中古滿文」的發展，功過是非，理應歸於額爾德尼。

如果「中古滿文」的一場變革，確實對後來完全新滿文有所助益，那

<sup>42</sup>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 60[1971]），附錄（一），頁 42。

<sup>43</sup> 據傅維麟的《明書》卷六五《職官志》紀載：「營伍武官皆因事而命，無定制，凡五等，曰鎮守、曰協守、曰分守、曰守備、曰備倭。其官銜凡六等，曰總兵、曰副總兵、曰參將、曰游擊，皆稱將軍。曰都司、曰守備、曰提調、曰千總、曰把總、曰百總，皆營官」。

麼開發新滿文的功勞，就不宜全部按照〈洪字檔〉中那一頁木刻版印刷文字所說，天聰六年（壬申，1632）春正月十七日，「達海巴克什奉汗命加圈點」，而讓達海獨享清譽了。

### 參、結語

明萬曆二十七年（己亥 1599）二月，清太祖努爾哈齊基於政治、軍事、經濟等諸多方面的活動增加，對民族文字的需求日形迫切，下令利用蒙古字母，書寫女真語言，開發出了滿文。這種文字在努爾哈齊建立金國以後，也常稱為金字。

由於蒙古字母本身就存在著一形多音、一音多形等問題，並不能夠涵蓋所有的滿文語音語意，何況還有漢字漢音如何拚音的問題，一直形成困擾。因此滿文創制不久，就面臨了改革的壓力。

因此《東華錄》、《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等史冊裡記載，清太宗皇太極天聰六年（1632）正月、三月間，達海巴克什奉命在老滿文上增加圈點，並增設了十個特定字母，讓字母更為充實完善，希望一舉解決老滿文在過去應用中出現的各種語音語意問題。這種改良過的滿文稱為新滿文，或有圈點滿文。

不過學者關克笑、李學智等，都對所謂天聰六年（1632）改革滿文，頒佈新版十二字頭的說法存疑。其中關克笑還推論，認為達海改革老滿文應是始於天命八年（1623），理由是老滿文的創制者額爾德尼於天命八年五月處斬。於是改革老滿文之事便「自然而然地落在達海手中，達海又可算是閉門思過，戴罪圖功」。而後天聰三年時，新滿文才正式用於記事。

本文則認為，圈點是老滿文書寫的基本構造，應用上並不陌生。採用圈點這種素材，來加以變化與改良文字，可說理所當然。而李學智所謂新滿文是來自於「偶加圈點」的說法，也確實可信。

李學智舉出《滿文原檔》上，清太祖天命六年（1621）七月二十日項下的案例為證，說明在「韓\*han\*」字右邊加圈，以與右邊不加圈的「汗han」字加以區分，創造出滿文加圈的實例。因此「圈\*」的用法，在當時並沒有新滿文「圈\*」代表字母發音「h\*」的含意。只是做一點區別，表示這個字不是國王「汗han」而已。

由此可知，加圈的新滿文，早在天命六年（1621）即已經出現了。不過 2006 年學者張虹，在〈老滿文改革的初始時間〉一文中，依然說關克笑先生的「天命八年至十一年間說」是正確的。這使本文考慮補充李學智的「加圈說」，使之完整可信，因此提出「加圈點豎說」，以便讓人一窺滿文改革全貌。

例如天命六年（1621）六月初二「巴·遊擊備鞍良馬一匹 *ba · iogi de enggemu hadala tohohoi emu sain morin buhe*」、天命六年（1621）十一月二十七日「因地·制宜，酌情委任 *ba · tuwame sindambi.*」等兩個案例，說明天命六年（1621）的滿文，已有「ba」在右邊加上「點·」的實際應用。

另關於滿文的「特殊字」方面，天命六年（1621）十月初一，〈來字檔〉上紀錄說到了「蓋州」，就出現一「豎丨」加到字母上形成「g'丨」的案例。

以上所提到無論圈、點、豎等，都是後來「新滿文」的必要新元素。因此額爾德尼的功績，至少有兩項是無法磨滅的。一是天命六年（1621）時，一舉開發出圈、點、豎這三種新元素，讓新滿文有能力重新出發，脫離蒙文的字母以往不合理的羈絆。

二是提供了新概念，也就是「區別原則」、「經濟原則」等，讓滿文的十個「特殊字」，找到了改革的依據，而得以順利開發誕生。

額爾德尼所領導開發的滿文，或可稱之為「中古滿文」。這場變革，確實對後來完全新滿文的產生，是有所助益的。因此，天命六年（1621）所開發出的新滿文，其貢獻就不宜全然磨滅，而讓後來所謂的天聰六年（1632）「達海巴克什奉汗命加圈點」說，來獨享清譽了。（本文於 2017 年 6 月投稿，於 2017 年 8 月審查通過）

###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解飢餓要靠自家飯，知冷暖只有貼心人。（回族）  
城需要堅固的城門，人需要知心的朋友。（滿族）  
畜靠肥膘，人靠知己。（滿族）  
水深魚樂，情深人知。（毛南族）  
人重感情，狗戀吃食。（土家族）  
蜂蜜再甜，甜不過知心話。（哈尼族）  
愛朋友勝過生命，縱然死去還留友情。（蒙古族）  
與其牛羊多，不如朋友多。（蒙古族）  
衣裳是新的好，朋友是舊的好。（蒙古族）  
有了新交莫棄舊友，買了珊瑚蒙扔琥珀。（藏族）  
只有箭一樣直的心，才能求得誠摯永恒的支情。（藏族）  
哈達要潔白的好，朋友要知心的好。（藏族）  
借衣打扮不好看，討食充飢沒味道。（土族）  
茶水喝足，百病可除。（維吾爾族）  
十個遠親，不如一個近鄰。（瑤族）  
遠山使木，近水食魚。（達斡爾族）  
好吃不如寬住。（布依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廿七）－傣族食品 「香茅草烤鱼」

華華

### 壹、前言

傣族，分佈於雲南省西南一帶，主要聚居於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等地。<sup>1</sup>根據公元二〇一〇年第六次大陸全國人口普查統計結果，傣族人口共有 1,261,311 人，內地卅一個省份均有分布，名列第十九大民族。

傣族自稱為「傣」，音「逮」。其含義是「人」，或是「自由自在」。傣族源起於大陸南方的「百越」族群，西漢稱其先民為滇國，東漢時期漢人稱之為「揮」，音「善」。唐、宋時期，按其外觀特徵，稱之為「黑齒蠻」、「金齒蠻」、「銀齒蠻」、「繡面蠻」、「茫蠻」、「繡腳」、「白衣」等名稱。元、明、清及民國時期，稱「白夷」、「擺夷」、「百夷」。由於許多傣族接近漢人，吸收漢民族文化較多，習稱為「漢傣」，訛音為「旱傣」。而把保留民族特點較多的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孟連、元江等地的傣族稱為「水傣」、「水擺夷」。

傣族說德宏傣語「傣哪語」、西雙版納傣語「傣仂語」、「紅金傣語」、「金平傣語」、「傣端語」等多種傣語方言，都屬於漢藏語系、壯侗語族的壯傣語支。

傣族有自己的文字，分為四種形式：在西雙版納等地通行的稱為「傣仂文」，又稱「西雙版納傣文」，在德宏等地通行的稱為「傣哪文」，又稱「德宏傣文」，在瑞麗、瀾滄、耿馬等縣市的部分地區使用的稱為「傣繃文」。

<sup>1</sup> 唐屹等撰寫，《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民81[1992]，初版），頁165。

傣繡文來源於緬文字母，是圓體，有 19 個聲母和 70 多個韻母。耿馬傣族佤族自治縣的猛定鎮有近 3 萬傣族，懂傣繡文的約有 2 萬人。

圓體傣繡文乍看之下，很像在醫院裡看到的視力測驗圖板。圓體傣繡文是以圓圈當作基本字形，再以上、下、左、右缺口的不同，而組合起來發展成不同的字母。因此一篇傣繡文的文章，就是由一連串缺口不同圓圈所組合而成的。想像一下，如果視力欠佳者，要閱讀這種文字，對眼睛實在是極大的考驗吧。

傣繡文曾經是德宏傣語和撣語的共同文字。後來由於德宏傣語主要使用毛筆書寫，才逐漸形成了今天略帶方體的「德宏傣文」。另外在金平使用的傣文稱為「傣端文」，又稱「金平傣文」。

「傣仂文」、「傣哪文」、「傣繡文」、「傣端文」這四種傣文都是從印度的婆羅米字母演變而來的，與寮國文、泰文、緬甸文、高棉文屬於同一體系，自左向右書寫，自上而下換行，只是在形體結構上略有差異而已。

傣族最重要的節日是潑水節。潑水節也稱宋干節，是泰語民族和東南亞地區最盛大的傳統節日，在潑水節時，無論泰國、寮國、斯里蘭卡，緬甸、柬埔寨、中國雲南傣族等國及區域，都會互相潑水祈福，形成全面性的潑水歡樂高潮。

對於潑水節，西雙版納的傣族有一個古老的傳說，十分出名：據稱在遙遠的年代，風調雨順，人民生活富裕安康。但是好景不常，有一天來了一個魔王，危害百姓，使旱災頻傳，讓農民十分苦惱。傣王有七個女兒，都悲天憫人。其中小女兒最為聰明，她用計使魔王熟睡，並以利劍斬下魔王的頭顱。誰知魔王的頭顱餘威猶存，滾到哪裡，哪裡就會發生火災。急中生智的女兒們急忙找水滅火，一陣猛潑之後，終於使魔王的頭顱淹在水裡，而無法再作怪了。從此，西雙版納的農民生活又正常了。經過這場劫難，大家感念七個公主的義舉，就以潑水節來紀念，於是潑水成風，而流傳至今。

台灣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忠孝街一帶，習稱南勢角，是北台灣傣族、緬僑的聚居地，有獨樹一格的南洋美食區及特色商圈。每年陽曆 4 月 13 日至 4 月 16 日，都會舉辦富有民俗色彩的潑水節，並邀請各地民眾一

同參與，共度佳節，已成為台灣知名的文化節慶活動。

南勢角的南洋美食區，可以吃到許多傣族食品。舉凡泰式椒麻雞、清燉排骨板條、生菜蝦捲、大薄片等家常菜，<sup>2</sup>都能品嚐到，而且價廉物美。不過別以為這就是西雙版納傣族常吃的食品了，因為傣族喜愛的食品，範圍太廣，有些昆蟲食材聽起來會讓人嚇一大跳，簡直不敢入口：

其食物種類極為繁多。除庭園種植和家庭飼養的物產以外，山野河流所產，似乎都可入食。更有一些稀罕之物如螞蟥蛋、蟬蛹、花蜘蛛、竹蛆、沙蛆、青苔等成為傣族喜愛的食品，使外人驚異不已。<sup>3</sup>

當然像螞蟥蛋、蟬蛹、花蜘蛛、竹蛆、沙蛆、青苔等食材，只有在雲南省那種比較自然的生態環境，才可能盛產，並列入食品選項。這類東西在台灣，不只罕見，而且還可能列入保育類動物，當然還是不吃為妙。現在就介紹一種食材比較普遍，口味也大眾化的傣族食品「香茅草烤魚」。

香茅草烤魚，其實就是碳烤鮮吳郭魚，是一道非常傳統地道的傣族風味菜餚。由於做法獨到、香料獨特、鮮香可口，在傣味菜餚中知名度非常高，是傣家人款待貴賓時不可或缺的一道菜。

## 貳、傣族食品「香茅草烤魚」

傣族喜歡吃魚，一般人吃鯉魚及四大家魚，即青魚、草魚、鱸魚、鱖魚等。不過近年受到養殖漁業發達的影響，吳郭魚，又名羅非魚或稱福壽魚等的新品種，大行其道。因此吳郭魚也成了傣族「香茅草烤魚」的常選食材了。

一般先準備好各種佐料，包括：香菜、大蒜、生薑、北蔥、白酒、薄荷草、香茅草、朝天辣椒、胡椒粉、花椒粉和精鹽、味精和熟豬油等，再將新鮮的吳郭魚洗淨，去掉魚鱗，以刀劃開魚背，<sup>4</sup>去掉腸肚等雜物，洗

<sup>2</sup> 大薄片是類似蒜泥白肉的一道菜，味道酸辣。只是豬肉材料得以豬頭皮的肉或豬臉頰的肉，肉片得切大一些。還有豬頭皮的肉煮熟後，要以水沖洗半小時再冷藏，使豬頭皮變脆。

<sup>3</sup> 方華文編著，于應機、李其金譯，《中國各個民族》，（合肥市：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10年01月，第一版），第44章，第3節。

<sup>4</sup> 一般魚販幫忙處裡魚內臟，都習慣劃開魚腹。而本道菜色要求的則是從魚背剖開，連魚頭都剖成半片，整尾吳郭魚呈現出以魚腹為中心的水餃皮狀，便於包裹剁碎混合好的佐料。

淨，加上剁碎混合好的佐料，鋪在魚肚子上醃漬半小時。醃製好後，再用二、三根香茅草葉將魚捆好，<sup>5</sup>然後置於火網上燒烤。

等到八成熟時，抹上一些豬油，繼續烘烤約五分鐘左右。這時油花四濺，香氣四溢，魚皮開始酥脆，魚肉鮮美入味。由於吳郭魚肉只有大刺，肉質細膩，因此深受各方人士喜愛。再加上在碳烤的過程中，香茅草的芳香與魚肉完美的融合，使得烤魚的香味，在火辣中帶有一分柔美，十分獨特。這道菜結合了香、鮮、脆的特點，如果喝上一口米酒，更能品嚐出其中的奧妙。

食材中的吳郭魚，一般市場、超市上都很常見。只是傣族選用的吳郭魚，品種接近原始的莫三比克種，<sup>6</sup>個頭比較小。這跟當年兩位台籍日本兵吳振輝及郭啟彰，於民國 35(1946)年從新加坡返台時，所引進的「在來種」吳郭魚，十分接近。曾經在學校上「水產概論」課時，聽水產試驗所老所長鄧火土講過，由於吳、郭兩位先生，搭船時親手以水桶提來的吳郭魚魚苗，十分辛苦，原來想將其繁殖以後，發財致富。誰知一場午後雷陣雨，把魚苗沖進水渠，到處繁衍，弄得一文錢也沒賺到。不過戰後貧窮的高雄人，免費品嚐到細膩嫩滑的魚肉後，感念吳、郭兩位大德千里迢迢，攜來救苦救難的好魚，自動取名「吳郭魚」，以為紀念，這就是台灣羅非魚何以稱為吳郭魚的由來。

後來吳郭魚靠著尼羅河種魚，又改良了原始品種，再命名為「福壽魚」，<sup>7</sup>一尾重達兩斤，幾乎是「在來種」吳郭魚的四倍大，其實如果魚太大，並不符合傣族「香茅草烤魚」的要求。傣族「香茅草烤魚」喜歡用半斤重的吳郭魚來烤，既接近原本四大家魚的傳統，也比較香酥道地。

另外食材中的香茅草、薄荷草等芳香植物，一般市場、超市裡也不大出現。這些植物其實都藏身在假日花市裡。如果有空逛逛，買個小苗，拿

<sup>5</sup> 原本是以魚腹為中心的水餃皮攤開狀，左右合攏又形成一條魚的完整形狀，便於綑綁。

<sup>6</sup> 全名為莫三比克口孵非鯽（學名：*Oreochromis mossambicus*）。

<sup>7</sup> 民國 58(1969)年，水產試驗所郭河所長以莫三比克種（*Oreochromis mossambicus*）雌魚與尼羅種（*Oreochromis niloticus niloticus*）雄魚雜交育種成功，名為「福壽魚」，俗稱「改良種吳郭魚」。其實吳郭魚各個品種都來自非洲，與尼羅河有關，可泛稱為尼羅河魚。

回家種在花盆裡，長大後就可以隨時取用了。如果急需時，還可以到住家附近「越南小吃」店裡探訪，保證尋找得到。越南婦女做菜時，如果手頭上沒有越南魚露、蝦醬、香茅草等佐料，就好像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是做不出名符其實的越南飯來的。

### 叁、結語

傣族舊稱為「擺夷」。民國 47(1958)年，自由電影人王引在香港創辦的「天南影片公司」在臺灣開拍新片《水擺夷之戀》，由唐紹華編劇並導演，相當轟動，是早年臺灣人藉以認識傣族最深入的一部電影。

劇情是漢族青年黃志遠和方鵬到滇緬邊境的水擺夷村寨，分別與土司之女金娃和銀娃相戀的故事。這種雙生雙旦的組合，並不特殊。只是影片中的歌曲，支支動聽。像是：〈願嫁漢家郎〉、〈碧蘭村的姑娘〉、〈家在山那邊〉等名曲，至今傳唱不輟，這就不容易了。〈願嫁漢家郎〉是由莊奴作詞，周藍萍作曲，堪稱一時之選，歌詞全文如下：

彎彎的籐麻哟 爬呀爬在大樹上啊  
 活潑的魚兒游啊 游呀游在清水塘  
 美麗的山茶花哟 開呀開在高山頂上  
 擺夷的姑娘願呀 哎呀 願呀願嫁漢家郎  
 白白的臉蛋 輕紗裝啊 苗條的身段俏模樣哟  
 溫柔的時候啊像啊像月亮哟  
 熱情的時候啊像啊像太陽  
 山上的男人 我不愛呀  
 一心哟只愛呀漢呀漢家郎哟 漢家郎

〈碧蘭村的姑娘〉。這首歌的曲調來自一首那個年代的臺灣山地原住民歌曲(鄒族)，漢語唱詞是周藍萍寫的，也十分有趣：

蘭山上 蘭花香  
 碧蘭村的姑娘 鮮花一樣 鮮花一樣  
 不高也不矮 不瘦也不胖  
 會說又會做 能跳又能唱  
 性情溫柔又漂亮 天真活潑又大方

山上都是這樣的好姑娘

城裡的小姐們 那裡比得上 那裡比得上

〈願嫁漢家郎〉、〈碧蘭村的姑娘〉、〈家在山那邊〉這三首歌曲，雖然有名，但是「人紅是非多」，備受明槍暗箭中傷。像是〈願嫁漢家郎〉，有人批評是大漢沙文主義，說是如果都嫁給漢家郎，少數民族不就滅絕了。〈碧蘭村的姑娘〉所述蘭山也不對，應該是南糯山。經查證南糯山位於景洪到猛海的公路旁，距猛海縣城 24 公里。是西雙版納有名的茶葉產地，真的不該稱為蘭山。〈家在山那邊〉的罪名更重，說是涉及抄襲抗戰歌曲〈松花江上〉…。

其實上述罪名，有些見仁見智，不能一概而論。應該考慮的是，當時的時代背景，正是蔣總統率領六十萬大軍，退守台灣的時候。電影為了市場需求，讓這些二十出頭的阿兵哥，徬徨的心理有所寄託，就編些香豔有趣的愛情故事，再以阿兵哥能理解的歌唱形式，表現出來。電影中的蘭山、南糯山，也許在觀眾的心裡，其實正是黃山、長白山，也說不定呢。就像傣族嘴裡吃著羅非魚，心裡念想的卻是四大家魚，道理是一樣的吧。

因此，有詩為證。

詩云：「傣族姑娘巧手忙，香茅烤魚十里香，四大家魚擺兩邊，尼羅河魚坐中央。」

## ◆ 稿 約 ◆

- 一、本刊為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地政治及現況之中文刊物，歡迎學者專家踴躍賜稿。
- 二、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A4，Word 檔），使用註解，說明來源，文長以一萬字以內為限。並請附摘要（三百字以內）、作者簡介（學歷、現職及研究領域），以上資料請附磁碟。
- 三、來稿經本社聘請學者審查通過後採用，未刊登者，本社恕不退件。
- 四、來稿一經刊載，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五、來稿限未曾發表過的作品，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 六、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凡經採用之論文，著作權歸本社所有。
- 七、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店市二十張路 129 巷 2 弄 10 號 3 樓，劉學鈔。

電話：（02）2218-6116

0921-883325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一〇六年十二月出版

# 中國邊政協會

中國邊政季刊

名譽發行人：楊克誠  
發行人：阿不都拉  
社長：劉學鈺  
主編：劉學鈺  
電話：0921-883325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印刷者：晟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和平西路二段 141 號 4 樓之 6  
電話：2314-1423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 0197 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 1658 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